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全国 30 家卫星电视同步播出

首次披露日军侵华老兵心路历程



未被

赵冬苓 李九红 / 著

审判

不是我们不翻过去这一页
而是他们没翻过去

——白介夫

一段惨痛的历史
一群日薄西山的老人
一场跨国大诉讼

这一切，只是因为：

我们可以宽恕，但是不可以忘记

——赵冬苓



白介夫（抗战史学会会长）：索赔的问题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是禁区，现在居然能够上演，具有重大意义，不是我们不翻过去这一页，而是他们没翻过去，这样一个片子值得一看。

郭运德（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有这么一批人像刘连仁，80多岁的时候仍然与日本打官司，他们要的不是钱，是尊严。有这样一群人，中国人就有希望。如果多一些这样的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

李准（中国文联副主席）：这部片子是站在当代文明的高度审视历史，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以中国老百姓的视角，反映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是最高的尊严。

陈汉元（中国纪录片协会会长）：很多片子失败就失败在事实不多讲道理太多。应该说，让事实说话是这部片子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郑洞天（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第一个感觉，在剧情片良知停止了的地方，纪录片就站了起来。该片建立在今天的人怎么去讲这段故事的基础上，涵盖了很多现代中国人如何面对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世界，看历史，看未来。

苏小卫（中宣部文艺局影视处处长）：民间诉讼这个题材选得非常好。片子的品质和价值是非常突出的，通过片子我感受到了艺术家的力量。

时间（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抗日战争》总编导）：看这个片子不光是情感，还有反思，这个片子选择了战争史的一个点，即索赔问题，一方面回顾历史，一方面现在跟踪。这一点很重要，值得借鉴。



ISBN 7-80109-718-1



9 787801 097187 >

ISBN 7-80109-718-1/K-56
定价：23.80 元



封面设计/许震宏
图文设计/赵雅明

未被审判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赵冬苓 李九红 著

《未被审判》摄制组 提供照片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被审判：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 赵冬苓、李九红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0

ISBN 7-80109-718-1

I. 未... II. 赵... III. 李... IV.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日本—侵华事件—史料 V. ① I25 ②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1627 号

未被审判——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作者：赵冬苓 李九红

策划：李三多 丁小晋 许震宏

责任编辑：谭 洁 荣挺进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话：66521270、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网址：<http://www.cctp.com.c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定价：23.80 元

代前言 和森村诚一谈战争与和平 / 1
(赵冬苓)

上 篇 (赵冬苓 李九红)

第一章 风雨诉讼路 / 15

第二章 强制劳工诉讼案 / 31
一 神秘的外务省报告书 / 32
二 花冈诉讼 / 42
三 山东农民刘连仁 / 55
四 福冈胜诉 / 66

第三章 慰安妇诉讼案 / 77
一 一个罪恶的诞生 / 78

二 裴凤基的故事 /82

三 山西慰安妇 /93

四 最后的斗争 /102

第四章 南京大屠杀诉讼案 /115

一 两个人的一生 /116

二 为了被忘却的记忆 /123

三 明妮·魏特琳 /130

第五章 细菌战诉讼案 /145

一 在历史的黑暗中 /146

二 不仅仅是 731 部队 /159

三 罪恶的交易 /170

第六章 平顶山惨案诉讼案 / 185

一 中秋节的阴霾 / 186

二 忠诚或背叛 / 194

第七章 投身诉讼的人们 / 201

一 被追问的良心 / 202

二 大森典子律师 / 212

三 一个女人和一场诉讼 / 221

目录

《未被审判》

下篇 (赵冬苓)

第一章 总有些东西让我们泪流满面 / 229

——《未被审判》采访手记

第二章 日本鬼子 / 309

——一个作家的采访手记

一 金井志直 / 311

二 汤浅谦 / 324

三 筱冢良雄 / 333

四 永富博道 / 337

五 仓桥绫子 / 348

代后记 行走在路上 / 357

(李九红)

封面选用的王选图片由赵全海拍摄



代前言

和森村诚一 谈战争与和平



森村诚一开口说：我叫森村诚一，日本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建立 731 细菌秘密部队那一年我出生在东京附近的埼玉县……但是接下去的采访却出乎我的想像。

——题记

许多人知道森村诚一是因为那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人证》，那是森村诚一的代表作。

森村诚一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属于推理小说中的新社会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在破案故事中注入对社会的思考和揭露，往往因为对社会鞭辟入里的批判而赢得



摄制组采访森村诚一



广大的读者。据森村先生自己介绍说，他的作品，迄今为止已经发行了1亿5000万册，仅仅在中国，在有了版权法以后，就有二十几家出版社和他签订了合同，更大量的盗版还不在其中。

我自己认为日本的推理小说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自成一派并且把侦探小说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当西方侦探小说在克利斯蒂之后变得越来越故弄玄虚的时候，日本的推理小说以严密的逻辑、无懈可击的科学推理而使侦探小说变成了对智力的挑战和游戏。读日本的推理小说，是智力活动的一大享受，读者会产生一种参与感，总想与书中的侦探们一起一试身手。

遗憾的是日本的推理小说没创造出像福尔摩斯、波洛那样的侦探形象，不过这也正是日本推理小说的特点：破案不再是神探们的事，活动其间的往往是像你我一样的平民——受害者或者感兴趣者，这更增加了小说对读者的亲和力。

曾经有个时候非常喜欢看日本的推理小说，这其中就读了好多森村诚一。后来不再读小说了，森村当然也不再读。再后来，森村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恶魔的饱食》，把日军731部队的罪行介绍到日本社会。听说了，却没再读。

这次想采访就是因为《恶魔的饱食》，另外还因为，森村诚一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补偿诉讼支持会的成员，在支持会里，他是名气最大的成员之一。

当我们提出要采访森村诚一的时候，对方几乎是倒吸了一口气。他们说，森村诚一是日本影响非常大的作家，不轻易接受采访。我说：试试吧。几天后，接到消息说，森村接受了采访要求，采访地点安排在一个律师事务所。

下午两点以前我们赶到了那个事务所，上电梯时，碰到一个日本人，也提着一台摄像机。进了事务所才知道，这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森村那天到那儿接受中国人的采访，便赶了来，想趁机也采访几句。森村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

两点正，森村准时出现在门口，像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打扮得衣冠楚楚。和以前见过的日本人不一样的是，当开始介绍的时候，他便像玩扑克一样拿了一把名片在手里，一张张发给大家。

事先为这次采访准备了六个大问题，心里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森村诚一能说出我希望他说的话来。我想对于一个写了《恶魔的饱食》那样的作品、又参加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支持会的作家来说，应该不成什么问题。采访

的开头让我备受鼓舞，觉得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当时我让森村对着镜头做一下自我介绍，森村诚一开口说：我叫森村诚一，日本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建立 731 细菌秘密部队那一年我出生在东京附近的埼玉县……但是接下去的采访却出乎我的想像。

我准备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人证》中，您充分表现出战争、日军的占领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创伤，后来在《恶魔的饱食》中，您又充分地表现了日本作为加害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这其中，您有没有一个从关注自身民族的痛苦到关注其他民族的痛苦、从咀嚼自身民族的不幸到反思自身民族加害行为的过程？

森村诚一是这样回答的：不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所谓战争，就有受害和加害两个方面。《人证》是从受害的角度写的，《恶魔的饱食》是从加害的角度写的，只是角度的不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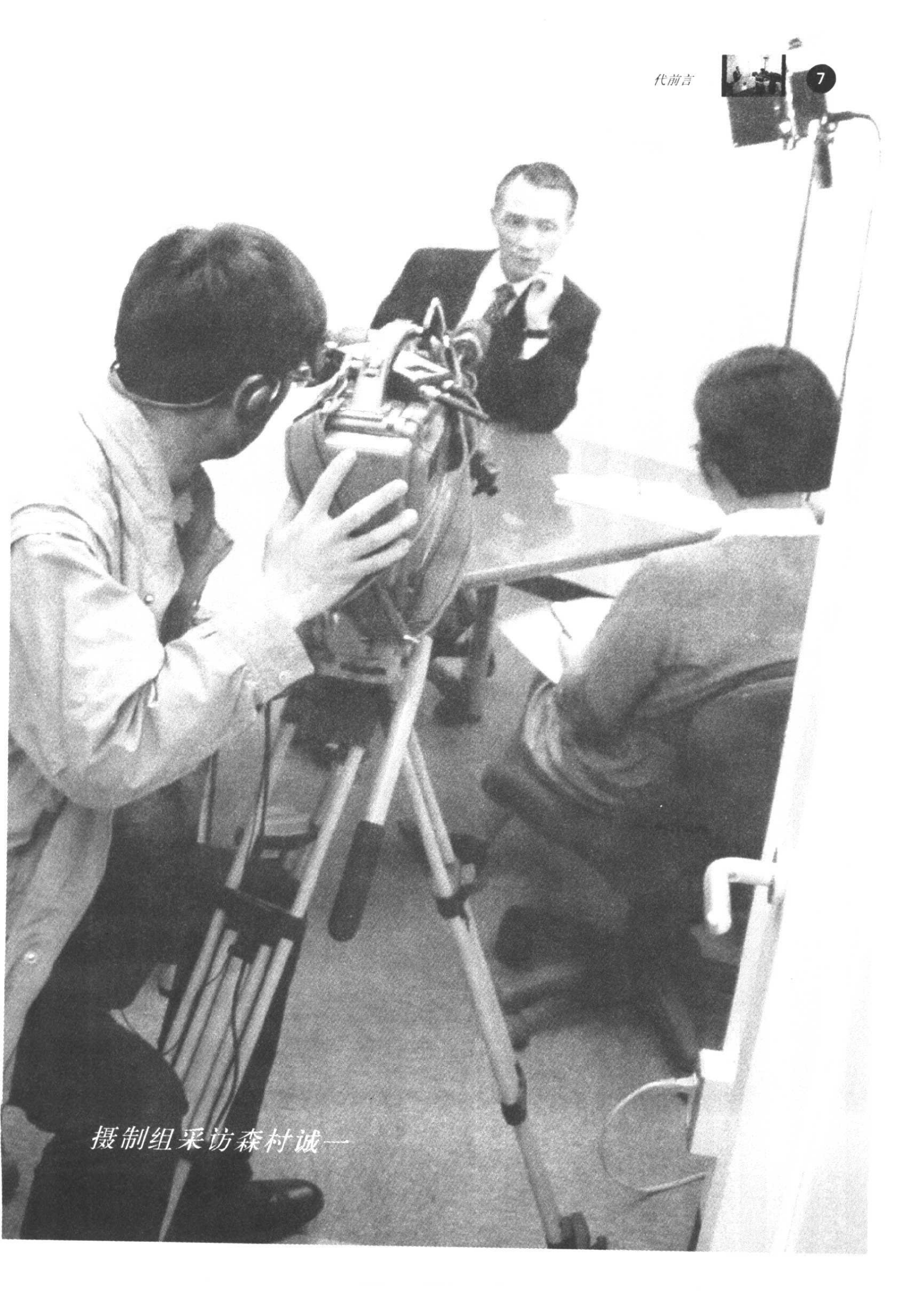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作为日本一位知名的作家，您出于什么考虑参与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支持会？我想像他会说出一大篇让中国人心里热呼呼的话来，但他却一句也没说，连一点儿意思也没流露。他先是就知名这个词发了一通感想，比如日语比较难翻译，因此日本的文

学作品不好介绍到国外之类，然后说：和正义、责任、义务相比，他更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陪他来的支持会的持永女士说：我和他们相处，很愉快。——天哪，这居然就是他参加支持会的动机！要知道他曾经把自己的一大笔稿酬拿出来交到支持会。

再往后他说的话就更离谱了。

采访过程中我发现森村换了好几种坐姿，这和总是正襟危坐的日本人有点儿不一样。我正以为是发现了作家的个性，他老兄已经开了腔：你们现在能不能不拍？我的腰不好，不能一个姿式久坐，拍出去让中国人说：这个日本人真没礼貌。——我不由得笑了：原来他比正襟危坐的日本人还要讲究。

接下来我问他：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为当年日军的残暴而感到震惊。更可怕的是，他们居然没有犯罪感。那些士兵，他们在家里很可能是老实、正直、善良的青年，为什么在那种时候，那种情况下会变成了野兽？日本人那时候是怎么啦？森村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比如一个家里，兄弟二人会经常打仗，但一旦和邻居打起来，两兄弟会一起对外。一个村里，邻居们会经常打仗，但一旦和外村打起来，又会团结起来。国与国也是一样。当与别



摄制组采访森村诚一

的国家打仗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政治家会把目的正义化，用正义来统一国民的思想。从古到今，你没听说哪个战争的制造者或发动者说自己是非正义的吧？而一般民众，总是以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斗的，所以，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犯罪，他们以为自己在为正义而战斗。

他说完了，我还等着，我以为他还该说点什么，可是他问我：这个问题这样回答可以吗？我赶快点头：可以，可以。可心里，我在想，他把日本人的责任放哪儿去了？我当时以为他是疏漏了，可后来才知道不是。

我又问了个有关美国的问题。日军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用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战俘做活体试验的罪行在战后是被美国包庇、从而逃过了惩罚的，我想《人证》中森村表现出对美国的深仇大恨，对这一段历史事实又知道得很清楚，想必会说出一番声讨的话来吧。但森村只是点点头，说，是真的，是美国为了得到细菌战的资料和 731 的人做了交易。对美国，他却开口就说：我个人很喜欢美国。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只有美国说了算。当然别的国家可以利用联合国和美国对抗，可别忘了联合国设在哪儿，是谁出钱养着。要联合国对抗美国，就像要董事会对抗董事长一样。

我们又谈了一阵日本的政治动向。我说亚洲各国对日

本很不放心，觉得日本有重走战争老路的危险。森村却连连摇头，说：当然日本国内是有人想那样干。可现在的世界政治，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决定的，日本即使想，也不可能重走战争老路。

采访结束时我顺便提了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森村先生，您现在在写什么？可以说吗？森村马上回答：可以啊，没什么保密的。我在给五家刊物写着连载小说。我吓得一愣。他有几分自得地接着说：这不是最高记录。我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大概就是写《人证》的时候，同时给13家杂志写连载呢。

想问的都问完了，我让摄像收拾家什。森村却意犹未尽的样子。他和我一起走出律师事务所，东张西望了一下，对我说：时间还早，到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

他和我们一起去咖啡厅，买了一大堆的食品和饮料，很大方地挥着手：都坐下吧，我请客。

一坐下他就热络络地和我们谈起了中国，两眼放光地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简直太喜欢了。中国的历史比日本的精彩，里面有许多很民主的东西。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你能设想一个随便什么人当天皇吗？于是我们就吃着他请的三明治、喝着他请的咖啡

和他大谈中国历史，谈项羽、刘邦。我问他喜欢这两人中的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说了：项羽。我说，我猜到你会喜欢项羽的，文人都喜欢项羽，而我更喜欢刘邦。他惊讶地看着我：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喜欢刘邦？我说，项羽只是匹夫之勇，而刘邦，则要聪明得多。我喜欢聪明的男人。

由此又扯到了中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森村的话，在这儿已经差不多可以算是大放厥词了：你知道日本受恩于中国（指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日本总是对中国怀着一种很深的感情。看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日本人会觉得心里别扭，这就像两家邻居，本来关系很好，现在看到一个邻居被外人欺负，就无论如何也想过去帮帮忙，总以为在自己的保护下邻居会感到更幸福。这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他这番话，无论如何都让我心里不舒服。但是又想，如果他在说一个事实，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又扯了近两个小时的战争，给我的感觉，尽管森村写的都是具体的战争：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但谈战争的时候，他却很少谈具体的战争。在他那儿战争没什么正义不正义，也不分什么对与错。说战争，就是人类的事，人类发明了这样一种游戏来自相残杀。另外

一个印象是，他总是很清醒地把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分开：战争是政治家和野心家的游戏，民众总是受害者，无论是受害国的民众和加害国的民众。

这个印象，后来更强烈了。

咖啡喝到下午整六点，森村站起来告辞，临走的时候再三说，他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下午，和我们的聊天给了他许多的灵感。他这种说法倒叫我莫名其妙，因为事实上整个下午差不多都是他在说，我在问和听。不过我想作家一般都有点自恋，自己把自己激动起来，然后就说是别人给了灵感。这么想想也就不再奇怪。

尽管森村的许多话我听着不舒服，但我得承认我喜欢森村这个人。这是个天生的作家，非常的感性。如果他喜欢某个人，那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人代表正义，而是他喜欢，反过来也一样。他的许多说法都生动有趣。比如，他睁大了眼睛对我们说：那些鼓吹战争的日本右翼比较坏，人长得也不像样，就说那个石原慎太郎吧（东京都知事，多次否定侵略战争），以前看他长得就不咋样，最近看到他，觉得他越发难看了。

去日本以前，我参加过一次中日学者共同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有关侵略战争国民责任的

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位日本律师说：发动战争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罪过，而日本人民是无辜的，在场的几位中国青年学者当即对此进行了激烈的驳斥。当时，我是非常赞同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的。但在森村这儿，我发现，无论什么时候，他只把罪恶归于国家、政治家，对参与其中的小人物、国民，他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和森村聊天的时候，我对他这种倾向总有点拿不准，后来在一次采访中，突然有了新的认识。

日本有个势力庞大的遗族会，全部是由战争死没者的遗属组成。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亲人是护国之神。但日本还有个和平遗族会，在国内的时候，我看到介绍过来的和平遗族会的章程里说：夺去我们亲人的战争，是给亚洲各国民众带来苦难的战争。这句话感动了我。另外我还知道，这个遗族会的成员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诉讼，控告小泉违反了和平宪法。因此，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提出采访几位和平遗族会成员。

在采访森村的第二天，一位退休的职员坐在了我面前，他是和平遗族会成员，他的父亲战死在中国的湖北，供奉在靖国神社。当父亲阵亡时，他才三岁，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没出生的妹妹。他兄妹四人，全由没有工作的母亲带

大。讲起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时，有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他的母亲经常说：若是有一个孩子，就一起跳河死了；若是有两个，背着一个抱着一个也跳进去了。可是四个孩子，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同时跳进河里的。——战争，使一个女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苦难的过去使这位健壮的男人痛哭流涕。我抓紧时间把我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作为一个日本的普通民众，您觉得在战争问题上，日本国民有没有责任？他马上回答说：战争是天皇发动的，责任是他的，而我们只是受害者。我又问：您对您父亲战死这件事怎么看？他哭出声来，一迭声地说：我只想说，再也不要再有战争了，再也不要再有战争了。

回国以后找来了森村诚一的《人性的新证》。这本书，是他在1982年访华回去写了三大本的《恶魔的饱食》向日本社会全面介绍731的罪行后，以731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的一部侦探推理小说。一看之下，对森村多了几分敬意：当我们只满足于声讨731，而对731的具体情况其实不甚了了的时候，森村对731的一切做了详尽的研究，并且毫不隐瞒地介绍给日本的国民。当时这本书在日本引起极大的轰动，迄今已经印行了100多万册。我注意到，在书中，对罪行毫不隐瞒的揭露和对731老兵的深切同情奇妙

地交织在一起。书中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字句：这是日本对人类犯的罪、无法补偿的罪……但同时，森村认为，应该有一座纪念塔，那些 731 的受害者和参与害人者应该同时得到祭奠。我不敢同意他的话，但是我确实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站在一场具体的战争里，我们必须说谁对，谁错。但是站在战争之上看战争，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场由政治家为满足野心而发动却由下层民众送死的游戏。

似乎是受了森村的启发，一个想法在那个时候萌生：在做完手头的片子后，我希望我能够拍出另外一部片子。在这部片子里我不再谈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我只想几位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和其他国家的侵略者和受害者开口，讲一讲他们在 60 多年前的经历。我想用他们的故事告诉人们：这一切，就是战争。

赵冬苓

2002 年 5 月

上篇

第一章

风雨诉讼路



他们都是中国最普通的民众，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家境贫寒、生计艰难。是什么使他们在风烛残年又走出家门，投身于一场漫长的、胜诉希望渺茫的跨国诉讼？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诉讼，竟能牵动中日两国如此多的人心？

——题记

他们都是中国最普通的民众，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家境贫寒、生计艰难。是什么使他们在风烛残年又走出家门，投身于一场漫长的、胜诉希望渺茫的跨国诉讼？

他们是日本或中国法律界的栋梁之材，他们有着成功的事业、美满的家庭。是什么使他们置这一切于不顾，和那些贫穷的人们一起，共同投入了这一场斗争？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诉讼，竟能牵动中日两国如此多的人心？

自1995年6月28日，以河南耿谆等11名花冈暴动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加害者鹿岛公司谢罪、赔偿以来，七年中，在日本列岛，北到北海道，南到福冈，有几十起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或加害企业，要求为60多年前受到的无辜伤害谢罪赔偿的案件在审理，日渐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注目的大事。

这是一场追求和平、追求正义、追求未来的战斗。

这些来自中国民间的诉讼案，不是孤立的个案，它联系着历史和未来。

回顾中日两国漫长的历史，曾经有个时期，两国人民一衣带水，友好相处。但近代以来，老大的中国封建王朝

闭关自守，渐渐落后于世界，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日渐强大。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起，中国屡屡遭受日本侵略，割地赔款，受尽欺侮。

中国在近代向日本赔偿过三次，包括战争赔款或者具有战费补偿性质的赔款。第一次是1874年的琉球事件赔款，赔款50万两；第二笔是甲午战争赔款，赔款2亿两；第三笔战争赔款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庚子赔款，赔偿给日本的本金和利息共计7500多万两。

中国的赔款，对日本国力的增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羽翼丰满的日本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亚洲一系列战争的根源。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横行肆虐，给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造成我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经济损失6000多亿美元。

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德国认真履行了赔偿义务，到1999年底，已累计向有关国家支付战争赔偿650多亿美元，德国的赔偿将持续到2030年，总计将赔偿1222亿马克。而日本，战后只向韩国、印度、菲律宾、印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东京街头举行抗议活动

尼、马来西亚等国共计赔偿 6565 亿日元，折合 18 亿美元。

日本之所以能够逃脱战争赔偿，和美国战后的远东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战后亚洲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没能从日本得到足够的赔偿，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原因造成的。

回顾美国对日战争赔偿的态度，有一个从主张严厉赔偿到反对赔偿转而扶持日本的变化过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美苏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日本的赔偿责任。当



时，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都对日本提出了战争赔偿的要求。

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对中国，则扶蒋反共，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当成美国称霸亚洲和反对苏联的基地。为了推行这一远东战略，美国当时主张最大限度地打击日本的军事潜力，用日本的赔偿充实蒋介石的反共抗苏能力，目的是使日本的战后经济彻底摧毁，遏制它的再发展，同时也能给许多受害国家一定的补偿。

1947年，美苏关系恶化，冷战开始。美国抛出了杜鲁门主义，紧接着又提出了帮助西欧复兴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蒋介石政权也岌岌可危。眼看让蒋介石中国成为远东反共基地的梦想破灭，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1948年，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发表了一个政策演说，其中提到，美国的对日政策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使日本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点，第二是要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工厂。罗雅尔的演说，标志着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

1949年5月12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以后，

美国代表马林科依就在远东委员会声明停止对日赔偿要求，放弃了以往的赔偿政策。而第二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东西方冷战在远东地区进一步发展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远东形势的急剧变化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日本的扶持，使日本成为美国进行朝鲜战争的最大和最近的后勤基地。而日本通过美军在朝鲜特别的军事需要，获得了大量的订单，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史上叫做韩战特需。经过了朝鲜战争，日本迅速地在战后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完成了战后经济重建的任务。

至此，日本完全取代蒋介石集团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战略伙伴。

出于战略目的的考虑，为使日本尽快地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重返国际社会，美国主持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旧金山和会。

当时，美国提出让蒋介石政权代表中国参加旧金山和会，而英国因为历史形成的原因，在香港问题和英国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因此提出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加。两个主要西方国家意见不一致。为尽早促成旧金山和会的召开，美国解决对日问题的全权代表杜洛斯和英国的外务大

使莫利斯达成协议，决定不邀请中国参加，将来由日本政府单独和中国签订和约。杜洛斯—莫利斯声明发表之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在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是经历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经历苦难最多的一个国家，没有中国参加的对日和会，就是非法的，签订的条约是片面的。

1951年9月8日，48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对日和约，亚洲各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宣布放弃对日赔偿要求，只有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方面都未参加旧金山和会而没有与日本签约。

和会结束后，杜洛斯迅速到了日本，要求日本政府和台湾蒋介石签订和约。但当时的日本政府有自己的考虑。战前日本的经济利益大部分在亚洲大陆，如果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对它的经济恢复将会十分不利。日本政府不愿意一下子和新中国政府彻底断绝往来。出于这种考虑，它对和谁签订和约的问题一直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杜洛斯自己用吉田茂的口气写了封信，说日本政府决定与台湾的蒋介石签订和约，迫使吉田茂在上面签了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吉田书简》。

在《吉田书简》公开发表以后，蒋介石方面组织自己

的代表团，开始了和日本的谈判。

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之日，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签订和约，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当时中国政府曾发表声明：台湾当局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不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和约，彻底关上了中国和日本官方往来的大门，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灵活政策，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1972年，在经过长期的隔绝之后，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开始了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

当时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坚冰刚刚开始融化，西方的对华封锁还没打破，中苏边境上，苏联陈兵百万。和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外交上的主动选择。

中国当时提出了对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日台条约无效。同时，强调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承认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为了达到和日本恢复邦交

正常化的目的，实现上述原则，中国政府在战争赔偿的问题上采取了宽容的、向前看的、灵活的态度。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

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鉴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



日本和平人士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前举行抗议活动

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

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到广大日本人民的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大风度和长远眼光。

1972年9月22日，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之举宣告结束。

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既是现实政治的务实选择，也是着眼长远的战略考虑。事实证明，中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所采取的宽容灵活的态度，对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的联系日益紧密。2002年，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创记录的1019.1亿美元。日本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重视个人的权利、注重保障人权，成为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战争受害者开始站起来，要求战争的责任者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做出赔偿。

在欧洲，备受苦难的犹太人以及受害劳工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求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银行赔偿的努力。

在美国，日裔美国人自 70 年代以来积极要求美国政府为他们在二战时对日裔美国人做出的不公正的行为道歉赔偿。

在加拿大，日裔加拿大人和他们在美国的同胞一起做着同样的努力。

1988 年里根总统签署 100 - 383 号法案，对二战时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日裔美国人每家赔偿 2 万美元。

此前，加拿大政府已经向在二战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日裔加拿大人每人赔偿 2.1 万加元，总数约 3 亿加元。

同样是在美国，经过多年努力，犹太人和受害劳工终于得到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银行的赔偿。到 2000 年 3 月，经过诉讼和艰苦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由德国政府和西门子、奔驰等大企业共同出资 100 亿马克，建立了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赔偿基金。

1995年，第一例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加害企业、要求谢罪赔偿的案件在东京发生了，这就是当年震惊中日两国的花冈暴动幸存者诉鹿岛企业案。它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日两国人民要求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山西性暴力受害者诉日本政府要求谢罪赔偿案、山东农民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诉日本政府案……一位又一位战争受害者在风烛残年走出了他们贫寒的家门，投身于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已有20多起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或加害企业案在日本列岛从南到北同时进行着。最近，又有几起受害劳工案将在日本提出起诉。

截止到目前，在这些诉讼案中，除花冈和解，刘连仁、福冈劳工、李秀英名誉案一审胜诉外，其他各案一审均已败诉。中日两国正义友好人士追求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努力仍然举步维艰。

失败的命运似乎在一再重复，但局势已经在悄悄改变。

1999年8月10日，美国加州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敦促日本政府对日军二战期间的战争犯罪做出“清楚的、不含



王选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前主持抗议活动

糊其辞的正式的书面表现”，承担侵华战争罪责，对南京大屠杀的 30 万受害者支付赔款。第二天，加州议会通过了另外一项影响深远的法案，即黑根法案。该法案把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诉讼时限延长至 2010 年。

这是美国一个州的法案，但它的影响力巨大。战时奴役过中国劳工的日本大企业大多在美国有子公司，这项法案意味着，只要这些战争受害者的后代有一人在美国，他们就可以在2010年前选择在美国对这些企业起诉。这项法案一出，日本骤感到它的压力。果然，这项法案通过的第二年，就有两起中国战争受害者选择在美国起诉日本企业。他们的代理律师分别是华裔律师杨立和曾经代理过犹太人集体诉讼的美国著名律师巴瑞费舍尔。站在他们身后，支付这一场巨大官司费用的，是在美国的华人团体。

同时，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补偿诉讼得到了联合国的注意。自90年代初以来，联合国人权组织几乎年年对日本政府发出劝告，要求他们正确对待历史，尽早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对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受害者和奴役劳工受害者做出赔偿。

所有这一切，给了日本社会强烈的冲击，使日本法院觉得再也不能无所作为。在近年来数起诉讼案中，日本不同的法院在不同的案件中先后突破了先前存在于这些诉讼案上的法律障碍。

在刘连仁案中，诉讼时效的问题被打破。

在福冈劳工案中，法院第一次承认是政府和企业共同

对中国劳工实施了不法侵害的行为，应该共同为此负责。

同时，法院以明确的语言认定，中日联合声明所放弃的只是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不能据此认为中国战争受害者个人失去了请求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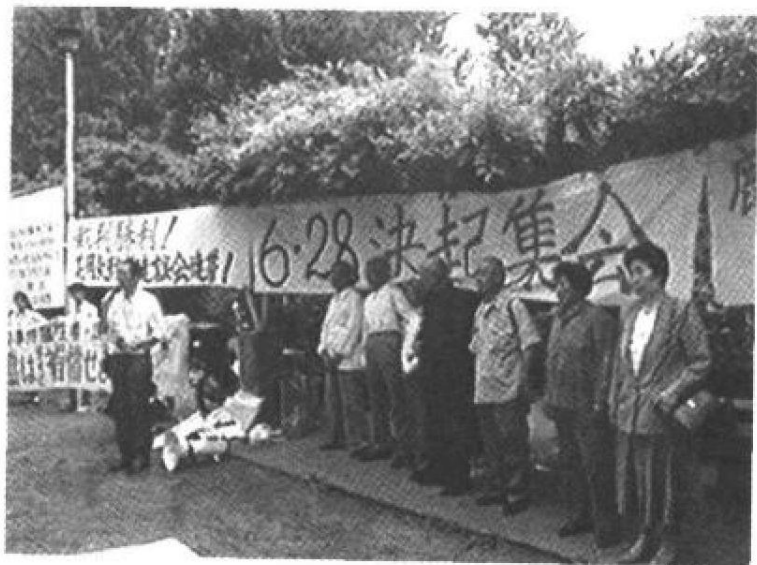
在2003年1月16日的京都中国强制劳工案的判决中，法庭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刘宗根等六名中国劳工败诉，但就在这一次的判决中，一直成为战后诉讼最大法律障碍的所谓国家无答责问题却被突破。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政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呼声在日本社会日渐高涨。日本一些在野党议员开始谋求在日本国会立法，通过立法的形式解决慰安妇、强制劳工等战争遗留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亚洲战争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为维护自己和人类的尊严和权利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诉讼。战后诉讼在走过了八年艰难曲折的路程之后，正在进入一个胜败的关键时期。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见到过这样一幅动人的画面：2002年的春节，细菌战诉讼日本律师团和支持会的成员到日军细菌战受害地浙江义乌农村过年。在南方初春和煦的阳光下，在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播洒过细菌、笼罩过死亡

黑雾的原野上，曾经互为敌人的两国民众，经过五年的诉讼，在这样一个新春到来的日子里手拉起手，唱着共同的歌。在那一刻里，所有在场的人们心里都充满了阳光和感动。这是投身于这场诉讼中的所有人的一个梦想，一个美好的梦想，梦想着中日两国追求和平和正义的人们能够消除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创伤，手拉着手，共同走进新的世纪，实现真正的、世世代代的中日友好。



中国劳工诉讼团抗议鹿岛公司的集会



第二章

强制劳工诉讼案



被剥夺得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也还有自尊。

——题记

— 神秘的外务省报告书

1995年6月28日，日本律师新美隆代表中国耿谆等11名原告把一份起诉书郑重地递交到日本秋田县地方法院，被告是日本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鹿岛组。第二年，中国山东农民刘连仁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矛头直指日本政府。在起诉书中，他们一致要求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为当年强掳中国人从事强制劳动的事实承担责任、谢罪赔偿。

在有关中国强制劳工的一系列诉讼中，日本政府曾在法庭上极力否认他们在强制劳工上的责任，当原告方拿出厚厚的外务省报告书时，日本政府不得不哑口无言。外务省报告书，成为法庭上日本政府无法逃避的铁证。

人们现在在东京日本华侨总会能看到的，是这份外务省报告书的副本，它的正本已经早就不知所踪。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战火后开始重建的日本社会曾经有人多次在国会中追问它的下落，而当时的日本政要却以种种理由否认它的存在。但他们没想到，这些发黄的纸片，被他们刻意销毁的时候，却被另外一些人小心地保存着，总有一天



会重见天日，变成在法庭上指证他们有罪的证据。

翻开一册册外务省报告书，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发了黄的名字，它们代表了一条条年轻的生命，隐藏着一个个惨痛的故事。

他们都是中国普通的平民，是儿子，是父亲，日子虽然过得贫穷，却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包围在亲情之中，直到有一天他们出门，或者连门也没出，坐在家里就被强行带走，强掳到日本从事为战争服务的奴隶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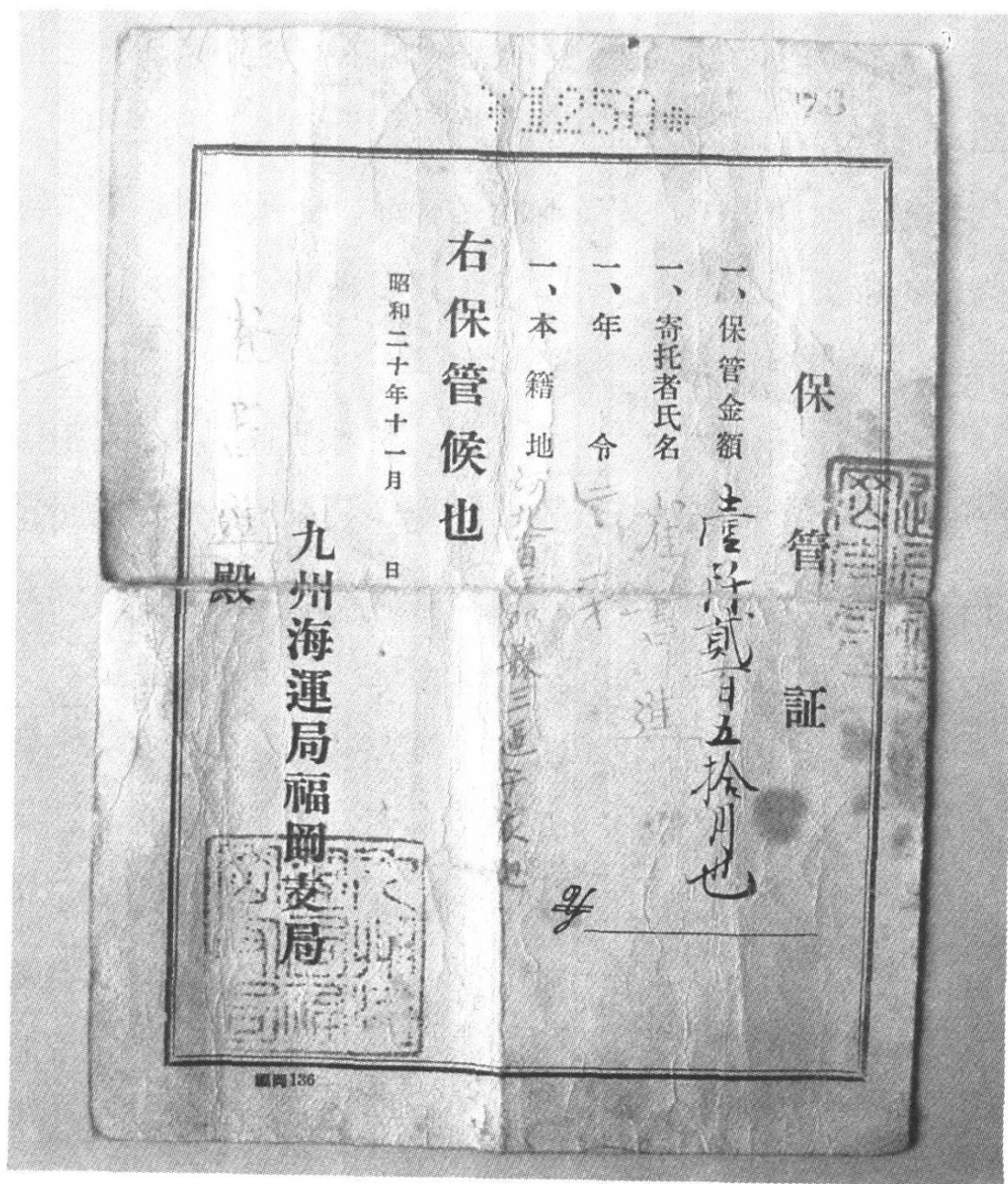
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情。

从1931年的“九一八”算起，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当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正在到处大扫荡、搞三光政策的时候，气势汹汹的日本已经开始走向强弩之末，它的国力已经对这场战争难以支撑。

1942年中途岛事件以后，日本战局恶化，在两大阵营的交战中，日本损失了大量军事装备，人员伤亡惨重，大批公民甚至少年都被驱赶到前线。为了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内阁做出一系列振兴日本经济、确保重要产业，特别是军需产业生产的计划。但劳动力缺乏的矛盾却日渐突出。于是，一些支撑军需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大企业如三井、鹿岛等联合向内阁提出了《补充劳动力请愿书》，

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1942年11月27日，日本战时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通过



勞工保管証

了《关于华人劳务者内地迁入案》。

经过强征几千华人劳工进行所谓试验迁入，结果令人满意。1944年2月28日日本内阁次官会议决定正式执行上述迁入案，大规模地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做强制劳工自此开始。

在华北广袤的平原上，日本军队围成一个包围圈，逐步缩小，包围圈内的青壮年甚至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12岁男孩子都被一掳而空，他们对此有个颇有几分戏谑色彩的命名：“抓兔子”。几乎是一夜之间，一片黄天厚土变成了恐怖笼罩的魔鬼地狱。

几万名中国男性公民被强制带离了他们的家园，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悲剧人生。

华北地区是强制劳工的主要受害地。被强掳的劳工大部分通过铁路运到青岛和塘沽，然后被送往日本。据青岛社科院张树枫研究员统计，仅在1943年和1944年9月之间，被送到日本去的劳工就高达10000多人。

青岛大港码头、天津塘沽码头，当年，这些地方曾经哭声震天，一派生离死别景象。数不清的中国男性公民被绳索系在一起，从这儿押送上船，和货物装在一起，运往日本。许多当年的劳工回忆说，当他们挤在货船上，眼看着故土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茫茫海尽头的时候，许多人

都跪在船甲板上，向着祖国的方向深深地叩头，心里充满了绝望。他们知道，此去一别，这把骨头就不知道抛在何处，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一见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和弱妻幼子、苍老的爹娘。

近年来，对中国强制劳工的调查逐步深入。据调查，从中国内地掳往由日本统治的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奴隶劳动的有上千万人，而被强行带往日本的有4万余名。除掉因恶劣的运输条件途中死亡的，当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终于踏上日本本土的时候，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共计有38,935名，他们分布在日本列岛35个事业所、135个作业场，从事着挖煤、采矿、装卸等为战争服务的奴隶劳动。在这35家事业所中，三井、鹿岛、西松等大企业的名字今天的中国人还耳熟能详。几十年后，这些企业重新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曾告诉中国人，在他们的资本积累中有中国人的血汗。

北海道是使用中国劳工最多的地区，当年，有58个作业所使用了16000多名中国劳工，占中国劳工总数的42%。

北海道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当年，中国劳工在北海道的严寒中从事着装卸、采矿等劳动，他们身上穿的，只有从中国穿去的单衣。而他们吃的，开始尚可维持半饱，后



来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情况的日益恶化，中国劳工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长期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之中，许多人因营养缺乏而失明、发生皮炎，甚至饥寒交迫而死。

在外务省报告书上清清楚楚地记着：3万多名劳工绝大部分是1944年到达日本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被遣送回家。他们平均在日本的劳动时间为13.3个月，最短的只有1.3个月，但就在这短短几个月的劳动中，中国劳工死亡人数竟达到6830名，平均死亡率17.5%，最高的达到52%。

室兰，是北海道一个普通的小城，战争时期，这儿曾是一个军事重镇，有几千名中国劳工在这儿从事过开采矿山、码头装卸等奴隶劳动。在室兰的一座小山上，矗立着一座方尖碑，纪念着几百名冤死他乡的中国人的冤魂。据日本劳工问题研究者北野的统计，这里5个事业所里中国劳工的死亡率都在20%以上，有些超过30%，5个事业所平均死亡率是30.3%，就是说3个人中就有一人，没能从室兰的强制劳动中活着回去。对此，北野先生愤怒地评论说：当时日本对中国劳工的恶劣行径，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虐杀！

1954年，室兰带着一个城市的忏悔，加入了对中国劳工遗骨的挖掘工作。50年代初，在战败后普通的反战情绪



日本鹿岛组官员在法庭上



日军戏称抓捕劳工为“抓兔子”
图为日军在中国农村抓捕劳工



的笼罩中，日本民众曾自发地在许多地方对中国劳工的遗骨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他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设身处地地感受着中国人被掩埋在异国他乡的不幸和孤寂。同时，他们也在感同身受地反思，为什么一定要发生这样的事呢？

于是，这个城市永久地记住了1954年10月9日到10月11日。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三天，是让这个城市震惊的三天，是让普通市民无法释怀的三天。伴随着出土遗体数量的飙升，原来保守估算的30多具遗骸，突破到血淋淋的125具，出土时125人的遗骸，完全是被残忍地扔到坑里的状态，其中有的人似乎还挣扎过。挖掘结果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现场目击者扪心自问：这125具尸体，到底代表着多少死难者？难怪北野先生这样说，“这里规模虽小，我觉得可以说是个万人坑。”

仅仅三天时间，就有100多具遗骨出土。100多具遗骨，就是100多条活生生的生命。他们没经火化，没有棺木，一条条生命去了，连最起码的处置都没有，就这样胡乱抛进坑里，一抔黄土就阻隔了他们和祖国、和家庭、和日夜思念着他们、盼着他们回家的亲人的一切联系。

这100多具遗骨和日本其他地方挖掘的遗骨一起，被

分批送回中国，存放于天津、河北两地。一条条精壮汉子去了，就这样变成了一把把骨灰；在中国的农村，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那一个个盛着他们骨灰的方盒，代表了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军国主义者们的狂妄挽救不了侵略者失败的命运，强掳他国国民为战争机器输血也挽救不了侵略者失败的命运。1945年8月14日，日本昭和天皇沮丧的声音在日本战争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回荡。在进行了15年持续的侵略战争后，日本不得不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面前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战后横滨国际战争法庭的审判中，曾经残酷奴役中国劳工，并制造了花冈惨案的元凶被定为战犯，其中三名为首者被判处绞刑。虽然由于美国的袒护，这些战犯很快就恢复了自由，没有一个走上绞刑架，但由于这次审判，中国劳工在日本各作业场的悲惨遭遇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横滨审判，惊动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各加害企业，为了应付战胜国的检查，日本外务省要求使用中国劳工的各企业向政府写出报告书，外务省又根据各企业的报告书写成了总的报告书，这就是外务省报告书的由来。

但报告书刚写成，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政权全面崩溃、新中国成立。为了扼制共产主义，美国及时调整自



己的远东战略，由打击日本改为扶持日本，希望由此把日本当成扼制远东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而日本政府，也审时度势，悄悄地藏匿并销毁了这份外务省报告书。将近4万人的血泪，6800多名客死他乡的生命，就这样被日本政府藏匿、隐瞒，似乎他们从来没存在过。

但是，这样一份由135份报告形成的报告书不可能一下子销声匿迹，日本社会上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份报告书的存。自5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在追问这份报告书的下落，但日本政府一直极力否认它的存在。

岸信介，是当年东条内阁中的工商大臣，可以说，强掳中国劳工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战后的东京远东国际战犯法庭上，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可在美国的包庇下，他随后被释放，50年代更是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日本首相。

1958年3月29日，岸信介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时曾经被问到强制中国劳工问题，面对咄咄逼人的诘问，岸信介强行狡辩，说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了解一切内情的岸信介这样撒下弥天大谎时颇为自负，他以为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证据已经被他们销毁。

可是，发生过的一切绝不会就这样消失，无论在什么

时候，正义和良知总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恰恰就是在当时的日本政府内，几位有良知的阁员悄悄地把这份报告书的副本保存了下来，交给了日本东京华侨总会，为历史留下了一份铁证。

50年中，这份厚厚的报告书就带着几万名中国男性公民的悲剧人生，带着6000多名客死他乡的生命，静静地躺在东京华侨总会里。它在沉默地等待，等待着尘封的历史被重新打开。

二 花冈诉讼

在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以东京审判最为有名。东条英机等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七名A级战犯，就是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走上绞架的。

当时的远东国际战犯审判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法庭，横滨BC国际军事法庭，在这儿受审的，是所谓BC级战犯。1946年至1948年3月，在这所法庭里进行的一场审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就是对制造花冈惨案的直接责任者的审判。这次审判，通过大量的人证物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日本企业鹿岛组残害中国强制劳工、制造花冈惨案

事实的存在，六名直接责任者被判刑，其中福田金五郎、伊势知得和清水正夫被判绞刑。

1945年6月30日，在日本秋田花冈从事奴隶劳动的700名中国强制劳工因不堪忍受鹿岛组的迫害和奴役发动暴动，遭到日本警察和监工的残酷镇压，100多名暴动劳工在镇压中牺牲了生命，这就是震惊了世界的花冈事件。花冈事件，是二战期间发生在日本本土的惟一一次由外国人发动的暴动，也是惟一一件在战后战犯法庭上被审判和被定罪的强制劳工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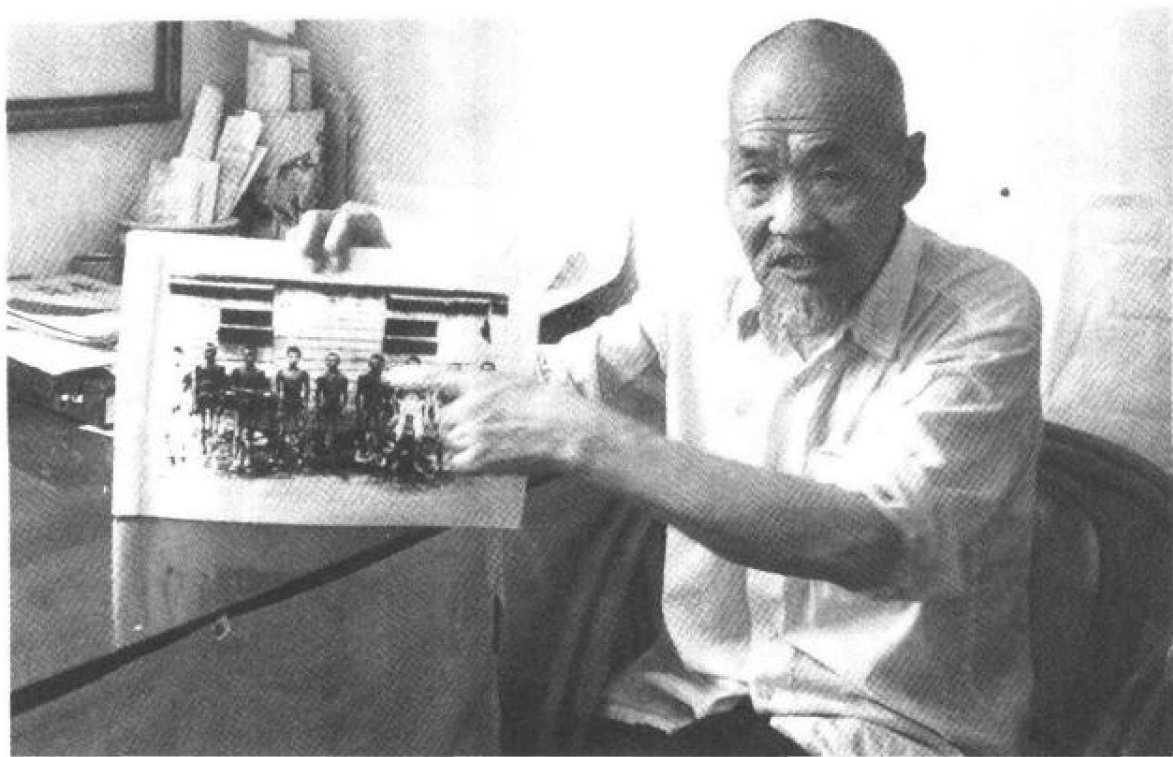
50年后，花冈暴动的幸存者走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对当年的加害责任者鹿岛组提出了索赔诉讼，又成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这一天是1995年6月28日，地点是日本东京地方法庭。

花冈暴动的领导者和花冈诉讼的代表者，是中国河南的耿谆。

耿谆，河南襄城人，1915年生，1932年参加抗日军队，1944年参加洛阳保卫战时负伤被俘，同年和300名难友一起，被日军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中山寮，在鹿岛组从事奴隶劳动，任当时的劳工大队长。

创立于1840年的日本鹿岛组，也就是今天的鹿岛建



花冈暴动领导者耿淳

设，是日本土木建筑行业里的代表性企业。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鹿岛组一直积极、主动、密切地为战争服务，实行着一条为战争服务、通过战争赢利的企业经营路线。

大馆市，是日本秋田县的一个小城，战时，这儿叫花冈町，是一座由铜矿山为中心而形成的小镇。铜资源对于战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日本内阁工商大臣岸信介，就曾亲自到花冈铜矿山视察、敦促生产。而为铜矿服务的河川工程，就是由鹿岛组承包经营的。



1944年8月开始，将近1000名由中国战俘和平民组成的强制劳工大军来到了花冈中山寮。

在花冈，中国劳工从事着超强的体力劳动，每天的劳动时间开始时是12小时，后来竟超过16小时，吃的是由苹果渣和橡子面做成的窝头，即使这猪狗一般的食品也不许吃饱，而大部分由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伤兵组成的日本监工，更是对中国劳工百般虐待。

残酷的严刑拷打、野蛮的人格侮辱、严重的食不果腹，让精壮的中国汉子纷纷倒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980多名中国劳工已有200多人死亡。余下的700多名劳工不堪忍受这非人的压迫与虐待，决意发动暴动，以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他们的迫害和奴役。

忠厚传家、为人善良的中国农民，如果不是实在承受不了非人的待遇，他们是会选择沉默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于是，耿谆以他的个人智慧和在劳工中的威望，当仁不让地被推举为暴动领袖。经过周密的部署，耿谆决定1945年的6月27日夜晚11点钟开始暴动。他制定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任何人不能走漏风声，先把日本人杀掉，然后，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轻装出发。第二步，从劳工们的住处，快速赶往前面的一个海汉，大部

队到海汉集合起来，等候日本人的包围。第三步，我们料到日本人必然镇压，到时候，我们站起来恶拼一场，投海自杀。”他们没有做跑出去的打算，事实上，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劳工也无路可逃。可700多名血性汉子还是下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即使跑不出去也要和他们恶拼一场，这样才能出出这口气，出出我们的愤怒之气。耿谆以一个军人的思维方式把作战计划安排得慎密而周详，但一切安排就绪后，暴动计划却从6月27日推迟到6月30日。

当一个秘密暴动计划被700多人知道后，推迟哪怕一分钟也意味着全军覆没，作为一个历经沙场的军人，耿谆和他的同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秘密要等40多年后才被揭开。

花冈暴动发生42年后，1987年耿谆老人重访日本。在迎接他的人群中，一位行动不便的日本男人握住耿老的手放声痛哭。他叫越后谷义勇，曾经在花冈做过监工，当时，劳工们称呼他为“小孩太君”。人们难以相信，当年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暴动时间推迟，竟是为了保护他和另外一位日本监工。

当年被劳工称为“小孩太君”的越后谷义勇和另一位被劳工称为“老头太君”的日本人同情过中国劳工，他们



曾经偷着给病号送过米送过面，曾经给中国劳工放过风，他们从未向劳工举起过皮鞭和棍棒。如果暴动发生时这两人在场，战斗中会发生什么？耿谆和他的同伴们经历了一次比制定暴动计划还要艰难的思想斗争。“不能伤害曾经同情过我们、善意地对待过我们的人”，身处生死边缘的中国人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找一个他俩不当班的时机发动暴动。日本监工轮流休班，而这两个人一起休班要到6月30号。



耿谆与日本首相村山富士会面

“30号，还得等三天呢，可怕人啊。”怎么办？“愣等三天吧，到30号。”耿谆当机立断。为了这两个曾经友好地对待过他们的日本人，700多名中国劳工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推迟了他们计划好的暴动。

我们不能说这次暴动失败和这被推迟的三天有绝对的关系，但正是这意味深长的三天，使我们看到了，即使在死亡面前，中国人身上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德也在闪着人性的光辉。

1945年6月30日夜，700多名身处异国他乡、手无寸铁的中国劳工以决死的气概在花冈举行了暴动。

10个人拿锄头，10个人拿圆锹，平日的采石工具变成了锋利的武器，被压抑已久的怒火刹那间爆发，在日本人眼里猪狗不如任人欺压的中国劳工突然之间变成了英勇无畏的战士，冲进了日本监工住的房间。被惊动的日本监工狼狈不堪地越窗而逃，拉响了矿山上的警报，一时间警报声此起彼伏。耿谆火速集中大队，带领大家按原计划向海边转移。

今天回忆起当日的悲壮情景，最难让耿老忘怀的就是那些被折磨得难以行走的难友。考虑到他们的身体，耿老最初不想让他们跟上大队一起赴死，但这些难友义不独生，

流着泪要求起义大队带上他们一起走。于是，所有活着的中国劳工们组成了一支奇特的队伍，向着死亡之路出发了。

耿谆和暴动大军上了一座名叫狮子森的高山，日本军警两万多人把山团团围住。经过七天的大范围搜山，到最后只有一个人没被找着。

当日本军警围上来的时候，耿谆自杀未遂，被日本军警抓住。

共乐馆，是花冈警察署前面原来用于演出的剧场，是一个广场。在暴动被镇压后，这儿变成了人间地狱。700多名劳工被迫跪在广场上，时间长达三天三夜，期间还要忍受日本军警的残酷殴打。100多人在日本军警的折磨下失去了生命。再加上暴动前在鹿岛组虐待下死亡的300人，花冈劳工共有400多人失去了生命。

而暴动领袖耿谆被日本法庭以战时扰乱罪判处死刑。那一天，是1945年9月11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有近一个月了。

战后，耿谆和幸存的难友回到了中国，终生生活在极度的贫病交加之中，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弃别人世。

在遥远的日本秋田大馆，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并没忘记当年在他们身边发生过的悲剧，他们把花冈暴动日6月

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自1952年开始，坚持每年在这一天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和各种纪念活动。

1985年，中国的报纸报道了大馆再次举行慰灵祭的消息。远在河南农村的耿谆老人看到后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给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当年的暴动大队长还在人世的消息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87年，在离开日本42年后，耿谆老人和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遗属重访日本，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1988年，以日本田中宏先生、律师新美隆先生为首的爱和平正义人士组成了中国人强制连行思考会，他们会同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一起，着力调查花冈事件真相，向日本社会宣传花冈惨案的历史事实，积极推动花冈事件的全面解决。

普通的中国民众也自发地投身到对同胞的声援中，河北大学刘宝辰老师率领他的弟子们利用假期跑遍了河北山东各地，寻找花冈惨案的幸存者。

1989年12月，100多名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遗属汇集北京，成立了“鹿岛组花冈强制劳动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联谊筹备会”，耿谆先生当选为会长。在这次大会上，幸存者及遗属以联谊会的名义公布了致鹿岛组的公开信，向鹿岛



耿飨与日本政治家土井多贺子会面

组提出了谢罪、建立纪念馆和向每位受害劳工赔偿 500 万日元的正义要求。公开信的公布，标志着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索赔正式拉开了序幕。

1990 年 6 月，耿飨、李介生、王敏等一行六人访日，7 月 5 日赴东京鹿岛建设公司本部，就公开信中的三项要求与鹿岛公司代表村上光春进行当面交涉，并发表共同声明。

在声明中，鹿岛公司承认对花冈惨案负有责任，并表示谢罪之意，对有关补偿问题，他们则称“因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决定留待今后继续协商”。

其后的四年中，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和律师新美隆等多次和鹿岛公司交涉，但鹿岛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搪塞，拒不承担责任和谢罪赔偿。

199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是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也是花冈惨案发生50周年。就在这一年的6月28日，在经过长达六年的交涉无果后，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代表把一份厚厚的起诉书递交了东京地方法庭，正式状告当年的加害企业鹿岛组，重申了谢罪、建馆、赔偿的三项要求，成为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索赔诉讼的第一案。

他们的代理律师，是东京新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新美隆。

1995年12月20日，东京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花冈诉讼，审判长为园部秀穗。到1997年2月3日，花冈诉讼共开庭七次。七次开庭中，鹿岛公司对当年的加害事实和责任百般推委，而法庭也充当了庇护被告的不光彩角色。在第七次开庭中，园部秀穗更是突然宣布中止审理，随即



拂袖而去。东京地方法院的粗暴行为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招致日本、中国和世界各地一片抗议之声。日本、中国各界人士纷纷举行抗议集会，1000多名日本正义人士联名致信日本国会，弹劾园部审判长，要求公正审理花冈诉讼。

在世人的普通关注和抗议之声中，花冈诉讼经过漫长的诉讼，终于等来了它的一审判决。

1997年12月10日下午2点30分，原告团代表耿谆、张肇国、孟繁武、赵满山在律师新美隆等八名律师陪同下，进入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

下午3时，民事13部裁判长园部秀穗入庭，面无表情地宣布：一、驳回原告一切请求；二、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三、如原告再上诉，附加期为60天。用了几分钟宣布了判决结果后，园部秀穗匆匆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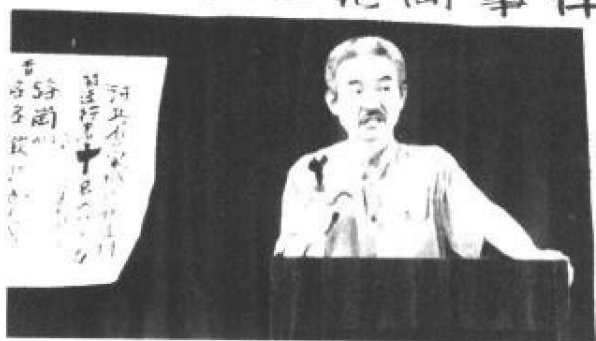
法庭的不公判决，震惊了日本社会，激起日本内外一片抗议之声。耿谆老人当场写下了“东京法院失公道，战犯鹿岛罪不容”的横幅，表达了中国受害者的愤怒之情和抗争到底的决心。

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主持下，新美隆全权代表原告与鹿岛公司达成和解，由鹿岛公司出资5亿日元，建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花冈诉讼遂告一段落。

花冈诉讼，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的第一案，今天回首当年的判决，可以看出它的宿命般的意义。可以说，正如它在战争50年后必然出现一样，它一审败诉的命运也是必然的。

但是，花冈只是第一案，仅仅是第一案。

真・証言を ——花岡事件



日本学者田中宏



花冈诉讼案日本代理
律师新美隆



三 山东农民刘连仁

花冈暴动幸存者诉鹿岛企业案，只是庞大的劳工损害案的一部分。在花冈受害者提起起诉近一年后，另一位中国农民走上了日本法庭，他的名字叫刘连仁，而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一回是强大的日本政府。

刘连仁，中国山东高密县草坡乡一位普通农民。1944年一个春天的早上，他啃着一块干粮，披着一件妻子还没来得及缝上领子的棉袄出门，被伪军叫到了村公所，随后被日本兵押解到青岛，同800名同胞一起被装入船舱，运往日本北海道的一个矿山做苦工。当意识到将被带离祖国的时候，这位山东汉子和他的同胞一起开始了反抗，试图逃离日军的押送，日兵的子弹在他的头顶上留下了一道至死也清晰可见的伤疤。

由此刘连仁开始了他的曲折颠沛的人生。

11月的北海道冰天雪地，连树木也冻裂了皮。200名劳工一天一袋半粗面粉，只能掺些野菜、橡子面甚至木屑，熬成稀糊，每人喝上一碗。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下井挖煤。每人每天要挖出2吨煤，完不成定量，不让吃饭，还遭毒打。塌方、掉煤块砸死砸伤人是常事。受了伤不给治疗，更



刘连仁 1996 年 7 月 15 日
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不准休息。中国同胞被砸死、累死、饿死、冻死，不到8个月，只剩下70多人。

次年7月，刘连仁和四个同乡难友不堪虐待，打伤了日本监工脱逃，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他们选了一个僻静的山沟，白天挖洞，夜里觅食。大雪封了山，几个人蜷缩在洞里，天气太冷，就从田野拣来纸袋子，用榆树皮缠成绳子绑在身上御寒；口粮不够，就自觉省俭，饿极了吃口海带、啃口土豆、舔口雪水，算是一顿饭。就这样熬过了第一个穴居的冬天。

在此前后，四个同胞先后被抓走，不堪忍受痛苦和孤寂的刘连仁上吊自杀，草绳日久腐烂，也断了他的求死之心：吃尽了苦头，为什么要落个这样的下场？不能死，要活下去！



刘连仁和救助过他的日本猎人夸田清治在一起

刘连仁把一年分成两季，下雪是冬季，化雪是夏季；月亮圆一次是一个月，太阳升一次是一天。他就这样盘算着日子，就这样在北海道的深山里度过了13年。直到13年后，日本猎人夸田清治进山打猎，无意中与他偶遇。

事实上，刘连仁逃进山林几个月后，日本就宣布投降，中国劳工也陆续被送回国。但在日本政府持有的劳工名册

上，尽管清楚地有刘连仁的名字，尽管在他的名下注明了失踪的字样，但当初下令把刘连仁掠来日本，因此对刘连仁无可争议地负有救助义务的日本政府，13年中却对刘连仁的生死不闻不问。

刘连仁的被发现在当年的日本社会引起极大的轰动。但当时执政的岸信介政府却要把他作为非法入境者扣留，招致中国政府和在日华侨的抗议。在日本社会各界和新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刘连仁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和他一起回来的，是几百名遇难中国劳工的骨灰。

13年的非人生活没有消磨刘连仁的铮铮铁骨。当刘连仁重现社会后，日本各界捐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钱，刘连仁分文未取，全部送给了当地的中小学。刘连仁回国时，日本政府迫于压力，也曾派代表到码头送行，并拿出一笔钱给刘连仁。“这钱是谁的？如果是日本政府的，我不要。”代表含糊其词，刘连仁一把推开，当即拒绝，并发表公开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对他谢罪、赔偿。

刘连仁就这样身无分文地上了船。尽管，刘连仁几乎目不识丁，尽管，刘连仁终生贫穷，但是，身为普通农民刘连仁以他一身的硬骨和正气，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尊重。

一别十几年，恍如隔世，夫妻重逢、父子相见时，儿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刘连仁与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

子刘焕新要迎接的是陌生的、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刘连仁被强行抓走时，他还在母腹中。“我和我母亲去了以后，我看我父亲很高的个儿在船的甲板上招手，听不明白，光‘呀呀’的，好像说的，祖国我回来了，别的听不清。下来以后，人山人海，跑不动，挤出去以后三个人抱成堆了，叫爹叫不出来，我当时可能是觉得使劲不小，叫声爹，但是谁也听不到，三个抱在一起，连我叔抱成一堆，就哭起来了。我母亲光顾了哭，光说这是你爹，别的不吱声了，都哭晕了。”

“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位有着非常强健的身体和坚强精神的人，我强烈感觉到，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在北海道的山野中，在严寒中度过13年。”日本律师高桥融这样评价他认识的刘连仁。

1995年，一个日本人出现在刘连仁面前，他就是日本东京文京协同律师事务所的小野寺利孝律师，他愿意无偿代理刘连仁向日本政府起诉。这一次刘连仁起诉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当时年近八旬的刘连仁知道，要想告倒强大的日本政府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在他有生之年，付出艰辛的努力却得不到任何赔偿，但刘连仁却毫不犹豫地开始了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挑战。因为这位普通的中国人也知道，他



所代表的，是受到战争伤害的所有的中国人。

1996年3月，刘连仁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一个普通农民对一个国家的诉讼就此开始。

从1996年提诉到2001年一审判决，其间经过了20多次开庭，刘连仁数次走上日本法庭，向法庭控诉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自己的残酷加害。而日本政府法务省方面的律师以高傲和轻蔑的态度，始终不置一辞。他们以为，有了前面的花冈败诉，即使铁证如山，原告也奈何不得他们。

诉讼不仅仅在法庭。诉讼期间，刘连仁不顾年老体衰，多次往来中日两国之间，广泛接触日本各界民众，把自己受害的事实告诉日本社会，同时表达了中国人民愿意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

2000年9月，刘连仁老人终于走完了他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击碎了一个农民过平安日子的梦，把他抛进了无尽的人生苦难之中。而这苦难也造就了这位老人，使一位普通的农民变成了一位和平的斗士。

临终前，这位一生命运多舛、受尽欺侮和奴役之苦的老人拉着儿子刘焕新的手留下三个遗嘱：“第一，我打这个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全国劳工，是为了中国争口气，我不行了有你，你不行了再有你儿，子子孙孙打下



刘连仁父子赴日本诉讼途中

去吧；第二，协助律师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他们帮助我们，也是为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目标一致，所以咱们都拥护，我到日本四五次了，一次比一次的朋友多，一次一次支持我们的越来越多，这就是力量；第三，我没留下什么财产，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有这三气就是人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你一定能打赢官司，就有人来支持你。”就这样，刘连仁把积了一生的人生经验化作宝贵的遗训留给了儿子，也留给了我们。

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第14民事部门口记



者云集。这一天，刘连仁诉日本政府强制劳工案将一审判决。刘焕新捧着父亲的遗像走上了法庭，把刘连仁的遗像恭恭敬敬地放在原告席上，让九泉之下的父亲亲耳听到法庭的判决。

法官以极大的同情谈到了刘连仁受害的事实。在此过程中，代表日本政府出庭的日本法务省代表和律师始终一声不响。与此同时，在法庭外，数年间一直坚定地和刘连仁站在一起的日本朋友正在忍受着等待的折磨。

法庭对刘连仁的受害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认定。对于战败后刘连仁13年的逃亡生活，法庭以日本政府怠慢救济义务为由，判定政府向刘连仁支付全额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对于政府方面主张的除斥制度，法庭认定，在本案中引用除斥制度，则显著违反公平正义的理念，因此驳回了国家的主张。

也许，有了这样的字眼，才有了全面的胜诉的基础。此时此刻，律师和支持会不少人相拥而泣，为正义、为长眠的当事人、也为几代人的努力。

长期致力于劳工诉讼的日本律师小野寺尝到了他做律师35年来最甜蜜的一枚果实。“我是一个自信的律师，我曾在很多起损害人权的诉讼案中取得胜诉，我是带着胜诉



报道刘连仁胜诉的报纸

的信心进行这场诉讼的，但全额接受原告的要求，还是超过了自己的想像，我当时满怀激动，几乎流下泪水，非常感动。”

如果不了解他们数年的艰辛和遭受的挫折，就很难理解他们在这时刻的感受和激动。但是，刘连仁没有能看到这一切。在那一时刻，小野寺律师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了遗憾：“令我特别感动的并不是因为金钱，法官在判决中，

把刘连仁13年间，在北海道的山野中遭受的痛苦，将他逼入这种境地的日本战后责任，日本政府，抓掳和强制劳动的犯罪联系到一起，在判决中认为2000万元是很低的，指出损害实际超过了2000万，这真的打动了我的心。我是多么希望已经去世的刘连仁，能够听到这个判决，希望把这个判决奉献给他。”

高桥融律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则说：“我们是把是否认定事实，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从这点上来说，根据以前的审理情况，我们觉得法官对事实有明确的判断，我们取胜了。但没想到胜利到如此程度，首先是对全额2000万元感到吃惊，无论什么诉讼，判决时都会将原告要求的金额往下压，所以说这是全面胜诉。宣判时真的是全场鼓掌，这种场面是很少见的。”

刘连仁初审胜诉的当天，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律协就发表了声明，对于这个判决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日本律师团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政府放弃上诉，承认判决。但是，在一审中一直保持沉默的日本政府，这次的反应却迅速而明确。判决下达的10天后，日本政府于2001年7月23日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针对日本政府的上诉，日本律师团、日本左翼组织、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中国律协及外交部发言人都发表了声明和谈话，对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不谢罪、不赔偿的立场表示遗憾和抗议。

目前，刘连仁诉讼案正在东京高等法院审理。原告律师团正以更大的热情、更加倍的努力，准备在东京高等法院再一次战胜日本政府。为此他们发动了百万人签名运动，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高等法院感受到正义之声，给二审的胜诉，加上一块重重的砝码。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过程中，刘连仁的声音会一直回荡：“我死了有俺儿，有俺孙子，子子孙孙把这事要解决！”

四 福冈胜诉

福冈，是位于日本南部的一座美丽城市，2002年4月26日，它吸引了中国、日本乃至全亚洲的目光。

这一天的主角是两位来自中国河北的农民，张五奎和杜宗仁，一位，76岁，另一位，74岁。一生默默无闻的他们，在遥远的日本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和世人关注的中心。

60年前，张五奎和杜宗仁都还是普通的农家孩子。和其他4万名被强掠的中国劳工一样，他们从家中被拖走，被绳子勒住、被刺刀顶着、五花大绑送到了火车站。塘沽是

他们记忆里对故乡的最后一瞥，从那儿，他们飘洋过海来到日本，到了福冈这个地方。奴役他们的企业，名字叫三井。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三井这家日本企业，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它的子公司。但可能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是如何发家的。

三井公司是个很特殊的公司，它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军方背景。在战争时期它和日本军队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事着为战争服务、通过战争赢利的企业生产活动。

这个企业当年生产的优质煤主要是用来制造化学武器。中国劳工来到这样一个企业里，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的煤，被用来制造武器去杀害自己的父老和妻子儿女。

三井是当时使用中国强制劳工的大主顾，其数量仅次于日本海运行业，获得中国劳工 5517 人。其中，三井矿山所属的三池获得中国劳工 2371 人。平均年龄 31.7 岁，年龄最小的只有 13 岁。由于待遇恶劣、营养不良以及超强的劳动，劳工很快出现死亡，皮肤病和失明更是普遍的现象。

至战争结束、劳工被遣送回国的时候，三井三池共死亡 382 人，死亡率达到 16.1%，三井矿业所属的西山坑竟达到 22.5%。

日本战败后，幸存的三井中国劳工和其他苦难的工友一起被遣送回国，没得到任何补偿。回国后，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他们在风雨中等待一双双援助的手。

康健，北京方圆事务所律师。自1995年起，康健律师就一直置身于中国战争受害者调查和起诉工作。这一次，她伸出手去，拉住的是一个叫张宝恒的老人。

在一次去河北易县调查其他劳工情况的时候，康健律师在路边被他拦住。这位老人，在北方12月份的寒风里，坐在马路边上，愣是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盼来了康健这位来自北京的律师。来自北京在那一瞬间变得分外重要，他寄托着一个受害的老人全部的希望。

在老人简陋的农房里，张宝恒爬到炕上，直立起身子，从他那个几乎要碰到头的破旧不堪的房间梁上，取下一个破书包，拿出一个破本子。那是一个破旧不堪、泛着霉味的方形本子，是手工缝合的，里面的纸张全是按公斤买的废纸，张宝恒老人在这个本子上，用工工整整的字迹，记下了自己60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

面前两眼放光的老人，那个发黄的本子，和那些一笔一划记下的往事，深深地打动了康健律师。她回到北京后

难以释怀，立刻和日本律师取得了联系。

康健律师这一次和张宝恒老人的见面，促成了福冈劳工案的起诉。

2000年5月，以张宝恒、张五奎、杜宗远等15名中国河北农民为原告，向福冈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日本政府和三井所属三池矿山，要求他们为当年强制使用劳工的行为正式谢罪、道歉并做出经济赔偿。代理他们诉讼的是以尾山宏先生为团长、小野寺先生为干事长的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补偿事件日本律师团所属福冈律师团。中方律师是北京方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健。

福冈案的起诉在劳工案中是比较晚的，但是法庭的态度却比较积极，审理的速度也最快，几乎每个月开一次庭。而带来这种变化的，是诉讼内外关心劳工命运的人们的积极努力。

岩佐英树先生是福冈宇美商业高中的一位普通教师。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业余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调查中国劳工的情况。1991年，岩佐英树意外得知他的学校所在地宇美町是强掳中国人的地方，作为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一种责任感和负疚感驱使着他招呼他的学生们和自己一起展开调查。战后长大的孩子们觉得这个故事过于沉

重，岩佐先生谆谆善诱地对他们说：这是历史，你们应该知道。从那时算起，12年中，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的调查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岩佐先生带着他的学生们找到东京华侨总会，见到了那份《外务省报告书》。冷冰冰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有姓氏、有家庭的名字，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面对着这些已经发黄的纸片，孩子们觉得这些名字和自己有了某种感情上的联系。

岩佐先生和他的学生们把5 0 0 0多个名字抄回来，按报告书上的地址给中国发信。5 0 0 0多封信发出去了，等到的只有一封回信。回信的落款是67岁的吴文明，一位劳工的儿子。接到这珍贵的回信，岩佐先生欣喜若狂，立刻动身到中国，看望了吴文明先生。令他想不到的是，吴文明的母亲还健在，当年已经97岁。当他和吴先生交谈的时候，这位劳工的妻子一直仔细地在一旁听。当听到自己的丈夫是被强掳到日本并最终死在日本的时候，她苍老的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原来，当年丈夫不明不白地突然失踪，妻子带着儿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她茫然的心里，一直以为丈夫嫌弃自己离家出走。今天知道了丈夫是有家回不得，60年的石头才顿时落地。这位妻子脸上的笑容，比



河北劳工张宝恒

泪水包含了更多的辛酸。

在福冈，像岩佐先生一样的日本人不只一个。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劳工在福冈的悲惨遭遇逐渐被披露，并被当地媒体广泛宣传。事实证明，这给以后的诉讼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而在中国，也有那么一批人，为了历史的公道和医治战争的创伤而奔走着，努力着。

王子安，山东潍坊人，12岁被掳到日本做劳工。数年间王子安老人一直自费做着劳工调查。

王小扶，河北正定县农民，当年当日本士兵强掳王小扶的父亲去做劳工时，王小扶只有五岁。只因这个五岁的孩子抱着父亲大哭，凶残的日本士兵就朝她肚子上捅了一刀，至今还留有清晰可辨的伤疤。童年的经历造就了王小扶刚烈的性格。10多年来，王小扶就靠双脚，靠自行车，在河北和山东的乡村土路上奔走、呼吁。经她手找到的受害劳工有3000多人。

刘宝辰，河北大学副教授。自1985年以来，刘宝辰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开展了劳工调查。他们的工作，为日后中国劳工的诉讼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为了法庭上的最后胜利，2002年3月，日本律师团再一次来到了中国，为法庭做最后的录相取证。

中日两国律师来到了原告张宝恒的家，来看望这位老人。张宝恒的老伴，已经在贫困中去世，留下老人自己苦度暮年的光阴。自老伴去世以后，张宝恒就开始蓄起了胡子，在苦难的一生中，暮年中发生的诉讼，成为这位老人

生活中最大的事。这一次日本律师的造访，给这位老人带来了长久的激动和期盼。

这些日本人来到中国的农村，深入到中国普通人的中间，和这些曾经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中国受害者们，真正的近距离接触的时候，这些老人们才消弥了埋藏心底几十年的仇恨。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成了朋友。

在北京，康健事务所里，康健郑重地把中国 800 名律师的签名，交到了日本律师团的手上，表达了中国律师呼吁福冈法庭正视历史，重视民意，尊重法律，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给中国原告一个公正判决的意愿。

2002 年 4 月 25 日，两位中国老人张五奎和杜宗远作为原告代表远赴福冈。在他们身后，是当年难友期待的目光。

60 年后，重新踏上这块让他们永世难忘的土地，当年的精壮少年，已经是满头华发。走在福冈的大街上，这两位中国农民仍然是贫穷的、寒酸的。但和 60 年前相比，他们的地位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猪狗不如的支那苦力，今天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

而当两位老人被日本记者问到对他们的儿子、孙子怎样介绍日本人的时候，张五奎的回答代表了中国农民最大的宽容和最善良的心地：“日本人民不坏，总是好的，旧账

是要记在发动战争的战争贩子身上的”，对于孩子们，他们灌输的不是仇恨，而是不能忘记历史。

4月26日中午一点，福冈地方法院正式开庭。

在法庭上，木村元昭裁判长宣判，日本政府和三井矿山共同对当年强掳中国平民到日本从事奴隶劳动负责，并判定三井矿山赔偿张宝恒、张五奎等15名中国原告每人1100万日元。但仍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要求。在战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中，这是自中国山东农民刘连仁2001年7月胜诉后的第二次胜诉，同时也是中国强制劳工集体诉讼中的第一次胜诉。

对于判决结果，康健说：“判决中强调了侵权行为是由国家和企业共同策划和共同实施的这一点，是对此前的判决的超越，但也有遗憾之处——确认了这种违法行为，判决了三井公司来承担责任但是没有判决三井公司向受害者赔理道歉，我觉得很遗憾。”

福冈律师团团长肋木丰地认为：“这次判决首次承认了以往没有被承认过的日本残酷奴役中国人的事实，这次判决还首次判定企业应对原告进行赔偿，更有意义的是，在这次判决书中，法庭首次以明确的语言，认定1972年中日

恢复邦交时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政府间的战争赔偿，民间赔偿并不因此而被放弃。可以说，这是日本法庭首次认定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有对日本加害行为的个人请求权。这一认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福冈劳工胜诉，成了日本社会的重要新闻，各大媒体都给予了充分的报道。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以及《夕阳红》栏目中给予了全面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但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在判决第二天就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而中国原告和日本律师团也针锋相对，在胜诉后的第二天，便来到日本外务省，对政府官员提出了严厉的责问。面对他们义正辞严的气势，日本政府官员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千方百计搪塞、推委。

三井公司当天就召开了高层会议，做出了“三不”的决定。即：不谢罪、不赔偿、不和解。可以预料，在二审中，原告方和日本政府以及三井矿山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中日两国民众在日本集会声援福冈诉讼

第三章

慰安妇诉讼案



从今以后她们只是一片片孤独叶子，
 在干枯的枝丫上纵身一跃，
 下面是崖后的茫茫云海，
 云海下面是陆地是深渊还不知道。

——题记

一 一个罪恶的诞生

当我们在上海寻访到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时，它的名字“大一沙龙”就永久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跟随着里面弥漫出来的一种经年缠绕的阴气，我们仿佛瞬间就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它的建立年代1932年1月。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女性为战争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不幸就落户在中国，落户在繁华热闹的大上海。而日军慰安妇制度，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也便由此被揭开。这个和侵略战争相伴相生的畸生物，成为一个个女性灵魂深处最不能触及的盲区。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到达上海，几天内发生多起强奸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

疯狂的强奸和纵欲，造成了日军中性病大流行，战斗力急剧下降。为了防止性病的流行和搪塞外界对日军的指责，也为了缓解日军士兵在战争中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满足他们急躁释放的兽性，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司令白川义则的首肯之下，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占领区建立慰安所。日军在侵华部队中建立慰安所由此开始。从此，由日本政府和日本

军部有计划按比例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出台了。而对于自己亲手创立慰安所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瘤，冈村宁次一直自鸣得意。在日军战败返回日本的轮船上，他曾经亲口对记者承认：“我是无耻之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

慰安所在上海建立之初，有效地制止了日军军纪的崩坏和性病的流行。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看到慰安所对侵略战争所起的巨大作用，便正式确立慰安妇制度。对慰安妇，



摄制组采访日本国会议员

开始是征召，但由于报名者不踊跃，便采取诈骗、抓捕、强逼等手段，把大量良家妇女囚禁在慰安所，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长年从事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研究。他介绍说：“日军在中国的慰安妇制度非常的完善，这种完善甚至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于有些前线的很小的碉堡，都配备了慰安妇，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都有日军的慰安所。仅在上海，这个日军慰安妇制度发祥的地方，可以确认的日军的慰安所有90个，在海南岛有60多个，在南京、武汉有60多个。”

侵略战争，给被侵略者带来了巨大的肉体上、精神上、财产上的伤害，但令侵略者始料不及的是，侵略战争，也同样给侵略者带来了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和无法排解的焦虑、恐惧。同时，正是在侵略战争中，侵略者身上潜伏的兽性得到了无所顾忌的释放，以致于曾经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的日本军队，变成了野兽的集团。那一张张年轻健康的面孔，也许，在家里，他们大多是安分守己的、没有劣迹的好青年，但一旦投身于侵略战争，他们就变成了以杀人为乐的、渴血的、残暴的、没有人性的恶魔。正如他们需要以杀人来释放他们的兽性，掩饰他们的胆怯和空

虚一样，他们也需要用对女性的征服、强奸来缓释他们恐惧的、焦灼的内心。

中日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便大多设有慰安所，日军侵略铁蹄所到之处，慰安所也星罗棋布。

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在深入，慰安妇制度也不断地完善、发展，以致于形成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从朝鲜半岛直至东南亚和菲律宾，从缅甸到印度尼西亚，一个完整的军事慰安网络也大张旗鼓地铺开着。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个罪恶竟发展到如此成熟的地步，日军慰安妇制度可能是惟有的一例。



中国性暴力受害者郭喜翠



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

二 裴凤基的故事

慰安妇制度，人类文明史上的罪恶毒瘤，在被日本政府刻意隐瞒了50年后，是如何被揭露出来的呢？

故事要从一个不幸的朝鲜女人谈起。

裴凤基出生在朝鲜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从小以在别人家干杂活为生。二战爆发后，她的家乡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裴凤基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改变。

当时，日本人正在到处强召慰安妇。他们对这个生活极为贫困的朝鲜姑娘说，他们可以把她带到南方去工作，那儿生活富庶，躺在香蕉树下张嘴等着，就可以吃到掉在嘴里的香蕉。天真诚实的她轻易地相信了这种谎言，辞别家人跟着他们上了路。然而，她并没被带去天上掉香蕉的南方，而是去了日本冲绳附近一个叫庆良间的小岛，远离祖国和故乡，成了专门为驻岛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那是1944年，日本的战局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对前途和命运充满了绝望的日军官兵们急需发泄内心的恐惧，而远离祖国和父母的裴凤基们就成为他们的性工具。之后她又去了冲绳本土。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据介绍，最多的时候，裴凤基和她苦难的同伴们一天要接待

秘 電 報 譯 六 八 三 三 日 中 國 領 事 館 一 二 四 四 一 五 分 會 館		17 0.14 1945	32
官 宛 發 信 者 名 灣 軍 參 謀 長		發 信 地	發 信 日 時
名 電 第 九 五 號		發 信 時 間	發 信 地 點
本年三月名電第六・二號申請陸軍定電第一八八號 認可・依ルホルホ才・派遣セル特種慰安婦五十名・ 開スル現地着後ノ實況人員不足ニ據業・堪ヘサル者 等ヲ生スル爲向二十名増加ノ要アリトシ左記列率因 部隊發給ノ呼寄認可證ヲ携行歸名セリ事實上 傳ガルモノト認メラルルニ付慰安婦二十名増加諒承 相文度 尚將來此ノ種少數ヲ補充交代増員等必要ヲ生ス ル場合ニ右ノ如ク適宜處理シ度豫メ諒承アリ度 左記 基隆市日新町二ノ六村附近 終 秘			

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密电

100 多个日军官兵。

1945年3月27日，美军在冲绳登陆，作为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们堕入更悲惨的境地。她们无家可归、没有食物、没有工作，还要受到日本士兵和美国占领军对肉体的蹂躏。裴凤基又沦为了美军的性奴隶。她成了一位没有国籍的“黑”女人，像狗一样生活着，居无定所，到处游逛，靠卖淫为生。

当冲绳在美国统治后政权再度返还日本时，裴凤基被当成了不法入境者，为了能继续生活下去，她申请特别居住权，在这个过程中，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对于她是怎样被带到日本来的进行了调查，结果她的慰安妇身份被确认。

裴凤基在战后沦为了“食娼”，乞食的街娼，是靠卖自己的性而换饭吃的乞丐，因为内心的强烈不安全感而四处流浪，开始了每天换一个场所，出卖肉体的生活。

裴凤基第一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她离开家乡几十年以后，这个时候的她已是风烛残年满面风霜。当地的一家小报报道了有这样一个朝鲜女人的存在，引起了日本女作家川田文子的注意，于是她前去拜访。当时裴凤基借住在甘蔗田中一处人家的房子侧面堆放物品的小屋里，“面积只有5平方米，屋子只有入口，没有窗户，也没有榻榻米，木板上铺的是尼龙席子，没有燃气，没有水，电是从主屋里扯了一根电线拉过来的”，女作家川田文子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至今都不会想到在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日本，却有这样一个生活得猪狗不如的女人。

比生活境况更悲惨的是裴凤基的内心。没有祖国、没有亲人。生活中遇到过成百上千的异性，却没有一个她的男人。裴凤基孤独、绝望，害怕人类，拒绝与人接触，并



摄制组采访韩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尹贞玉

患有强烈的自闭症。

于是，这位有良知的日本女作家川田文子，把裴凤基写进了她的书，这本名为《赤瓦之家》的书，用沉痛的笔触，记载了一位卑贱的、贫困的朝鲜女人裴凤基的一生。

不久以后，另一位和裴凤基同一民族的女人也前去拜访了她。她叫尹贞玉，韩国女子梨花大学教授，韩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也是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委员会的发起人，曾先后两次看望裴凤基。她回忆说：“我通过裴凤基信赖的一个叫池成子的人，好不容易约了一个小时，我到她家一看，房子又破、又旧、又窄，但非常干净，老人为了给我沏茶烧水，先后洗了四次手，接水放在炉子上后洗手，去看水开没开之后洗手，拿水后洗手，给我们倒水后洗手，这样一天洗无数次手。”而尹贞玉第二次访问裴凤基的时候她已经移居新地方，“那天是星期日，也是我离开当地的日子，心想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怎么喊也不开门，但我不甘心，试着最后叫她时，门打开了，只见她脸色蜡黄，身体十分虚弱，她有气无力地摆手叫我离开，好像就要倒下去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打扰她，觉得我给她添了麻烦，立即退出来，关好门之后，蹲在走廊里忍不住失声痛哭了一场。”

裴凤基拒绝一切人，包括来自祖国的亲人。在经受长期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裴凤基

兵站指定
慰安所
支那美人
第四日支親善館
是日沿河先方六〇〇米

日军慰安所的广告

的蹂躏和欺侮以后，这个被侮辱被迫害的女人已经对人类彻底绝望。她死于1991年10月的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去世前，她的邻居们听见她大喊大叫，唱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歌。

她就这样去世了，就像她从来没到过这个世界。但她生存过这一事实毕竟是有意义的。她用她的拒绝、她的自闭、她的无声无息的死亡提醒着人们，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一种文明社会所不耻的罪恶存在。

裴凤基的遭遇激起了韩国人民强烈的义愤。韩国慰安妇问题首先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尹贞玉教授从1980年开始调查韩国慰安妇问题，并于199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委员会，发动民众为解决慰安妇问题与日本进行长期的斗争。她们设立了一部热线电话，希望有当年的慰安妇受害者站出来，公布自己的身份。电话设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寂静无声，一年后，它轰然响起，宣告在战争结束近50年后，第一位活着的慰安妇受害者站出来了。这位勇敢的女性叫金学顺，当时她67岁。

在金学顺之后，姜德景老人也勇敢地站了出来，之后陆陆续续有214位老人站出来了，据统计，朝鲜有200人、韩国有214人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慰安妇受害者身份。这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

些老人提供了许多日军罪行的证据，成为日后提起诉讼的第一手材料。

1991年12月，金学顺和其他三位慰安妇受害者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正式道歉，并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这是历史上第一起慰安妇

要求赔偿诉讼案。

在法庭上，金学顺老人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是一个女人，可一生中从来没像女人一样生活过。仅仅是日本人的原因，我才度过了如此的一生。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解除心头的仇恨。”

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一直讳之莫深，当这一问题被披露于世后仍一再狡辩，日本政府官员数次表态，说慰安妇是民间色情业主和军队一起干的，是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日本官员的推委隐瞒，激起了亚洲各国受害者和民众的更大愤慨。

针对日本政府的抵赖、推委，日本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经过多年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在日本政府的档案里发现了大量当年日本政府和军队组织和实施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档案材料。

这些从未公开的档案向全世界表明，在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队曾经大规模地抢掠和拐骗韩国、中国、菲律宾以及它本国的女性，充当日本军队的性奴隶。

慰安妇问题的公开，激起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火山爆发一样的愤怒。

当慰安妇问题在亚洲各国受害妇女的揭露下逐渐暴露



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作为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国和实施地中国，它的受害者在哪里？

1992年4月7日，中国四名慰安妇受害者和三名原慰安妇遗属勇敢地站了出来，表明了自己或者他们的亲人的慰安妇受害者身份，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谢罪赔偿。中国大陆的慰安妇问题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据研究表明中国能够站出来证言的，大约是60人左右。她们大部分在农村，少量在城市，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山西、北京、山东、上海、湖北、湖南、云南、海南、浙江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相对一个庞大的受害群体，60多人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在一个深受儒教文化浸淫、重视女人名节的国度里，这60多个人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慰安妇受害者的身份需要巨大的勇气。正是她们代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姐妹发出了一声来自中国大陆的呐喊。她们用她们的苦难、她们所曾经遭受的耻辱，告诉慰安妇制度的确立者们，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没有无声无息地过去。

当中国大陆受害者加入到亚洲慰安妇受害者要求日本谢罪赔偿的行列里的时候，台湾媒体公开刊登广告，希望当年的慰安妇受害者到妇女基金会登记，公开自己的身份，

加入到斗争的行列里来。不久，三名台湾慰安妇受害者公开了自己曾经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身份。

接着，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都先后有慰安妇受害者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在遥远的荷兰，也有充当过日军慰安妇的妇女站出来，加入了斗争的统一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无路可退，1993年8月4日，对慰安妇问题一向持消极态度的日本自民党内阁垮台。在垮台的前一天，即1993年8月3日，日本政府发言人兼日本自民党主席河野洋平发表正式声明，第一次公开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确实采取高压和欺骗手段，征召亚洲妇女做从军慰安妇。

经过亚洲妇女长达数年的斗争，日军慰安妇制度这一历史罪恶在被隐瞒了半个世纪以后，终于露出了它最丑恶、最黑暗的一面。

三 山西慰安妇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60年前发生的由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民族大劫难中，到底有多少女人遭受到了金学顺、裴凤基同样的命运？有多少我们的同胞带着这样耻辱的记忆度过了她们苦难的一生？

从1991年开始，亚洲各国慰安妇受害者陆续站出来，公开受害事实，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罪恶，作为这一制度最大的受害国和实施地的中国却是一片沉默。一直到1995年8月，中国的女性受害者终于站出来，公布了自己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经历，正式委托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妇问题谢罪道歉，并做出经济赔偿。她们是来自山西的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刘面焕。随后，1998年7月，郭喜翠、侯巧莲大娘也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

倘若横拦在人们心间的沟壑，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填平——或是绵绵的情感，或是沉沉的灾难——那么，相近的痛苦和折磨，就这样缓慢地、一天一天地使一群中国山

西女人们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了靠拢了。她们手拉着手站在了一起，一同从黄土高坡走向了日本法庭。尽管受害的经历使得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只能依靠轮椅进入法庭，但她们从来没有像那一刻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有尊严的中国女性。

1942年，日军侵占山西，在孟县进圭村这个地方，驻



中国性暴力受害案败诉

扎着一个中队的日军。和他们在别处一样，日军驻扎下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抓捕附近的女人，以供日军官兵发泄兽欲。

刘面焕的恶梦发生在她16岁那年的一个早晨。那天，日本鬼子从进圭据点包围了阳泉村，几个日本人冲进刘家，强行让刘面焕出去开会，16岁的女孩子本能地躲闪着，日本兵上去就拉、就打，一边打一边拉，拉到门外院子里，刘面焕就被绳子捆住了，反抗的代价是更有力的捆绑和毒打，日本兵举着枪，把这个年轻的女子打倒在地上，然后捆着她，走向了进圭据点，关进了窑洞里。“关进窑洞里面，人家有看门的，不大一会功夫，日本人就来了，那还有什么好事，就把我糟蹋了，我不饶他，我就喊叫，我就说救人啊，救人啊，他们拿手巾把我的嘴堵上了，堵上我的嘴，你还不能叫唤，他们把我的裤子脱了，扔到地下，你想穿也拿不到，五个、五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两个，总共是七个，一共是来了七个日本人，人家起来走了，当时我就爬也爬不起来，我才16岁啊。”刘面焕讲到这里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就这样，在不知死活、无衣蔽体、无食果腹中，刘面焕一直被关了40天，直到日本人看到她实在已经濒临死亡了，才把她父亲叫来，这位父亲在被逼交出几十块大洋后，

才把奄奄一息的刘面焕“买”回了家。

黄土高原的窑洞目睹了那一幕幕人间悲剧，即使几十年之后，刘面焕依然记得那个伤心之地，几十年中，刘面焕一直回避着那个地方，是诉讼，使她终于有了勇气回到了那里，对着电视镜头控诉了日本士兵的罪恶。

李秀梅，刘面焕的同乡，她也是在自己的家里，当着自己亲爱的妈妈的面，被四个日本人强掳到据点去的。妈妈为救女儿出来，花光所能筹到每一块银元，变卖了自己住的房子，可依然于事无补，极度绝望之下，她拿着绳子在曾经和女儿乘凉拉呱的大树上上吊了，结束了自己苦命的一生。

窑洞里的罪恶一直被掩盖着，直到有一天，有一双年轻的眼睛注意到了它。

张双兵，山西省孟县阳泉村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调查当地日军性暴力犯罪的事实，走乡串户寻找着当年的受害者。在他亲人般的劝慰下，刘面焕等大娘才终于有了直面黑暗的过去的勇气。据张双兵的统计，仅进圭村一个据点就关押过30多个当地的女性。

30多位中国女孩子，小的13岁，大的20多岁，这



中国性暴力受害者
周喜香



中国性暴力受害者
侯巧莲

些大部分还没长成人的女孩儿一旦被关进来，就沦入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间地狱。她们不能回家，不能穿衣服，每天惟一的事情，就是满足日军无论何时需要发泄的兽欲，每个女孩子每天竟要遭受十几次强奸。

短则十几天，长则几十天的功夫，她们就被折磨得奄

奄一息，全身浮肿，流血不止。其中有的幸运者被允许回家的时候，每人的父母都向日军交纳了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大洋。原本健壮的女孩儿，此时家人不得不用筐抬或者用驴子驮，没有一人能自己走回家门。

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个叫侯巧莲的女孩子。当日军进犯她的家乡嘉占村的时候，她还是个虚岁14岁周岁13岁的娃娃。侯巧莲和她父亲一起，连同另外7女14男都被抓进鬼子据点。白天日本鬼子拷问她身为村长的父亲，拷问完了以后把他塞到坑洞里，晚上，就在那铺炕上，野兽般的鬼子就把这个13岁的小女孩轮奸了。

对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遭遇，侯巧莲和她的父母在战后50多年中都绝口不提，但村里人都知道她是曾经进过日军炮楼的女人。从此后，这段经历，就变成一个巨大的耻辱，刺在她的脸上，扎在她的心里。直到1998年她战胜了自我，勇敢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的法庭。从那时起，她仿佛又焕发了生命的希望。

不幸的是，1999年的4月份，侯巧莲得了脑血栓，还没来得及医治，前后不到5个小时就去世了。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以后，侯巧莲终于结束了她痛苦而无奈的一生。临死前，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日本政府

对她经历的苦难谢罪，说一声对不起。

如今的侯巧莲已经变成了一把黄土，几乎连坟墓都没有。卑贱者活着没有历史，死后没有坟墓。

在山西、在东北三省、在湖北、在南京、在上海、在海南，凡是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有侯巧莲遭遇的中国女性何止成千上万？她们身体上的伤口也许可以治愈，心理上的创伤一辈子难以抚平。刘面焕大娘曾经对我们说：“你们看见我还是个人，可是我不如人，泪是心上的血，你不痛就哭不了，掉不下泪来，经常想着那事情就哭了，自己一个人哭，你敢告诉谁？”

是啊，对大多数受害者来说，战争结束了，痛苦也就结束了，新的生活已经开始，而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从来没有过去。

刘面焕、李秀梅、侯巧莲，她们都不同程度的有精神疾患的症状，有的天天作恶梦，有的会半夜尖叫和哭泣，她们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对家人也不提。她们的子女不知道她们过去发生过什么，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过一段就会无缘无故地发疯。

曾经的受害经历严重影响着她们在中国农村的生活质量，更可怕的是还会遭受到社会的歧视，她们是村里人背

地里笑话的对象，承担着本不该她们承担的太多的压力和苦难。

为了揭露日本军队当年惨无人道的罪行，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历史真相，这些女人们拖着病弱的身体远赴东瀛。尽管，每一次回首往事，对她们都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折磨，但她们还是一次次参加日本市民集会，公开讲出自己的受害事实。从起诉到第一次宣判，其间经过了五年，五年中，她们多次往返中日之间。正是通过她们的控诉，越来越多的日本市民相信了他们原来不敢相信的事实。而对这些受害者来说，公开讲出过去的经历，是对郁积一生的痛苦的排解，受害的经历得到了别人的同情，也使她们走出了多



山西性暴力受害者刘面焕的家



性暴力受害者刘面焕



中国第一批站出来的
性暴力受害者

年来一直自觉有罪的心理阴影。

在长期的代理诉讼过程中，她们的中方代理律师康健女士也感到她的当事人精神面貌的变化，“我觉得她们和精神面貌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她们活下去的愿望强烈了，我们初次见她的时候，她们都说，闺女啊，我活着没意思，

我能活一天就算一天，能死就死了，死了倒好了；可是现在她说，我想活下去，我身体不好，你能不能给我找点药，我想要治一下我的病，我想活下去。”她们要努力活到胜诉的那一天。

2002年3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又一次以各种借口，宣布来自中国的性暴力受害者原告郭喜翠和侯巧莲败诉。得到败诉判决以后，康健律师亲自来到侯巧莲墓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九泉之下的她。为了这一天等待了几十年的她，九泉下对这个结果作何感想？

这次败诉，只是庞大的慰安妇诉讼案和性暴力受害诉讼案的一部分，此前的所有这类案件也全部以败诉而告终。和以前的败诉不同的是，这次的判决全面认定了被告受害的事实。历史正在艰难而缓慢地进步，而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以像侯巧莲一样的贫贱者的牺牲为代价。

四 最后的斗争

自慰安妇问题公诸于世，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妇女和人权组织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谢罪赔偿的斗争。斗争首先从韩国展开。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

摄制组到韩国采访时，正是一个星期三。星期三在韩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自1992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到韩国访问，一下飞机就迎面碰上韩国要求日本政府正式为强征韩国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谢罪道歉以来，韩国人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一直坚持在每个星期三到日本大使馆门前示威，要求日本政府谢罪道歉。星期三示威是慰安妇老人们的主要活动，星期



韩国受害者在韩国日本大使馆前示威

三示威是慰安妇们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和正式赔偿的活动。

韩国朋友介绍说，开始示威活动时，只有几人参加，可10年后的今天，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市民和社会团体参加，最多时有500多人。

姜德景老人是一位慰安妇受害者。继金学顺之后在韩国第二个勇敢地公开了自己受害者的身份以来，姜德景老人就积极地参加了星期三示威。在参加示威活动的过程中，

她得了重病，医生告诉她静养6个月。但她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坚持参加示威活动，从来没有缺席，直到晕倒在现场。

对这些一生生活在歧视和屈辱中的老人们来说，星期三示威活动，就是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的证明。

1992年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建议，要求联合国调查日军慰安妇问题，标志着慰安妇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同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常委会做出决议，对日军慰安妇问题展开调查，收集资料，于1993年夏天提交报告。

也就是这一年，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妇女在汉城召开亚洲联合会议，100多名妇女出席，会议成立了强制从军慰安妇问题联合组织。

同一年，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金信实带着慰安妇问题，访问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慰安妇受害者金相姬老人出面作证，要求联合国按战争罪处罚日本，并依法予以赔偿，提出了让日本政府公开谢罪，承认日军存在慰安妇问题，依法赔偿，惩罚责任人，树立慰灵碑等七项要求。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慰安妇问题成为大会关注的焦点，并对日本政

府提出了揭露事实真相、追究犯罪者责任、向受害者作出赔偿的要求。

而对于从军慰安妇问题，战后日本政府的态度一直是矢口否认。当大量事实和档案材料摆到面前的时候，他们又百般推委说是民间色情业主搞的，是一种商业行为。日本政府的态度，更加激怒了亚洲各国备受伤害的妇女。

1996年，受联合国委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官、斯里兰卡女法律专家科马拉斯瓦密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慰安妇情况的特别调查报告《女性与暴力》，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一致得到通过。该报告书尽管由于科马拉斯瓦密没到中国调查而有欠缺之处，但却认定了日军二战中强抓妇女，把她们当成性奴隶的罪恶历史事实，并对日本政府发出了查清事实、赔偿、教育日本国民等六项劝告。同时，报告书还认定了受害个人的要求赔偿权。

1998年6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保护少数者小委员会上，特别报告人马克道格尔提交了报告书，指出从军慰安妇制度是军队的性奴隶制度，敦促日本政府对责任人进行处罚，认真地谢罪，而且有必要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迫于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对慰安妇问题越来越强烈的

反应,1995年在日本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举行的纪念会上,日本首相村山富士以个人的名义对亚洲妇女做出了道歉。日本政府开始运作亚洲妇女和平基金,希望通过这种民间基金的形式,对受害妇女作出赔偿。

面对日本政府避重就轻,妄图通过民间补偿来逃避政府赔偿的行为,各国慰安妇受害者表现出坚定的不为金钱所利诱的气节。

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从开始运作就遭到亚洲妇女的强烈反对。被赔偿的对象纷纷表示拒领。基金的运作从一开始就面临尴尬的境地。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委员会委员长金信实告诉我们:
“韩国 200 名慰安妇的大约 170 名在世者中,只有 7 人接受了国民基金会的钱,个别慰安妇接受了国民基金 4000 万韩币,老人们想,我们还能活多久,所以有的动心了,毕竟她们生活急需要钱。金大中总统上任后,委员会积极要求政府拿钱,代替国民基金支付给老人,否则慰安妇们都去拿国民基金,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我们委员会还呼吁社会,除了政府,韩国国民也有责任帮助慰安妇。我们通过网络及各种渠道募集资金,又向每位慰安妇支付了 500 万韩币,这样向每一位受害者共计支付了 4000 万韩币,总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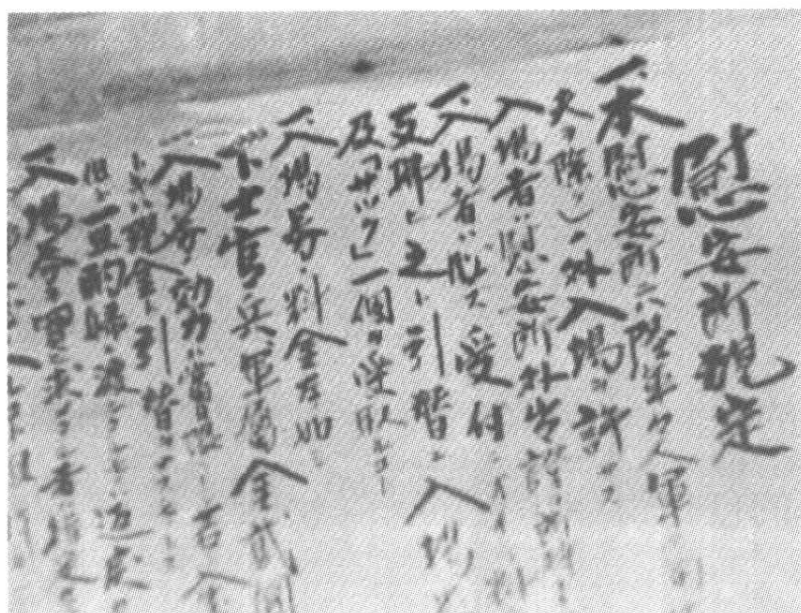
付金额相等于日本国民基金的金额，所以老人们再也不动摇了，也没有人再接受日本国民基金。”

在台湾，43名慰安妇受害者也全部拒领慰问金。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变卖了自己的书画，给予每位受害者3300万新台币的资助。

可以看出，在与日本政府拒绝向慰安妇受害者谢罪赔偿的态度做坚决斗争的同时，亚洲各国人民对勇于站出来的慰安妇受害者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关心和同情。毫无疑问，其中做得最好的当属韩国。

在韩国汉城城郊，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有一片名为“分享之家”的建筑。这儿就是韩国人为他们本国慰安妇受害者所建立的生活之家。韩国朋友告诉我们，所谓分享，是指韩国人民要与这些备受伤害又勇于站出来承认受害者身份的老妈妈分享灾难、分享痛苦、分享关怀、分享斗争的失败和欢乐。每位确认为慰安妇受害身份的老妈妈都可以在这儿享受完全免费的照料，每个月还有挺身队问题对策委员会发的补贴。在度过了充满屈辱和苦难的人生大部分时光后，她们终于在暮年可以安静地生活在关爱和同胞的亲情之中。

我们在“分享之家”还意外地碰到了两位近两年才从



日军“慰安所”规定



沦为慰安妇的妇女

中国回去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一个来自吉林，一个来自哈尔滨。两位老人在中国度过了苦难的一生，在摆脱了日本军队的控制后，又都在中国成了家，有了一大家人家。但在听说自己的祖国在尽力帮助和抚慰慰安妇受害者后，她们虽然放不下自己的子女，但还是割舍了亲情回到了祖国。在这儿，她们一生的创伤得到了抚慰，晚年的生活有了可

1993年(平成5年)8月5日 木曜日

慰安婦「強制」認め謝罪

総じて意に反し

調査結果 募集など甘言

政府公表



政府は昨日、慰安婦問題を中心とする戦時中のいかなる行為も正当化され得ないという立場を明確に表明し、慰安婦の募集などには強制的な手段が用いられたことを認め、今後、被害者の慰安婦の謝罪と賠償の促進に努めることを約束した。この声明は、政府が初めて公表したもので、慰安婦問題に対する政府の立場を明確に示している。声明は、慰安婦の募集などには強制的な手段が用いられたことを認め、今後、被害者の慰安婦の謝罪と賠償の促進に努めることを約束した。この声明は、政府が初めて公表したもので、慰安婦問題に対する政府の立場を明確に示している。

慰安婦問題に対する政府の立場を明確に示している。声明は、慰安婦の募集などには強制的な手段が用いられたことを認め、今後、被害者の慰安婦の謝罪と賠償の促進に努めることを約束した。この声明は、政府が初めて公表したもので、慰安婦問題に対する政府の立場を明確に示している。

日本政府首次承认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事实



靠的保障。但她们又陷入了另外一种人生的痛苦之中：对她们来说，中国，事实上成了她们的另一个祖国，而在那个国度里，虽然写满了她们的屈辱，但也有她们的亲人。年轻的时候，她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亲人，被抛进一个陌生的国度；暮年的时候，她们回到了祖国，却又被迫和自己另一个祖国和亲人再度分离。见到我们，她们像见到家里的亲人一样，泪汪汪地抓着我们的手，不停地打听中国的情况，但当我们问及她们在中国的家人的时候，她们又惶惑地别开脸，顾左右而言他。在那一刻里，我们似乎窥见了她们矛盾而痛苦的内心。

成立于1990年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委员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从1993年开始，她们要求韩国政府制订暂行法规，由政府负责向慰安妇们支付生活费，并敦促国会通过了每月向老人支付25万韩币的法规，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现在该款项已经提高到53万韩币。

另外，从四年之前，委员会开始招募为老人服务的志愿者。她们对志愿者进行4—6周的教育培训，培训期满后，志愿者与老人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帮助关系，志愿者们每周探访一次，每两天通一次电话，老人们需要帮助时，志愿

者们随叫随到，交通费由委员会支付，保证老人们过着平安的生活。

会长金信实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介绍，“医生说，心病很难用药物来根治，这些老人们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不相信他人，对发给他们的生活费不满足，对金钱表现出不该有的贪欲；她们还感到孤独，不相信和讨厌男人。为



日军慰安所

了抚慰老人们受伤的心灵，我们委员会经常组织旅游、跳舞、洗温泉等活动，想尽各种办法让老人们高兴。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了不让老人们接受日本国民基金，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项募捐活动，慰安妇问题，现在在韩国已是家喻户晓，出租车司机们遇到慰安妇时，会免费提供服务。”

除此之外，在韩国，慰安妇所在的地方政府和自治团体，也提供相应的费用，所以老人们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生了病可在现代集团经营的医院，享受免费治疗。韩国国内已形成了关心照顾慰安妇的气氛，老人们都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星期三示威活动，很多学生都是自发前来参加。

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是韩国政府和团体做得再好，也无法医治老人们心灵深处的创伤，老人们还是要等到日本政府公开认罪、依法赔偿她们的时候，才有可能消除心中的怨恨。

2000年12月，一个特殊的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这就是由亚洲几个国家妇女组织发起的女性战犯国际法庭。这个民间法庭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真相、查清慰安妇制度的责任、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慰安妇问题和国

际上的呼声，尽早解决慰安妇问题。

法庭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当年组织和实施了从军慰安妇这一现代性奴隶制度，抓掳和强迫大量无辜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给亚洲各国妇女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最后，法庭认定，在日军慰安妇问题上，“天皇有罪、日本国有罪”。

这是来自民间的审判。它不具有任何实际上的法律效力，但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拒不认罪的日本政府被这次审判钉在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日军慰安所



第四章

南京大屠杀诉讼案

The Harsh Facts Of an Atrocity

NANKING, From C1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is absent from almost every textbook. Few non-Chinese other than scholars and specialists remember that 60 years ago this month—four years before Pearl Harbor—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ran riot in the then capital of China, now known as Nanjing, hacking apart in eight weeks between 260,000 and 350,000 people—far more than died in Hiroshima and Nagasaki combined. Chang finds the global amnesia obscene.

An estimated 80,000 Chinese were raped during those eight weeks, including young children, most of whom were then grotesquely mutilated or killed. Unlike the Nazis, who tried to hide or at least obscure the scope of their atrocities on civilians, the Japanese flaunted theirs in full view of horrified foreigners with cameras, most of whom tried futilely to stem the slaughter, even as they recorded it on film.

And unlike modern Germans, who have based their society on the bitter lessons of the Third Reich, the Japanese today still have shrines to some of their war criminals. Their failure to acknowledge and apologise for many of their atrocities in World War II still stains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Asia.

Only a handful of Japanese were ever tried for the Rape of Nanjing, for example,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day has done its best to erase it from history," Chang says. Officials try "to deny all this ever happened, or say reports like mine are exaggerations," but she found such "appalling and overwhelming documentation" that she faced a peculiar problem:

"The Japanese took systematic pleasure of what they did



BY MICHAEL JOSEP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The Japanese had "a policy of extermination, pure and simple," says "Rape of Nanjing" author Iris Chang.

writing that came in contact with some Chinese American activists, one of whom was producing a TV documentary about Nanjing. They invited her to a 1994 conference in Cupertino, Calif., held by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在一切差异之外，人类拥有共同的分母。

——题记

一 两个人的的一生

1995年8月，在日本正义人士的帮助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为60年前日本政府和军队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谢罪、赔偿。代理此案的，是曾经代理过家永先生教科书案的尾山宏先生以及以他为团长、小野寺先生为干事长的中国人要求赔偿事件日本律师团。

南京，中国一座美丽的江南城市，曾经承载了六朝古都的烟雨红尘，然而，它也注定要和一个恐怖而又耻辱的数字永远连在一起：300000。阿拉伯数字3的后面跟着五个零，这一长串的零表示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犯下的罪恶。在多年以后，它的加害者试图把所有的零抹去时，谁能帮受害者找回那永远失去的父母高堂、兄弟姐妹、娇妻幼子，谁又能开启那座城市曾经安享天伦的万家灯火？

南京大屠杀诉讼案的原告是两位中国女性。

李秀英，南京市民，当年，她还是一个19岁的、怀有6个半月身孕的少妇，南京大屠杀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让她终生难忘。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当日本士兵像野兽般涌进南京城时，李秀英和许多妇女躲进了一座楼房的地下室。不一会儿，几个日本士兵冲了进来，把一个个年轻的女性从李秀英身边拖走，当两个日本士兵过来拖李秀英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面前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居然一下子把其中一个士兵的刀抽了出来。

两个五大三粗的武装男人和一个手无寸铁的孕妇开始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很快第三个武装的男人也加入进来。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面前的女人竟然有这样的生命力和血性：笨重的身体被他们抡来抡去，刺刀在她身上扎下一处又一处冒着血的伤口，李秀英却死死地抓住刀不放，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反击。三个日本士兵被她的勇气吓怕了，征服了，在李秀英身上捅了37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拖走她的努力。

李秀英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命若游丝，她那苦命的还不到7个月的孩子还没有看这个世界一眼就被埋进了坟墓。一个年轻的医生在她脸上缝了18针之后，她第一次见到了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几天之后，马吉又来了，带来李秀英后来形容为“一个像手枪一样，长长的一个嘴子”的东西，正是这个她喻为“长嘴的手枪”的摄像机，为

日后李秀英重新站在日本人面前提供了最原始、最鲜活、无法篡改的证据。

当日军攻陷南京的时候，夏淑琴还是个七岁的孩子。一个七岁的孩子对世界的印象还是模糊的，而她却目睹了人间最恐怖残忍的一幕。

那时候，夏淑琴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家里有父母、外祖父、外祖母、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共9人。9人的大家庭在一个中午家破人亡，只剩下一对苦难的小姐妹。

1937年12月13日中午，一群日本兵闯入夏淑琴家，一枪打死夏淑琴的父亲后，又把夏淑琴的母亲强奸后杀害，连母亲怀里一岁的小妹妹也没放过。年迈的外祖父母想保护剩下的四姐妹，被日本人当场打死，然后，夏淑琴的大姐和二姐被拖了出去。

当夏淑琴醒过来的时候，家里尸陈遍地，血流成河，亲人们都死了，只还剩下她和四岁的小妹妹。七岁的她和四岁的妹妹躲在躺满了死人的房间里，靠一桶锅巴维持着生命，一直呆了14天，直到被好心的邻居救出。

夏淑琴和妹妹进入“国际安全区”进行难民申报时，她一家9口被日军杀害7口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吉的注意。他在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李秀英

安全区内访问了夏淑琴的舅舅等人，询问了有关情况，还和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一起到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家中实地查看。马吉用摄影机拍摄了这样一幅惨状：断壁残垣的废墟前，站着一位年迈的妇女，老人悲戚的眼光望着眼前的惨景，两手无助地绞在胸前，从前景到背景，是一些横七竖八的尸体，老人右边芦席上，躺着一位妇女，左边同样的芦席包裹着一具婴孩的尸体……这张照片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收集，并在他的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

南京大屠杀以其前所未闻的残暴、野蛮，通过西方人明妮·魏特琳、约翰·拉贝的日记，通过马吉牧师的镜头，更通过像李秀英、夏淑琴这样的无数受害者的鲜血牢牢地刻在了人类历史上，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

1946年，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上，南京大屠杀成为被确定的法律事实。

让我们来听一段当时审判的原声带：

问：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2月期间，你在南京吗？

答：是的。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屠杀立即开始，以种种方式，人们被步枪射击机关枪扫射，数百人成群地被活埋，一名妇女对我说，他丈夫双手被缚，在她面前被



南京大屠杀受害妇女

扔进水塘，她被捉住，不许她去救，活活淹死在她面前。

那天，美国人马吉牧师的证词在东京的审判大法庭上空回荡，法官、律师、被告、旁听席，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从他高大魁梧的身躯中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

当天，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

但是，同为人类历史上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战后60年来，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一直被世界牢记，时时如警钟绕耳，而南京大屠杀却很少有人提及并渐渐的淡忘，在整个西方世界，南京大屠杀几乎从来没进入过人们的视野。南京大屠杀，渐渐成为被遗忘的屠杀。

李秀英、夏淑琴们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正如南京遇难者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所说，“在西方的媒体，长期就不谈二战中东方战场上发生的事，所以包括南京大屠杀，受害的历史基本上被淹没了。”两位老人的诉说谁在倾听？

当她们迈着暮年迟缓的步履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走向东京法庭的时候，她们期待的公正和正义惠顾到她们了吗？

1999年9月东京地方法院对李秀英、夏淑琴诉日本政府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经过法庭内外的斗争，日本法庭不得不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认定了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认为，日本国应该向中国人民进行真诚的谢罪。但日本法庭仍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没有请求的权利等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李秀英败诉了，这位中国老太太跟律师讲：“德国男子



汉站得起来，你们日本的男子汉站不起来。你做错了就要认错，你想赖掉是赖不掉的。”

二 为了被忘却的记忆

当南京大屠杀被普通民众渐渐遗忘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事实上从未遗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重整军备的努力，从日本政府重要阁员开始，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言论和行为一再地出现在日本社会的政治生活中。

1986年，南京大屠杀50年后，日本内阁文相藤尾正行撰文胡说，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是为了排除抵抗。

1988年，日本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成亮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此后不久，奥野成亮被迫辞职。

1990年，日本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

1994年，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发表谈话，同样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

面对已被东京审判认定的历史事实，日本数位内阁要

员却屡屡失言，宁可因此掉乌纱也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否定一段历史。为了重走战争老路，必定要美化侵略战争历史，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就这样成为了爱好和平的人们和鼓吹侵略战争的日本右翼势力之间的重要斗争。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日本内阁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删除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载的时候，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筑波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先生就以政府删改教科书违反宪法为由，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由此和日本政府展开了一场长达30多年的诉讼。30多年中，家永先生多次败诉，但家永先生孤独的身影始终安祥而坚韧地坐在法庭的原告席上，像一个战士，守望着一条线，一条人类良知的底线，一条战争还是和平的战线。

在经历了30多年坚持不懈的诉讼后，家永先生终于取得了胜诉，日本法庭判定日本政府删改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侵略战争的内容违宪。

在日本，近年来还有一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诉讼，那就是被中国人所熟知的日本前士兵东史郎的诉讼。当年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公开站出来指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的时候，日本右翼把他告上了法庭。这场诉讼，



尽管得到了日本进步人士和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并取得了有力的证据，日本法庭还是判东史郎败诉。

2002年11月29日，家永先生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诉讼以后长别人世。他用毕生的斗争昭示人们，人类的和平和历史的尊严，值得人们用生命去为之奋斗。

但家永先生是带着欣慰走的，在因他离去而空出来的原告席上，已经有人以同样的勇气坐了上去，这一次，是两位和他一样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中国老人，她们就是曾经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李秀英和夏淑琴。当李秀英被问到是否有胜诉的希望时，她坚定地说：“我想有胜诉的希望，我人活着，我没死，我就是活的证明人。我的孩子死了，我向他们要孩子，他在肚子里又没惹你们，你们把他戳死干什么，你们不是做错了吗？做错了你们就得赔礼道歉，赔偿我的损失。”

两个中国老人的诉讼，在事过60年后，再次把南京大屠杀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中国，为了使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至于被后代遗忘，也为了用更确凿的事实回应日本右翼的滥言，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调查考证和学术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

近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就率领

代表团到美国旧金山去办了展览，他们还到德国、波兰、丹麦去办了展览，也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各种传媒，让西方人开始了解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

在日本，许多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律师和社会活动家也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向日本社会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唤起日本民众的良知。

“日本现在的形象不是那么好，我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我经常说，如同人有自己的品格一样，国家也有自己的品格，我希望政治家、官僚，能够珍视国家的品格。”日本律师尾山宏直言不讳。

“为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很好的生存，这些事必须搞清楚，我的这种心情很强烈，所以说是爱国行为。”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这样解释他当初为什么要把南京大屠杀介绍给日本国民。

在海外，爱国华人华侨通过办展览、出书、举办各种会议的形式，努力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事实介绍给西方社会。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屠杀》一书，出自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之手。当年，这本书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前10名。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美国乃至西方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注意，把南京大屠杀从历史带回到现在。谈到自己用英文写这本书的原因时，张纯如说，“当我还是小姑娘时，我的父母向我讲述了南京大屠杀，随后我去了我们当地的公共图书馆，但没有发现一本南京大屠杀的书，这引发了我的好奇心。现在我已经写成了这本书，更认识到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它不用在教科书中披露事实真相，也不必做出赔偿，日本所受的国际压力，远远低于德国所受的国际压力。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年轻的人，即使中年的人，他们对当年二战的时候，在中国战场，日本侵华的一段历史都不清楚，只有少数的研究历史的人知道，一般的老百姓全都不知道。”

通过正义人士的努力，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正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铁的事实和国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引咎辞职，并在下台前被迫承认了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

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改了口，“我不否认南京事件发生过，也不否认我们做了错事，但在一个星期内，杀死30万人是不可能的。”

“不要讲30万人，就是3万人、3000人、300人，也可以把松井石根、谷寿夫这些战犯送上断头台。300人它也是大屠杀，我们不需要夸大事实，但是历史事实它是30多万人，它就是30多万人。”对石井四郎的说法，朱成山嗤之以鼻。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借助华人学者王鄂先生的帮助，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份电文：“几天前，自从回到上海以后，我调查日本陆军参与在南京和其他地区屠杀的暴行的报告。从目击者值得相信的口述，和很多可靠而又不必怀疑的个人书信里，得到让人信服的证明，日本陆军不仅以前，而且还继续表现的好像阿提刺王和他的汉军一样，不少于30万中国的老百姓被杀害。很多像没有血性的动物一样……

王鄂先生介绍说：这是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自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因此给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人数留下了一份可贵的、来自日本政要的证言。

1998年8月15日，在这个敏感的日子里，由松村俊夫炮制、相泽宏明发行、展转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一书在日本公开发行。在这本书里，松村俊夫公然否定南

京大屠杀的存在，对约翰·马吉、约翰·拉贝等西方人士留下的历史见证统统否定，同时，还指名道姓地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南京大屠杀诉讼案的原告李秀英和夏淑琴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假证人。

1999年10月16日，李秀英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村俊夫及该书的发行人相泽宏明、出版社公开登报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害费1200万日元。

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松村俊夫等被告支付名誉损害赔偿金150万日元，但对原告要求被告登报道歉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一审判决后，松村俊夫等被告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李秀英也以被告未登报公开道歉以及赔偿金太少为由，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经2002年12月5日、2003年2月4日两次开庭审理，东京高等法院于4月10日二审判决李秀英胜诉。

在战后的诉讼史上，这是自刘连仁胜诉、福冈劳工胜诉后的第三起胜诉案。它胜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李秀英老人的名誉侵害得到制止，更在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得到了日本法庭的又一次确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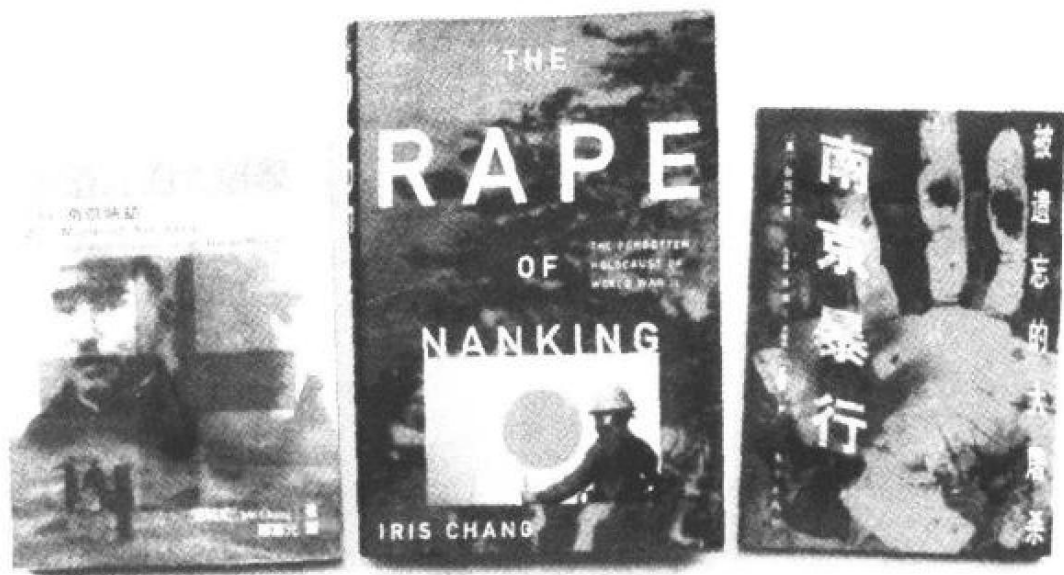
三 明妮·魏特琳

南京，又是南京。在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中还有一位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美国人。她的名字叫做明妮·魏特琳，她是基督徒、是传教士、是老师、是几个美国孩子的姑妈、是中国人眼中的观音菩萨，而后来却迷失在不知道她自己是谁的深渊中。

是什么把一位普通的美国女人和遥远的中国联系在了一起的呢？

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字华群，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一个贫穷的家庭。1912年，26岁风华正茂的她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合肥和江苏南京办学。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女子金陵大学任教，曾两度代理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从1919年到1923年，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是明妮·魏特琳极有创造力的时光，由她一手负责的金陵女大新的校舍、新的校园建起来了，那崭新的七八栋房子目睹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工作过程。她的学生越来越多，在度过了18年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的平静而忙碌的校园生活之后，1937年降临了，明妮·魏特琳的命运改变了。



美籍华人张纯如所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

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轰炸南京，绝大多数外国人都都在战火倾泻到这块土地之前及时撤离了。到了1937年11月，南京遭到空袭的次数越来越多，明妮·魏特琳劝走了身边的同事、朋友，让他们赶紧离开南京，而始终没有成家、单身一人的她却不愿意离开，因为她觉得金陵女大就是她的家，她要和她的家人一起经历苦难。尽管中国政府为保护外国人要求他们离开，美国的驻华使馆也要求他们回去，明妮·魏特琳还是拒绝了来自各方的三番五次要求撤离的建议。这时，有钱人都离开了南京，留在南京的

大多是贫苦的平民，面对他们惊慌无助的目光，明妮·魏特琳更加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早在11月17号，明妮·魏特琳就给美国大使馆提出，计划在金陵女大设立一个安全区，让贫穷的妇女到时候到金陵女大来栖身，她还请人去周围调查，到时候到底有多少妇女会到金陵女大来，调查的结果，大概有300余人。一有了结果以后，她马上就把校园中的中央大楼清理腾空，准备收容妇女。她那时还不是南京安全区的委员，但是她提



游人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出的设想跟当时南京安全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护那些无辜的难民，防止他们受到战争的伤害。后来的安全区倡议，把金陵女大正式作为一个安全区，专门收容妇女。魏特琳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很快就着手来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她跟校中三人委员会商议，决定腾出8栋校舍，包括已经腾清的中央大楼来收容2750个难民。这个数字是他们按每一个难民占地16平方英尺，除以8栋校舍的总面积大致估算出来的。

1937年11月，当日军逼近南京之际，留在南京的20多位美国、德国、荷兰、苏联等国人士，决定设立旨在保护无辜平民的“南京安全区”。安全区以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四面以中山路、汉中路、西康路、山西路为界，约4平方公里，为难民提供避难场所，并专门为此成立了国际委员会。南京沦陷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竭尽全力保护难民，还就日军的暴行多次向日本大使馆和日军当局提出抗议。然而，他们也遭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有人几乎被枪杀。但是，他们忠实、详细地记载了目睹的日军暴行，并在战后的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20多名西方人士就这样不顾本国大使馆的劝告，勇

敢地留下来成立了国际救济机构，他们是贝茨教授、乔治·费奇、刘易斯·史迈斯博士、上海保险公司德籍代表史波林、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牧师麦卡伦、约翰·拉贝等。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日军进入南京的时候，大肆烧、杀、奸、淫，没有几天，就把昔日的六朝古都变成了人间地狱。魏特琳怎么也没想到，日军是那么残酷、那么野蛮，日军进入南京第三天，在金陵女大避难的妇女就增加到4000人，那天，她在日记里曾写道：“这种重担我不知道还能承担多久，真是可怕得难以形容。”但是，没几天，在金陵女大避难的妇女就飚升到10000多人，早先设想的那种比较卫生的、正常的条件必然无法实现，在这期间，金陵女大收容的妇女最多的时候达到13000名左右。

想像一下13000余人挤在一所校园里会是什么景象。很多人都住在走廊里面，有时候没办法就住在草坪上，过道里面、厕所里面全住满了人。很多人都在传说，说金陵女大在收容妇女，还有一个外国的教授堵住日本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多的妇女都往金陵女大跑。金陵女大成了南京女性的挪亚方舟。

魏特琳日夜和她们在一起，席不暇暖，夜不能寐，身



南京大屠杀书籍

心交瘁地勉力保护着她们不被野兽般的日军拖走、强奸。但一个弱女子的力量怎么能抵御得住一个野兽的集团？魏特琳保护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妇女，但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无辜女性在她面前被带走、强奸、杀戮。

在每天目睹这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的同时，魏特琳还以坚韧的毅力坚持记日记，从8月15号日军对南京轰炸以

后，南京每天发生的事情，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把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寄回在美国的朋友，从而为人类历史上这场大劫难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她的日记里面，有她的喜乐，有她的愤怒，有她的悲痛，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强奸、轮奸中华妇女的残酷和野蛮，更看到妇女们的惊慌、悲痛和血泪。

不管多晚，她的打字机的清脆声都会从她的住处传出来，她把自己所见、所闻、所为，还有自己的感受，通过键盘敲击出来，有时还有复写纸影印本。

魏特琳是一个旁观者，她是一个美国人，站在人类的一个角度观察，在看中日之间的这场争斗，看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残忍的时刻。她要记录下人类的一个非常黑暗的阴影，她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思考，人类在文明进化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这本长达 70 余万字的厚厚的日记里，魏特琳如实记录了她在南京看到的一切。

以下摘录的是《魏特琳日记》的片断

12 月 14 日 星期二（南京沦陷第二天）

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国家犯罪，是违背上帝创世精神的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被飞机大炮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12月15日 星期三

除了中午吃饭以外，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索恩先生今晨过来告诉我们水西门那边的情况。随后，我们就让妇女儿童自由地进入我们的校园。同时尽可能地请求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许多人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坐的位置就行了。

12月16日 星期四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9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今晚，一辆载有8至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



明妮·魏特琳雕像



明妮·魏特琳墓碑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彻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

姑娘们吧！

12月17日 星期五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人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

12月19日 星期天

今天又有大批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涌入校园。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我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时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

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

12月22日 星期三

我突然感到没有力气了，这些天的紧张与悲伤使我精力耗尽。

12月26日 星期一

我昨晚决定——4个月来的第一次决定：我今早将不起床、不吃早饭、不参加祈祷、也不像平时那样去办公室，今天早上我要休息一下。

在那个早上，身心俱疲地躺在床上，明妮在想些什么？一个笃信上帝的人、一个相信真善美、相信人性的人，4个月来，每天看到的却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看到的是赤裸裸的兽性和毫无羞耻感的犯罪。

在那段时间里，明妮的日记也隔了几个礼拜都没写，一直到了1940年4月10号，她在日记最后一页里头说道，“我几乎精力殆尽，没法子再支持下去。”

1940年5月，疲病交加的魏特琳回到了美国。当她乘船返回美国时，她曾经几次想投海自杀。她的精神崩溃了，南京所发生的一切，让她感到无法再活下去。

6月8号，魏特琳住进爱荷华神经疗养院。

主治医生的诊断结果表明，魏特琳患上了非己力所能控制的抑郁症，医生认为，得了这种病的人，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就会好转；但假如在一年之内不能恢复的话，以后恢复的机会就比较少。



《魏特琳日记》书籍封面

此时的魏特琳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相信自己能恢复正常，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当人类的灾难降临时，她没能用爱拯救世界。

1941年5月14日，回到祖国仅一年的魏特琳用煤气结

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单身女子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教会里自杀了。在她留下的遗书里，她这样解释自己的弃世：“与其因精神错乱而痛苦，不如死去更轻松。”她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是她在密执安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简单安葬。在当时的美国，除了她弟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用



魏特琳肖像

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结束了自己。

但是，她的死在中国引起的震动却远远大于美国。在她死后不久，当时的南京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在南京郊区给她立了一块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获悉明妮·魏特琳辞世的消息后不久，特地发布命令，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并授给她一枚精致的银质奖章。

她去世以后，美国基督教公会执行秘书长约克姆先生，在发布她死讯的唁电里说，“我们觉得魏特琳女士，是真正的战争的牺牲者，正如任何一个倒卧沙场上的将士。”

是的，魏特琳是作为战士倒下的。她用自己的死，宣布与人类中残暴、屠杀、虐待等野兽行为绝不妥协。她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发生在南京的暴行。

魏特琳女士的伟大精神和勇敢行为曾经长期湮没不闻。但是，曾经发生的一切不会消失。

几十年后，胡华玲，一位华人女子站到了她芳草萋萋的墓前。

胡华玲，华裔女作家，当回忆起第一次看到魏特琳的墓地时情难自己。她说：“我看到她墓碑上写着‘金陵永生’四个中国字，下面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

到中国去传教28年。我给她深深鞠了三个躬，谢谢她保护中国妇女。那个时候，我的思绪不由得就回到1937年，那个黑暗的12月，在我脑子里，好像看见成千上万的中华妇女，跪在金陵女大门口，磕头、流泪满面的请求准许进入金陵女大校园，我好像看到，魏特琳女士在日本士兵的刀枪下，保护着中华妇女，我禁不住的眼泪流了出来，我就对她的在天之灵说，无论多么困难，我一定要为你写一本传记。”

胡华玲写了《金陵永生》一书，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其后不久，在遥远的中国，也出版了魏特琳日记和魏特琳另外一本传记。

魏特琳总梦想着再回到中国来。她不止一次表示，如果再有一次生命，她仍然愿意到中国来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她累了，过度的伤害使她再也没有了修复自己的力气。

2002年12月，明妮·魏特琳的铜像在南京师范大学，她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揭幕。魏特琳回到了中国。

第五章

细菌战诉讼案



给那些痛苦无告的灵魂以无限慰藉，
并使他们在临终前得到净化和永恒的安息。
他们安息了，我们才有人类共同的最终归宿。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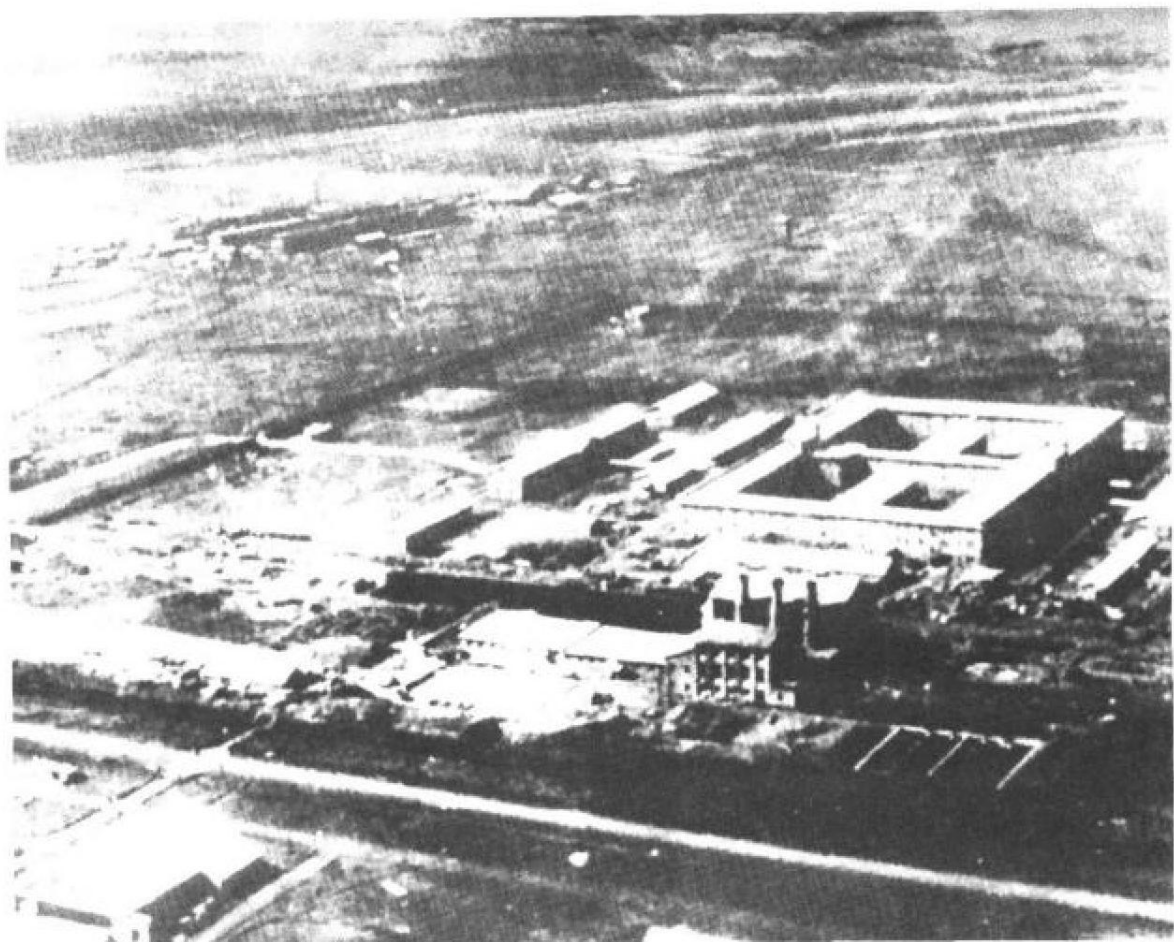
一 在历史的黑暗中

哈尔滨郊外的平房，两根残破的烟囱无语地指向蓝天。在它的脚下，埋着一个被刻意隐藏了60年的罪恶。

罪恶的直接制造者叫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日军细菌战元凶、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部长，一个日本天皇制度下由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培育出来的怪胎。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先生这样评价他：“用怪物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性格是很合适的。这个人完全没有人性，但他又爱他的孩子，依据当时社会的文化标准，他是个好父亲，他是个好丈夫。”

1892年6月25日，石井四郎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千代田村的一个大家族里，1928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部。据说，青年时代的石井四郎是一个细菌学上的天才，曾在细菌学上有着多项专利发明。但当他对那些蠕动的小生物表现出狂热兴趣的时候，他从来不曾接受过任何一点关于人类道德伦理的概念，心中从来不曾对天理、对人性、对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存过哪怕一点点敬畏之情。



731 部队四方楼

石井四郎对开发细菌武器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5 年。就在这一年，世界重要国家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共同约定人类禁止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但当这份公约到了石井四郎手里的时候，他所发现的却是细菌武器对人类巨大的杀伤力，是人类对于细菌武器的恐惧。

1928 年，石井四郎神秘地到欧洲考察。他无暇观光被



日本细菌战部队

人文主义照耀几百年的欧洲，也没有学到哪怕一点点对人本身的尊重，他所感兴趣的，是欧洲历史上鼠疫的大流行带来的人口的锐减。

欧洲之行使石井四郎坚定了他的信念：对于能源极度贫乏的日本来说，如果要走对外扩张之路，细菌武器必不

可少。于是他上书天皇，要求发展细菌和化学武器。结果他的建议与身为生物学家的日本天皇的想法一拍即合。石井四郎的工作得到了天皇的推动和支持。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石井四郎跃跃欲试。在给他的东京上司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在细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进入实验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敬请把我们全体研究人员派遣到满洲国去开发新型武器。

1932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年，石井四郎和关东军一个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来到中国。到东北来视察以后，决定把这个实战研究中心设在拉林县背荫河附近。

昔日的背荫河，曾是一个和平的小村庄。1932年，石井四郎带部队来到这里，把当地的和平居民全部赶走，在这里建立了日军第一支细菌部队，当时叫加茂部队，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前身。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长期致力于细菌战研究，他是许许多多具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之一，一头白发、儒雅谦恭的他对那段历史娓娓道来：

“从1932年到1933年期间，石井部队在背荫河一带建立了用于开发研制细菌武器的研究所，在1934年9月，16名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国俘虏，侥幸地逃离这里之后，细菌

武器研究所的内部机密，就被泄露出去。”

这次小小的意外并没有抑制石井四郎发展细菌武器的热情，石井四郎和他的属下们回日本稍事休整后重返中国，这一次，他们把地址选在了地处哈尔滨市郊20公里的平房。1936年8月，细菌研究所接到了天皇的命令，成为正式部队，命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就是今天被世人共知的日军731部队，石井四郎是这支部队的创建者和第一任部队长。

松村高夫说：“这次石井部队在哈尔滨市郊外的平房，正式地大规模地组建了日本的细菌战研究部队，他们强行赶走了居住在那里的老百姓，在此建立起大规模的从事细菌战的研究设施，其主体建筑是100米长、3层高的正方形四角楼房，由于它的外形像日语的片假名‘口’，所以又称为‘口’型楼，这个设施一切从研制细菌武器出发，装备先进，冷暖设备俱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日本的医学专家，最初到达这里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研究的精英们，因为石井四郎就毕业于这所大学。”

大批有才华的日本科学家蜂拥而至，他们到平房，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给了这支神秘的部队特别优厚的待遇，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这里从事他们在本国无法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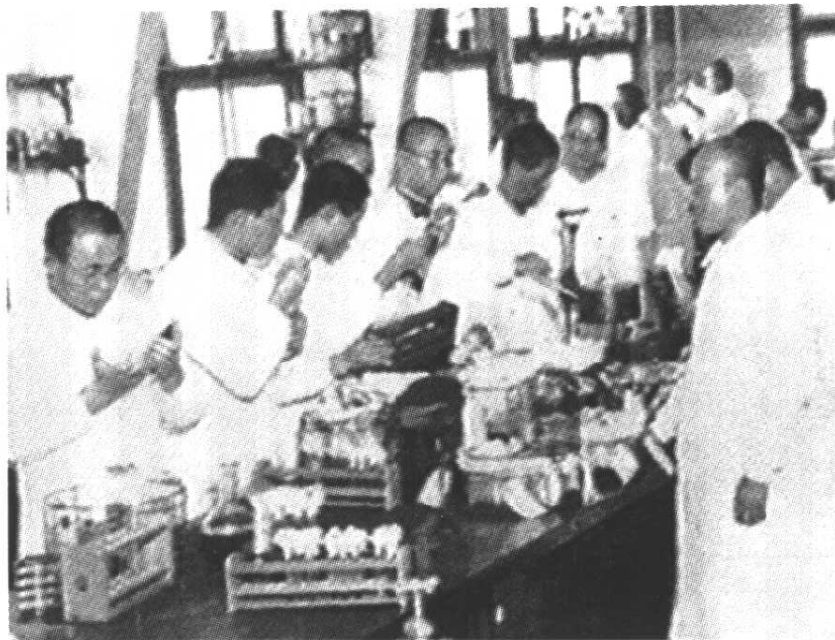


事的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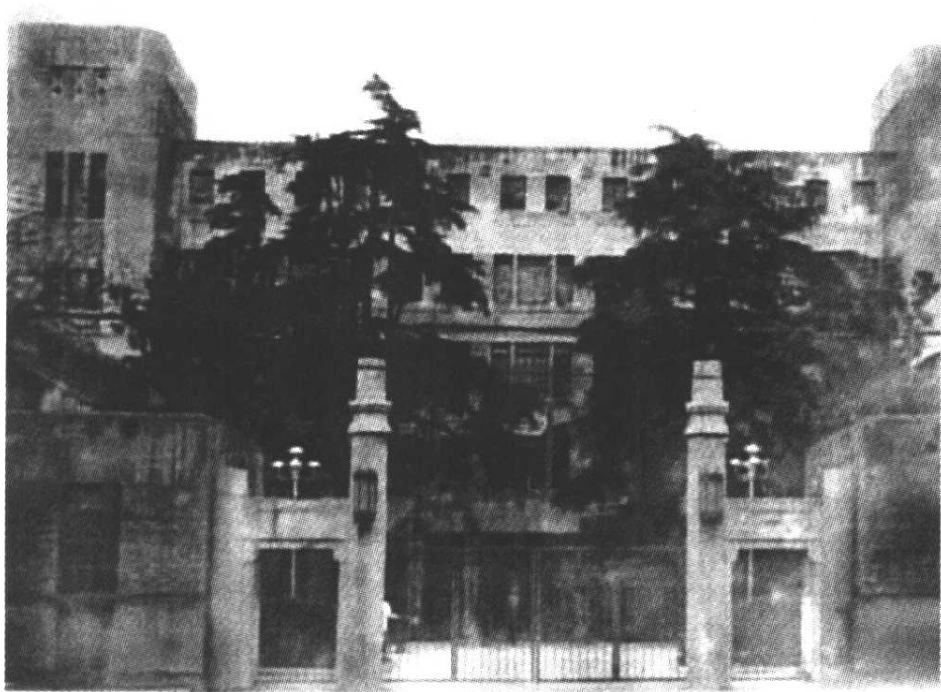
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的原馆长王鹏告诉我们：“应该说这个地方，是进行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生物战的指挥中心，在它中心的区域内，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中国人要进去，就不能活着出来。即使日本人、他



日军生化部队在作战中



1936年8月，细菌研究所成为正式部队，命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就是日军731部队



侵华日军1644细菌部队遗址

的队员，也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

野心勃勃的石井四郎可谓是踌躇满志。侵略战争给了他实现抱负的机会，他可以无所忌惮为所欲为了。在这座四方楼里，石井四郎和日本的科学家们对活人进行了实验，他们的实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人体上注射细菌，用来取得各种数据以外，还有一些难以想像的试验，比如从人身上抽取多少水分可以生存，将人置于低压下或真空中结果如何，把人血换成动物血会发生什么情况等等。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石井四郎和他的科学家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因为在731部队里，居然有一个全部由十六七岁孩子组成的少年班。一大批来自日本中学的孩子被招收到731部队来，做一些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比如涮洗培养细菌的器皿、为活体解剖中国人准备用具、把731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里。

筱冢良雄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场战争开始的时候，筱冢良雄还是个孩子，正在一所中学里读书。15岁那年，部队到学校征兵。出身贫寒的筱冢就报名入伍，来到中国的哈尔滨平房，成了731部队

少年班里的一个少年兵，负责往河流里倾倒细菌、清洗试验用具。他的清洗工作还包括另外一部分内容，这就是清洗那些被用来试验的活体。这一来，所见所闻所为成为他一生排解不了的结。当时的日常工作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

“我们对活体采血样、注射霍乱病菌，然后再采血样进行化验，由于感染鼠疫病菌，被注射的人处于临死状态，这些处于临死状态的人，被送往6号楼1层的处理室（解剖室），进行解剖，在解剖室里，我的工作就是用橡胶软管，往试验活体身上浇水、用刷子清洗，尽管他们感染了鼠疫病菌，处在临死状态，但是这些人当时确实还活着，我们那儿被称为‘医生’的军人，非常残忍地将这些活人进行解剖，然后，取出他们的内脏器官，用于下一步的细菌研究。我当时清楚地看到，那些被用作活体实验的人，用一种极端藐视的眼神怒视着我们，我不敢面对他们，只能闭上眼睛。”

被送进手术台的大多是一些满腔热血的进步青年，他们曾经拥有一张张年轻、健康的面孔。当他们被秘密带进731部队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将要遭受的命运还一无所知。一旦进了这所大门，他们就失去了名字，失去了身份，失



去了作为一个人的一切。他们被称做“马路它”，也就是原木，都被编上了号码，被论根来计数，他们和养在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变成了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用来做细菌试验的试验品。

松村高夫说，“当时，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各地出现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运动，这些参加抗日抵抗运动的人和那些被怀疑从事抗日抵抗运动的人，被捕后由日本宪兵队秘密地押送到平房，进了731部队细菌战研究所。”

他们都是通过特别输送被送进731的。所谓特别输送，是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应731部队的实验需求而输送活体的方式。特别输送的命令是由关东军司令官在1936年发出的，特别输送的对象是由宪兵队或满洲国警察逮捕的谍报人员、思想犯等，只要名字上盖上特别移送的印章，他们就可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直接移送731部队，并在那儿成为细菌试验的原木。

无论是奥斯维辛还是纳粹集中营都有幸存者，在731部队里成为“马路它”的人却无一能够生还。极少数人通过特别移送档案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根据保守的估计，在731部队被用来成为活体试验材料的人起码有3000人。

王一兵的父亲王耀轩和敬兰芝的丈夫朱志盈就是这少数留下名字的两位遇难者。

二战结束后，苏联曾经在伯力对日军细菌战进行过审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伯力审判。在苏联出版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记载：“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宪兵队文件中，我们知道某些牺牲者的姓名。我们知道有牡丹江的一个铁路员工孙朝山，有木匠吴定兴，修理匠朱志猛。”这儿所说的朱志猛，就是敬兰芝的丈夫朱志盈的讹称。

敬兰芝，哈尔滨人。她的叔叔敬恩瑞和丈夫朱志盈当年都是抗日情报站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情报站被日军破获后，朱志盈和敬恩瑞都被日军抓去，从此不知所踪。

1951年敬兰芝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才知道多年来一直寻找的亲人已经牺牲，变成了日军细菌战的试验材料。

王一兵，沈阳市离休干部，其父王耀轩曾经是共产党地下党员。

王一兵的故事是和一个叫三尾丰的日本人连在一起的。

三尾丰，原日本侵华日军宪兵，1943年，三尾丰是日军关东军大连宪兵队的宪兵，大连宪兵队破获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组织，王一兵之父王耀轩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原侵华日军宪兵三尾丰



日军细菌战部队在作战中

穷凶极恶的三尾丰亲自带领宪兵抓捕了王耀轩，并把他送进了 731 部队。

60 年以后，王一兵和敬兰芝代表受害者家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 731 部队研究细菌武器、残害中国人的行为谢罪道歉。在审理过程中，王一兵来到了日本，富有戏剧性的是，王一兵和杀父

仇人三尾丰在日本相遇。

当年失去父亲的少年已是满头华发，而当年的杀父仇人三尾丰在这60年里则经历了由鬼变成人的痛苦过程。

日本战败后，三尾丰被捕，作为战俘在抚顺改造过。在这块灵魂的再生之地，三尾丰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真诚忏悔了自己的罪恶，开始了再生之路。1957年，三尾丰特赦回到日本，参加了全部由曾在中国接受过改造的侵华老兵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还担任了常委。他多次重访中国，还曾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几十年中，三尾丰不断地向日本社会介绍日军罪恶、向受害者谢罪。面对中国人，他总在说：我是犯了罪的人，我要用一生来赎我的罪，把我做过的事情告诉日本社会。

当听说王一兵就是王耀轩之子以后，三尾丰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鼓足勇气站到了王一兵面前。

站在面前的仇人，已经真诚地忏悔了自己的罪恶，并且不顾日本右翼的威胁和阻挠，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的罪行。王一兵以宽宏大量的胸怀，最终宽恕了自己的杀父仇人。王一兵坦然地伸出手去，握住了三尾丰一直不敢伸过来的手。当时，日本各大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这对仇人握手的照片。



面对一个中国人的胸怀和宽容，三尾丰跪下了：“王先生说宽恕我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但是，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只要日本人不改变错误的历史认识，我所犯下的罪恶就永远也洗刷不掉，当面谢罪并不能抹掉我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只有日本政府对在731事件中被害者家属谢罪，并予以赔偿，才能减轻我们的罪行。”

2002年三尾丰因胃癌去世，临终前他一定不会忘记，是一位被他夺走父亲的中国人，帮他在走向人生的终点时卸下了良心的重负。

1999年9月22日，此案一审宣布原告败诉。

目前，此案正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的审理过程中。

二 不仅仅是731部队

湖南常德，一个丰饶的鱼米之乡。1941年4月，日本731部队在这儿投下了含有鼠疫的细菌弹，在当地引发鼠疫大流行，据当地统计，有10000余人罹难。

不少史料上记载了那一天的情景：空袭警报大作。一架日本飞机飞过来，在常德城头盘旋几周便离去了，但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投下烧毁房屋、夺走生命的炸弹。居民们

扶老携幼返回自己的家，发现地面上多了一些破棉絮、谷粒之类的杂物。谁也想不到，在这些棉絮谷粒上，依附着731部队精心培养的鼠疫杆菌。

7天后，第一例鼠疫感染者出现了。

灾难往往最先袭击那些最弱小者。这一次，它抓住的是一个12岁的女孩。

12岁的蔡桃儿每天都要穿过小城的大街，去给在地里劳作的父母送饭。家里穷，买不起鞋，女孩毫不在乎，当她提着小小的瓦罐光着两只脚跑过石板路时，路侧的人们都可以听到那清脆的声响。这光脚丫落在青石板路上的声响，在一个早上戛然而止：蔡桃儿突然发烧、冷战、淋巴结肿大，人很快昏迷不醒。接着，这12岁的生命便在疼爱她的父母的哭嚎声中宣告不治。

蔡桃儿的弟弟至今替姐姐后悔不已：“她去送饭，打赤脚，就踩到了带鼠疫的豆子，不打赤脚，不沾上没事，沾上以后，她就发高烧。”

当地的广德医院很快查实，蔡桃儿是感染鼠疫而亡。这可怕的消息在常德城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恐慌：一例又一例感染者被发现，送到隔离医院，不久又从那儿运出，破膛解剖，最后被送进了火化场。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不



731 细菌部队成员

愿自己的亲人被解剖、被火化，许多人家死了亲人不报，在家中藏匿或者偷偷运往乡下，鼠疫在更大范围传播。一位李姓商人进城做生意，为了避免打防疫针的皮肉之苦，花钱买了一张注射证，不想偏偏感染了鼠疫。他怕客死他乡，更怕被解剖火化，翻墙出城，跑回老家。他死在了家里的

炕头上，但也把鼠疫带给了亲人。几天之内，李姓一家死了16口。

受害者何英珍大夫一家在18天里死了6口。而退休护士杨志慧女士在那场灾难中留下的则是一段恐惧的记忆。

当年，杨志慧19岁，与弟弟陪着早年丧夫的母亲过日子。灾难在一个夜晚突然降临，姐弟二人同时感染鼠疫，被送进了隔离医院。事情过去了60多年，杨女士提起当日



细菌战受害者

情景仍止不住浑身发抖：“一间屋里，黑压压挤了几十口人，前门把还活着的抬进来，后门把刚刚咽气甚至还没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直接抬去了火化场。屋里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命运，个个捶胸顿足，哭嚎叫喊，悲惨凄厉，阴森可怖。”杨女士的母亲拼死跟着进了隔离病房，用她的母爱、勇气和誓不独生的精神，卫护一双儿女。

母亲看到这个惨状，赶紧跑到广德医院的院长谭学华那儿，向他叩头，恳求他救救自己的儿女。谭学华被她感动，破例把姐弟俩转移了出去，使她们成为惟一从隔离医院活着出来的人。

从此，隔离医院的经历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杨志慧在余下的人生中生活在巨大的精神恐怖里。“那个惨状让人难以相信，不是亲眼目睹也难再讲，有老的、有小孩，都是捶胸顿足，脸上都是铁青的，看见的人都怕，那种恐怖，深深的印在我的头脑当中。”

鼠疫，中世纪曾经在欧洲大流行，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从此国际社会把鼠疫的流行看成是天谴，在各种国际公约上都明文禁止使用。德国纳粹曾用毒气室和焚尸炉屠杀人类，却不曾开发细菌武器。但纳粹没干的事，日本法西斯干了。

1997年8月11日，一桩备受世界关注的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这就是由包括杨志慧在内的180名来自浙江和湖南的受害者为原告的日军细菌战诉讼。

谈到日军细菌战，大多数人会想到731，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在侵华战争中，只有日军731部队在研制使用细菌武器。杨志慧的控诉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实际上，在侵华日军中，对细菌战的研制和使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和布局。

在北京，有日军甲字1855细菌部队，从事着与731部队大致相同的工作。

在长春，有日军100部队，与731部队分工不同，日军在这儿主要是利用马匹等家畜来繁殖炭疽和鼻疽等疫苗。

在南京，有日军荣字1644部队，从事细菌研究和细菌作战。

此外，在广州，有日军波字8604细菌部队，在新加坡，有冈字9402细菌部队。同时，这些部队，又都设有分部。比如，驻北京的甲字1855部队，就分别在天津、石家庄、张家口、济南、青岛、太原、郑州、新乡、开封、运城等地设有分部。另外，在每支侵华日军里，还设有所谓的防疫给水班，用于细菌作战。无数日本科学家勤奋地工作在



这个巨大的网络中。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研究可以大规模传播的致病菌，复活已经被人类灭绝的病菌，让它们危害人类。

松本博是原侵华日军南京 1644 部队队员。现在，我们可以从他嘴里听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马路它身上的衣服被剥光，一丝不挂，赤条条的被移



湖南常德鼠疫受害者杨志慧

交给各个试验小组，四周用装满甲酚（煤酚）的槽围起来，槽的大小是50公分×50公分，就像运送动物或动物园里圈养的猛兽一样，他们不能坐也不能站立，每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他们在此最多也只能活半年到一年，过一段时间，等各种病菌已经适应他们的身体状况后，就将他们送往‘处置室（解剖室）’，‘处置室’有类似手术台的处置台，他们的手脚呈25度角被固定在台上，然后，在他们的面部滴上2、3滴乙醚，1、2、3……当数到‘3’时，他们就发出鼾声，失去知觉，接着，他们被打开胸部，采集血样，采集血样时，准备一个上边细下边粗，有3、4个不倒翁大小的玻璃瓶，插上管子，然后，松开捆扎血管的皮管，血液就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随之，他们的身体发出剧烈的痉挛，尽管手脚被固定在处置台上，但是，还是阵阵作响，过一会儿，一些军人登上处置台，用脚踩踏胸部，以此来排掉他们体内的最后一滴血，在他们的身体发出剧烈的痉挛之后不久，估计他们就已经死亡，但是，日本军人还是残酷地挤压胸部，与空气一起排尽体内的血滴。”

各种致命的细菌就这样通过马匹和人体大量地繁殖了出来，下一步他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播洒到中国的土地、河流和平民居民中去。



日本最早播洒鼠疫病菌是在1940年秋天，主要投放在宁波、衢州、金华等浙江省的3个城市。

1940年10月，一架日本飞机飞过中国小城宁波上空，撒下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在这之后，宁波爆发了鼠疫，有100多名感染者死亡。

一年后，也就是1941年的秋天，日军的飞机飞抵湖南省的常德市上空，投下了细菌武器。

于是，蔡桃儿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其实，何止是浙江、湖南？在东北、在山东、在河北、在山西，日军都曾大规模地播洒或者向河流和饮用水中倾倒疫菌，导致这些地区疫病大规模流行，河流水源被污染，和平居民大量死亡。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地方的受害者忍受着日军当年传播的细菌造成的痛苦。

雅阪是浙江金华的一个小镇。当地的人们都称这个地方是烂腿村。

当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逐渐引起世界关注以后，美国细菌学家福门斯克博士来到中国。在雅阪村，他吃惊地发现了这种被村里人称为烂腿的疾病，他说：“我想我发现的是一种特别的、我以前没有确认的、在中国被用做细菌武器的疾病，这种疾病的英文名字叫 GLAND（鼻疽），

18 世纪以及更早以前，在欧洲和北美洲，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发生在马身上的疾病，使很多很多马致死，但是随着对这种细菌的发现，人们通过大量杀死患病牲口，使这种疾病二战前在北美洲和欧洲早已销声匿迹了。日本人复活了这种疾病，并用做武器。在中国这种疾病从未发生在人身上，但是日本改变了它，使它更具杀伤力，并散布这种细菌，散布灾难，使一些人死亡，一些人长期遭受腿部溃烂的痛苦。”

烂腿村的状况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和研究者来到这儿实地考察，看到的一切使他们大感震惊。

“当你实地访问他们，看着那伤口，与他们谈话，了解他们长达 60 年所经历的，令人发指的，身体上还有精神上的痛苦，令人十分悲伤，非常不安。”美国历史学家哈利斯博士这样说。

美国临床医生、医学博士米歇尔·富兰兹布朗教授更是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日本军队的医生们，以参加屠杀取代了救死扶伤，对过去几天看到的事实，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也同样感到困惑不安，我们看到中国的普通百姓 60 年前受到的感染至今不能愈合，这是双重的悲剧。”



长期以来，面对正义的人们对日军进行细菌战事实的揭露，日本政府和右翼人士一直对此坚决否认，坚称没有证据能证明上述地区瘟疫的流行是由日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但《井本日记》的发现，使一切否定日军细菌战的人不得不闭上了嘴。这本日记现在保存在日本防卫厅里，日本有关方面以它是个人日记为由，不允许照相、复印，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先生首先发现了这本日记并不辞



浙江义乌细菌战受害者

辛苦地抄录了其中与细菌战有关的内容。

井本，原日军的大佐，是侵华日军（“支那派遣军”）的作战参谋，不久回到日本国内的参谋总部工作，负责制定侵华日军对华作战计划，细菌战是其作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在他的个人日记里，记录了有关细菌战的详细情况。他的日记里明确地记载着：第一，在1940年，日军计划在宁波及中国长江下游以南地区撒布细菌，并已经实施；第二，1940年用飞机在常德上空，撒播鼠疫细菌；第三，1942年侵华日军实施大扫荡时，在陆地上对衢州等7个城市撒播鼠疫、伤寒和霍乱等细菌。《井本日记》清楚地把日军细菌战研究和细菌战作战联系在了一起。

日本军队使用的细菌武器造成了对中国平民的大量杀伤和对土地水源的严重污染。而这一切很长时间并不为人们所知。这是人为地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三 罪恶的交易

1945年8月6日晨，日本广岛的上空飞来了一架美军的B-29重型战略轰炸机，这架叫做埃诺拉·盖伊号的“空中堡垒”，扔下了一枚4吨重的原子弹；8月9日，日本的

长崎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巨大的蘑菇云在那个东方的岛国腾空而起。

1945年8月15日的那个清晨，日本裕仁天皇本人面对全世界，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天皇绝望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

的声音回荡在日本原子弹阴云尚未完全消散的天空，731部队是优先被确保撤回日本的。

面对一片焦土的日本，石井四郎知道属于他的一切已经过去。在日本金泽的一个神社里，731部队就地解散。但在解散的时候，石井四郎又做了另外一件对他和天皇来说都十分重要的事情。石井四郎警告部下，“第一，要把731部队的秘密带到坟墓；第二，战后不许对任何人透露731部队的消息并断绝同事间的一切联系；第三，不许担任公职。”731部队从此不复存在，731的成员彼此之间割断了任何联系，默默地过着一种贫穷孤寂的生活，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对此保持沉默，闭口不谈这段历史。

而石井四郎自己隐姓埋名回到家里。随后，报上登出了讣告，宣布石井四郎已经战死，他的亲属还请来和尚，为他举行了一个葬礼。在经过了这一系列善后处理后，石井四郎以为，731部队和他本人就从此在世上消失了。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在8月731部队撤离平房时，碰巧有少数人出差在外，这些人没能赶上和大部队一起撤退，被苏联军队抓获。他们被押送到莫斯科，在苏联国内受到严刑拷问，最终是在1946年秋天交待了731部队的这段秘史。他们交待说，在中国哈尔滨的平房，731部队曾用



3000 名中国人做试验。

苏联调查官巴希里耶夫被他们从这些俘虏口中听来的事情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世界上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派人到哈尔滨来调查，结果发现一切居然是真实的。于是，他们向美国人通报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这个时候，东京审判已经开始，美国也对传说中的 731 部队开始了他们的调查。他们很快找到了石井四郎。先后参与调查、审问的美军莫瑞·山德斯中校和汤姆逊中校均



石井四郎全家

没有找到满意的结果。接受调查的原 731 部队成员都严守石井的训话，对事实守口如瓶，一致否认从事过细菌战的研制和人体实验，石井四郎成功地骗过了美国人。

但是苏联人的调查结果令美国人吃了一惊，苏联人向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人提出的要求更令他们警惕——苏联人要求得到日本细菌战的资料，要求把日本天皇和石井四郎作为战犯交给他们审判。

这个时候，冷战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发展，美国已经决意扶持日本，为此，他们要保护日本天皇不受审判。

但这还不是他们要保护石井四郎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派出了以诺巴特·H·菲尔为首的第三次调查组远赴东京，他们重新讯问石井四郎。在日军细菌战中地位仅次于石井四郎的北野政次已经被中国逮捕，此时也被美国紧急要回了日本。这一次，他们决意要从石井四郎那儿了解全部事实真相。

菲尔对石井的讯问在石井四郎的家中进行，石井四郎穿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端正地坐在床上，允许美国客人进来见他。从石井那儿了解到的东西使菲尔欣喜若狂，在他向国防部提交的第三份报告中他说：“这些人体试验材



日本细菌战诉讼律师团事务局长一瀬敬一郎

料，如果将其同我国或盟国的动物试验资料联系起来，将会有非常大的价值。”

美国人这才知道他们有可能从石井四郎那儿得到什么。他们又派出了以埃德温·V·希尔为首的第四次调查组。希尔

的第四份报告说得更加明确：“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所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试验心怀疑虑。而以总额25万日元的代价即获得了这些资料，同实际的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希尔没说出全部事实。事实上美国人要付出的不仅仅是这25万日元。石井四郎清楚他手里的货色的价值，他同意交给美国人而不是苏联人，但前提是要免除他和731部队的战争责任。换句话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不能出现在东京审判的战犯名单中。

这是一个漫长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交易的双方各怀心思。美国想单独占有这些资料，因为他们自己也在研究细菌武器。而石井四郎则要确保他和他的部下们成功地从战后的审判中脱逃。在这场复杂的谈判中，有理由相信是石井四郎占据着主动，以至于多年后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海为父亲辩护说：“据我所知，确实进行了交易。是美国方面来找父亲的，而不是我父亲找上门去的。我想强调的是，父亲的部下，没有一个作为战争罪犯被审判，这件事难道不重要吗？”

对美国来说，担心的不是交易本身，而是如何使这种交易不为外界所知。因此，他们拒绝了石井四郎要求书面



细菌战诉讼案日本律师团和原告

承诺的要求。

吉见义明的研究证明：“在事实面前，石井四郎要求美国以书面形式承诺免除对他们起诉为交换条件，向美国方面提供全部的实验数据和资料。针对石井四郎提出的要求，经过美国方面长时间的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不以书面形式承诺免除对石井等人的起诉，但是，指示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太平洋部队对此采取默认的态度，也就是说，尽管没有书面承诺，但是，已经口头约定免除对石井等人的起诉。”

于是，美国国防部给麦克阿瑟发去密电，指示他们要秘密地将731部队的实验资料和数据搞到手，在这封密电里有下面一段内容：“免除对731部队石井四郎及其成员的战犯起诉，但是，不以书面形式承诺。”这份密电充分证明美国人为了搞到人体实验的数据，而同石井四郎做了一笔黑交易。

交易就这样完成了。交易的双方各自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美国以区区25万日元的代价拿到了全部人体试验资料，而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们从来没在任何一次审判中出现过，731部队和它罪恶的武器以及它的死难者们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黑暗里。



石井四郎平安地退休，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直到1959年因喉癌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死后造了一个大大的墓。而细菌战另一位元凶北野政次活到近90岁，前不久才刚刚去世。

731的骨干们在战后继续活跃在日本的政界或者医学界里。他们不光自己活了下来，他们还把他们无视生命尊严的传统也保留了下来。

前不久，日本医学界爆发了绿十字血液丑闻：绿十字公司进口没经过加热的血液制品，导致无辜者感染艾滋病，而这个绿十字公司就是由原731部队的人员创办的。日本国会无党派议员川田悦子的儿子就是绿十字的受害者之一。

“作为医生要履行治病救人的责任，而731部队则公然拿活人做细菌实验，就是这批731部队的成员，战后为了追求企业的经济利润，置患者的生命于不顾，造成许多患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就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他们至今还在延续那段罪恶的历史。”这既是一位母亲无奈的哭诉，更是一位母亲悲愤的抗议。

由于美国和日本政府的精心掩盖，战后几十年里，日本细菌战的事实一直不为世人所知。

美国律师白瑞·费舍尔说：“据我所知，时至今日，50

年过去了，在美国方面大量的文件和事实仍处于保密状态，德国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已公布于众，可是日本所作的一切却仍旧被保密，人们无法接触这些资料，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作为美国人，米歇尔·富兰兹布朗教授也表示：“说起来我也难过，我为我们美国政府的行为感到羞愧，他们不愿意了解真相、揭露真相，惩办那些对无辜的中国平民犯下滔天罪恶的罪犯。”

鲍威尔，美国资深记者，曾驻在中国多年，50年代初就开始揭露日本细菌战和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因此曾被美国以煽动罪起诉。当摄制组在旧金山一栋简陋的住宅楼里发现这位因为调查细菌战而导致一生坎坷的老人的时候，他仍然在从事着细菌战调查的工作。

哈利斯博士，美国历史学者，多次来中国调查研究细菌战，来到浙江、湖南等地，对细菌战进行实地调查、取证、研究。1994年，哈利斯博士出版了专著《死亡工厂》。在这本书里，哈利斯博士用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揭露了日军细菌战，特别是731部队的罪行，并详细地披露了战后美国为获得人体试验资料而与石井四郎达成罪恶交易的全过程。哈利斯先生的著作，为日后的细菌战诉讼提供了



大量的证据。1999年，哈利斯先生还写信给美国参议员黛安·法恩斯坦，支持她和几名参议员一起向美国国会提出提案，要求美国政府根据情报公开法，公开有关日本军队的资料。目前，这一法案已经得到通过。

哈利斯先生为让西方世界了解日军细菌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幸的是，就在细菌战诉讼将要做出一审判决的前夕，哈利斯先生辞别了人世。但他的音容笑貌会留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

2002年8月27日，在经历了五年的诉讼、28次开庭以后，举世瞩目的细菌战案终于迎来了它的一审判决。对这次判决，来自中国受害地的原告们企盼已久。浙江、湖南两地组成了阵容庞大的原告团和声援团。他们在国会前展开了有3万多常德人民签名的横幅，表达了受害地民众要求清算历史的呼声。

8月27日的东京地方法院，媒体云集，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

8月27日判决全面认定了日军细菌战的事实，认定这种不法侵害至今还存在，但仍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没有请求的权利等为理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这个判决，日本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律

师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今天的这个判决结果，事先我们预料到了一半，我们估计法庭会就历史事实，做出事实认定的判决结果，但是，法院却以法律根据不足为借口，驳回了原告要求赔偿的请求。我们要继续上诉，关于判决的法律依据问题，我们今后还要逐一仔细地研究，找出新的对策。法院是维护正义的场所，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法律就会被滥用，那么，就会出现既有维护正义的法律，也有践踏人权、阻止被害人胜诉的法律，法律是基于事实说话的；如果法官有勇气和正义感的话，就能够帮助原告胜诉并为其伸张正义。”

日本律师、日本细菌战诉讼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则认为：

“在法庭上首次公开认定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历史事实这一点，我认为是一大突破。但是判定日本政府不承担战争责任，这一点说明法官有失正义感。当然，我们还要继续上诉，就细菌战问题，我认为今后还会出现很多的诉讼，国际舆论也会更加关注这个事件，新一轮法庭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细菌战的宣判在日本社会引起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一直极力否定细菌战事实存在的日本政府在法庭认定事实的面前再也无法回避了。

在细菌战判决以后，日本政要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也纷纷发表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吉冈参议员说：“从这次判决结果我感到，要想全面公正地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关于这个诉讼案很难胜诉的原因，我认为只要以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内容为法律依据的话，就很难赢得胜诉。我认为，法庭公开认定实施细菌战的犯罪事实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对于实施细菌战所带来的危害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上，法庭以‘问题早已解决’为借口，驳回了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请求，这反映了日本政府在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及战争赔偿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和观点。”

民主党鸠山由纪夫说：“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我对日本政府在处理两国间战后遗留问题方面没有做出令中国人民满意的做法这一点，深表歉意。不过，我认为，应该对法庭公开认定事实关系这一点，给予积极的评价。”

180名原告对判决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并当即决定上诉。对诉讼艰难的前景，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原告中的大多数人都年事已高，我们希望

原告的亲属，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在父辈去世之后，要继承父业，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诉。”

是的，在历史问题上日中两国政府和人民如何达成共识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了寻求这个共识，许许多多的人还要继续努力下去。



被用做活体实验的中国平民



第六章

平顶山惨案诉讼案



愈合只能完成于伤口之上

被拯救的人，从此不再完整。

——题记

一 中秋节的阴霾

平顶山，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小村庄，位于抚顺市区南面，西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区约有四公里。全村有800多间房子，400多户居民，3000多人，大多是矿工和小商贩。这里的百姓头枕着煤海，一度生活得平静、祥和。

今天的莫德胜看起来和普通的中国退休老人没什么两样，但和许多人不同的是他有过一个充满恐怖的、不堪回首的童年。他的童年和平顶山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这命运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巨变。

1932年9月15日深夜，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三省人民依然像往常一样以游击战的形式开展默默的英勇抗日斗争。辽东义勇军第4路、第11路向抚顺矿区发起进攻。其中第11路军途经平顶山村，直扑杨柏堡坑(煤矿)。镇守杨柏堡的日本守备队司令渡边宽一等5人被击毙。

1932年9月16日，平顶山成了侵华日军疯狂报复无辜百姓的第一站。这一天，在关东军抚顺守备队第2中队队长川上岸、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等指挥下，200多名日军包围了平顶山，严密控制了东、西两个大山头，封锁



日本鬼子在东北

了平顶山居民进出的路口。冲进平顶山街里的日军分成若干伙，从平顶山北头到南头，挨门挨户地把居民赶出，佯称给居民照相。不多时间，全村的人都被赶了出来。居民在前面走，日军在后面用枪托打，使脚踢，有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老弱病残，因为走得慢一点，日军就把他们打倒在

地拖着走，有的当场打死或刺死。

午后一点多钟，全村 3000 多人全部被赶到了平顶山南面的草地上。草地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是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东面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着的带支架的东西。正当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候，红布掀掉，原来是六挺机枪。机枪和步枪一齐向人群射击。片刻之间，血肉横飞，妇孺哭叫，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中。

日军用机枪扫射时，人们和残暴的日军展开了搏斗，有的人奋起冲上去夺枪。与此同时，日军按预定计划在村内纵火烧房。草地上鲜血四溅，街道浓烟滚滚，整个平顶山陷入日军疯狂的大烧大杀之中。

第二天，日军又用钩子把尸体钩到山崖下，堆积起来，浇上汽油焚毁，然后用炸药把山崖炸塌，掩盖烧剩下的尸骨。

每一次回忆起当年日军用机枪扫射 3000 村民的情景，莫德胜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机枪就疯狂地扫射起来，前面的人一排一排地倒下去，打得这个血肉横飞，喊声哭声叫声枪声连成一片，扫射过程当中，我父亲怕我害怕，把他带的惟一的草帽盖在我的脸上，说，孩子，你不用怕。”



没人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死，没人解释这一场大屠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慢慢的，枪声也停止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我就把草帽摘个缝，向周围看一下，南边一排日本兵，北边一排兵，死的活的都扎你一下，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让你一个也活不了，当时有个小孩爬起来‘妈妈、妈妈’的叫，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过去一刀，小孩惨叫一声，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把眼睛一闭，非常害怕，心像打鼓似的咚咚跳，再也不敢看了，把眼睛一闭，装死，日本兵踹我一脚，我身子一翻，一刀扎在我肩上……”莫德胜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和年仅3岁的小妹妹，都在那场屠杀中死去，莫德胜身上也留下了一生无法弥合的伤疤。他侥幸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乞讨投靠亲友才得以活命。

据抚顺市博物馆后来的统计，平顶山惨案造成了3271人当场惨离人世。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七八十岁的老人，襁褓中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全村800多间房屋均被日军烧毁。只有31人幸免于难。至今健在的不到10人。

为了悼念殉难同胞，抚顺人民于1951年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又组织了对遇难同胞遗骨的大规模挖掘，从大约80米长、5米宽的范围内，出土了遗骨800余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莫德胜

具，并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每个前来参观的人，都可以看到馆内展出的死难者遗物，那里有儿童的小手镯，长命锁，妇女的戒指、梳子，老人的烟斗，以及人们在中秋之夜没有吃完而被烧焦了的月饼、葡萄，还有杀人凶手们留在惨案现场的子弹壳，汽油桶，更有一具具死难者的遗骨。

在遗骨馆前，沿着平顶山的断崖，修筑着137级台阶。拾阶而上，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在开阔的平顶山上。碑身用白色花岗岩修成，镶嵌着黑色大理石的碑文，碑高19.32米，象征着抚顺人民对1932年平顶山惨案的沉痛悼念。碑底座66.6平方米，碑基座面积1026.6平方米。碑前翠柏相映，庄严肃穆。

这些建筑物承载着几代人的悲剧命运。

1996年8月，莫德胜、杨宝山和方素荣三位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正式为60多年前屠杀无辜平民的行为向中国受害者谢罪道歉，并做出经济赔偿。80高龄的日本律师环直弥出任平顶山诉讼日本律师团团长。

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在法庭上取胜，诉讼的目的，更在于使被掩盖的事实让广大的日本国民知道。环直弥律师

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作为日本国的辩护律师，我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帮助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同时，也使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了解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以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平顶山诉讼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开庭20余次，双方在庭上对原告所诉事实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面对日本政府方面一再否定平顶山惨案事实的态度，原告和辩护律师以翔实的资料和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把60多年前发生过的一切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6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10庭对平顶山三位幸存者的诉讼做出了一审判决。主审法官菊池洋一在判决理由中第一次从司法角度承认了原日军在平顶山的屠杀事实。他指出屠杀行为“相当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认为日本法律适用，但还是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称因为当时日本法律没有规定政府需要对其行为进行补偿。

日本法庭的不当判决激起了原告和中国方面的极大愤怒。

莫德胜说：“对日本法庭的判决，我深表遗憾，因为这样的判决又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1996年以来，一直担任“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向日本国索赔一案的日方代理律师泉泽章认为，这是日本法院第一次承认抚顺“平顶山惨案”，这与过去拒不承认事实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法院以“二战”前日本法律规定“国家无答责”为由，拒绝对三位中国受害者进行补偿，是违反公平和正义的。“作为结果，这个判决没有认可原告的要求，是不当判决，令人愤懑。原告们进行了6年的诉讼，来到法庭为谋求胜利，法官没能做出胜诉判决，我认为法庭的判决是不当的。但是这次判决是战后第一次由日本国的司法机关认定平顶山事件是日本犯下的罪，是第一次由日本国的一个机关承认了事实，这点值得肯定。”

在一审判决后，三位原告和他们的律师们立刻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

对二审的前景，日本律师南典男认为：“今天的判决被翻过来的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从1995年开始，进行着各类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斗争，对于这些诉讼的进程我们有着相当的自信，我们在法庭斗争中主张用‘国家无答责’的法理是违反正义的。”

律师泉泽章对于还要进行下去的斗争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像刘连仁判决及今年福冈劳工判决那样，过去人

们认为不能突破的时效和除斥的壁垒，我们突破了，所以，在‘国家无答责’这个壁垒上打开缺口或是完全打破，我们认为仅仅是时间问题。”

和许多战争受害者一样，平顶山的三位原告也已经是风烛残年。70年前8岁的孩子，今天已是白发苍苍，而律师团团长环直弥老人也已经81岁。在遥遥无期的诉讼中，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

二 忠诚或背叛

在平顶山的这场屠杀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日本军人的故事。

惨案发生时，仅有的几位幸存者都目睹了一个恐怖的镜头：一个日本军官举起刀，发出了屠杀的命令，随后子弹便如飞蝗般铺天盖地而来。这个日本军人，名字叫井上清一，当时是日军驻抚顺守备军的中尉小队长。

井上清一是原日军第四师团中尉，1931年12月13日奉命进驻满洲。12月12日中午，井上清一回到家里，发现新婚不久的妻子井上千代子略施粉黛、身着盛装，端坐在蒲团上用短刀自杀身亡。



り佐將たる武人の妻としての異起を著し、出陣の天中影の舞臺の裏方を露した、しかもこのんで一切の眞情を胸に秘め十三日部隊とともに従容滿洲へ向つたのである。

黒紋附、裾模様

盛装した夫人

夫秘藏の短刀で一突き

うす化粧までして



人夫子代千たし及自

表格子

周仁丁孝廉

終日暇に在り、器用の方はその方に一といふ聲の夫人並の貼紙を手にしながら、切腹に入るや、切腹しい喉音の一響を聞いて、切腹切腹と入つたところ、夫人は果大膽

中尉が

の形で自給の能力を片手
り給めたまふ御助けとな
られて、供給してゐるのを
ので、國庫に負擔した、
夫人は黒龍所仕丹と云草
の爲めに、白粉三匁、白
ゆばん、知恵の丸樽、新
足袋の裏表を縫らし、頭髪
分け薄化粧をさへして、往
来につき、窓内には白木櫛
置き、窓外面に端坐し

日本当年对这一事件报道的报纸

在留给井上的遗书里，千代子这样写道：“我的丈夫：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恭喜您。在明日出征以前，我将离开这个喧嚣的人世。请不要有任何牵挂，我来不及为你送行，请尽力为国工作，拜托的事情只有这一件。”

用今天的目光，我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妇的举动，但在70年前被军国主义扩张思潮燃烧着

的日本，这种以自戕来激励丈夫去从事侵略的行为却得到了日本全国上下一致的赞扬。千代子成了日本新闻宣传的热点，并迅速地拍成了电影，写成了书，成了日本女性的楷模。以千代子自杀为起点，日本还成立了专门为侵略服务的国防妇人会。

寻常的中尉井上清一因为不寻常的妻子变得不能再寻常。井上清一拒绝了推迟出征的恳求，在千代子自杀第二天如期出征。无数的人到车站为这位不寻常的中尉送别，井上中尉在车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请不要为我吊唁，懊悔和悲痛对于妻子的死都是不合适的。请为我祝福万岁吧。为报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期望生还，尽力发挥伟大军人的作用。”

井上清一就顺着这条由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为他铺就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终于走到了平顶山，并在那儿举起了他的屠刀。

当我们谈论战争责任的时候，更多的目光会集中在那些战争的罪魁身上：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而谈及二战的时候，许多的日本民众首先会记起的是原子弹、是饥饿、是受害。

但在了解了千代子和井上清一的故事以后，我们无法

回避民众的责任这个话题：长达15年的扩张战争、数百万日本青年的死亡，难道，真的仅仅是东条英机等几个人的错？

井上清一的个人悲剧并没有结束，他先是被当成了激励日本青年投身侵略战争的工具，后来又被当成了平顶山事件的替罪羊。战后，平顶山事件被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所知并引起震惊，日本右翼先是极力否定平顶山事件的存在，当发现再也无法掩盖的时候，便把一切罪责推到井上清一身上，说平顶山事件是井上个人由于妻子自杀而导致的性格异常溢出的行为，事件的真正责任者川上精一以及侵略战争发动者则被说成了无辜。

平顶山惨案的策划者川上精一在惨案后升为大佐，在日本战败后平安地回到了日本，1946年6月12日，在作为战犯被捕时自杀于日本宫城县他的隐身之地。井上清一则在惨案后被授勋，战败后回到日本，直到1969年因病在家中去世。

尽管事件的制造者极力想掩盖平顶山事件，但在当时上海已有报纸报道，一位美国记者也冒着生命危险在事发一个月后亲自到惨案现场调查，并把消息发回到美国。国民党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和解放后的抚顺市人民政府都曾经

对平顶山惨案进行过调查和审理。当时与平顶山惨案有关的伪政府官员受到了法律惩处。

50年代初，抚顺市人民政府在平顶山举行了公祭大会。70年代初，人民政府又组织了对平顶山惨案遗骨的大规模发掘，这些含冤赴死的亡灵终于重见天日。

1971年，在遗骨发现现场，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就是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此前，由于日本右翼的有意掩盖，日本社会对平顶山惨案一无所知。本多胜一以一个人的良知和巨大的勇气来到平顶山，对平顶山惨案进行了仔细的调查。

本多胜一回国后，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名为《中国之旅》的书，自1971年8月起在《朝日新闻》连载，其中重点介绍了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等事件。他的介绍，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震惊和轰动。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民间交往不断增多，一些日本人一手拿地图，一手拿着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按图索骥，来到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了解历史事实真相。30年来，已有数十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到平顶山，追悼亡灵，反思战争。每一位目睹惨案遗址的参观者，面对累累白骨，无不当年日军的残暴所震惊。



数年中这本书多次重印，发行几百万册。为此，本多胜一先生成为日本右翼的眼中钉，屡屡遭到人身威胁，使他不得不多次搬家，并戴上了墨镜。即使在我们的镜头前，本多胜一依然没有摘下墨镜，但本多先生矢志不渝，他说，他是为了日本的未来。



摄制组在韩国街头



第七章

投身诉讼的人们



他们习惯不回头，一直走，永不后悔。

——题记

一 被追问的良心

迄今为止，已经有二十几起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或加害企业谢罪赔偿的案件在日本列岛从南到北进行着，法庭内外的抗争持续了整整八年。

每一起诉讼案后，都有一个日本律师团，有一群正义、热诚、勇敢的日本律师。

中央台记者董倩采访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先生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日本律师，同时你们也是日本人，你们为什么要替中国人打官司呢？”

她也提出了一个许多中国人得知这些日本律师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时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的，他们是日本律师，同时他们也是日本人，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无偿地付出自己的金钱、精力、生命，和中国战争受害者站在一起，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呢？

小野寺利孝，日本东京文京协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要求战争赔偿事件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在已经发生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诉讼中，绝大部分，比如刘连仁案、南京大屠杀和 731 幸存者案、平顶山惨案案、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案以及大部分的慰安妇受害者案和大部分的强制劳工



小野寺利孝和原告在一起

案都是由这个律师团代理的。那么，作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小野寺先生为什么要代理中国人进行这些诉讼呢？

1941年，小野寺利孝出生在日本福岛县一个贫困的矿工家庭。恶劣的劳动条件、超强度的劳动使父亲得了尘肺病。舅舅被强征到战场，死在菲律宾战场。跟随母亲在战争中渡过少年时代的小野寺过早地体会到了下层人民人权

得不到保障、心灵备受伤害的痛苦。“出于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想成为律师，捍卫他们的人权，对他们的人权斗争给予支援、支持。”

正是早年经历的这种人生苦难，使小野寺在开始他的人生奋斗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和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使他从取得律师资格那一天起，就立志成为一个为保障人权而献身的律师。当律师30多年，小野寺代理过朝鲜人人权侵害案、越战期间人权侵害案、原子弹受害人权案、尘肺病受害案。小野寺自己说，从这个角度看，他后来走上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道路是很自然的。

1994年，小野寺参加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访华团访问中国。小野寺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一次平常的两国法律工作者之间的互访，但对小野寺来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这次访问中，他先后到了南京、沈阳、北京等当年曾经深受日军蹂躏的地方，平生第一次真正面对中国战争受害者，面对自己的父辈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恶。

在这次访问中，小野寺第一次来到平顶山。

站在中国战争受害者的遗骨前，小野寺回忆说：原来，



大森典子律师在山西访问受害者

他以为自己什么都了解了，在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手犯下的罪行，是我们的祖国日本，是与我们相连的父母一代，或是祖父一代的犯罪，对此自己这一代必须去补偿，必须去解决、去克服负面的历史，我认为不能把这个课题，再留给自己的孩子、孙子一代，这是我们从事这一斗争的最大、

最主要的动机。”

恰好在小野寺站在中国战争受害者遗骨面前受到极大震动的时候，在他的祖国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发表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把小野寺先生推上了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这条路。

小野寺告诉我们：“永野的这个发言成为我们与中国战争受害者共同斗争的动力，也成为一年后的1995年8月提起中国战争受害者战后补偿诉讼的契机。”

面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遗骨和日本右翼政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狂言，小野寺认真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中日友好这个大命题。“尽管我是希望日中和平友好的日本人中的一员，但对于作为友好和平基础的信赖，以及怎样构筑这种日中两国民众间的信赖，我过去根本没有思考过。也就是说，我过去一直认为日中关系，是外交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或是民间团体和团体的关系。其实在战争中自身受到伤害或是自己的亲人被夺去生命、被侮辱的人，有着无法消失的愤怒和悲伤，这并未治愈的伤害一直持续着，甚至可以说这愤怒和悲伤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增加，这样的受害民众无声无息地存在着，达几千万人，算



上同他们有关联的人，那么可能有上亿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民众中存在着，对于这一点，我过去全然不知，实现了这些人的要求就可以创造出日本和中国在民众层面上的真正的信赖以及国家和国家的信赖，这是见到了战争受害者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和深深感受到的。”

只有真正尊重受害者的权益，从心理上消除那场战争带给两国人民的仇恨、隔阂，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日中友好，这就是小野寺那次访问带给他的最大的成果，也成为他走上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的原动力。

回到日本以后，小野寺就开始积极组织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的律师团。到1995年8月7日提起诉讼的时候，在律师团登记的律师有173名，现在律师团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已达300人，常任律师也超过了70人。成立律师团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和由各界民众组成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持会，支持会的工作是扩大宣传，筹集资金，保证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

作为在法庭外制造舆论，使诉讼获胜的市民团体，支持会成立伊始，响亮地提出了自己的口号：“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

追问日本的良心——这些可敬的日本人就是这样在战

争结束 50 年后，勇敢地、毫不回避地面对自己的父辈犯下的罪恶，承担起了一个有良知的日本国民对自己国家和人类前途的责任。

在日本，除了以尾山宏为团长，小野寺先生为干事长的律师团以外，还有以新美隆先生为首的花冈诉讼律师团、以土屋公献为首的细菌战诉讼律师团、以山田延广律师为首的中国强制劳工诉西松建设律师团、以蓝谷邦雄为首的台湾慰安妇诉讼律师团。

尾山宏先生，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团长。在长达 30 多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案中，尾山宏一直是律师团成员。此次他又不顾年老体衰，以 80 多岁高龄出任律师团团长。在许多诉讼案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尾山宏先生走在队伍前列的身影。

土屋公献，日本前律师协会会长、日军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为调查日军细菌战的罪行，年过八旬的土屋公献曾多次往返于中国。

田中贵文，中国强制劳工北海道诉讼律师团团长。田中先生有严重的心脏病，三年前刚刚做了心脏手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三年中，他就带着心脏起搏器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为中国强制劳工问题的公正解决而不懈地努力。

一濑敬一郎，日军细菌战诉讼律师团事务局长。为这场诉讼，一濑数十次来中国。2002年的春节，一濑是在义乌农村和细菌战受害者一起过的。

当我们远赴东瀛采访的时候，经常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日本社会中的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作家、记者、律师、学者、教师、职员、普通的工人、农夫。他们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每天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对这个国家、对人类未来的责任，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方式，为了让日本人民了解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牢记历史教训，保卫日本的和平宪法而努力地斗争。

许多中国人知道森村诚一是通过那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人证》，在这部迄今为止已经发行几百万册的小说中，森村先生充分表现了战争、美军占领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事实上，战时出生的森村诚一也永远难以忘记战争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带来的苦难。

“我家在市中心，在太平洋战争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的当天，美国B29的空袭使那里被毁掉了，我的家也被毁，我珍爱的许多书被烧掉，那里变成一片废墟。我家近处有一条小河，本来是条非常清澈的河，可以看到河底，但8月15日战争结束那天，我在自己家烧毁的废墟上

寻找东西回来，看不到小河的河底了：整条河都被尸体塞满了。这些人几乎都是我认识的人，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对于自己那时看到的情景，将来要在某个时候，用某种形式写下来，这是我成为作家的最初体验，最初的动机，因此我成为作家后，一直强烈地把战争、和平、民主主义这些问题放在自己的意识里进行创作。”

数年后，森村诚一又写了另外一部同样风靡一时，并且越来越受人们珍视的书——《恶魔的饱食》，向日本社会介绍了日军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滔天罪行。迄今为止，这部作品已经在日本发行了500万册，同时被改编成歌剧在日本和国外上演。

出于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森村诚一加入了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市民支持会。以自己在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为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公正解决而做着努力。

西野留美子，社会活动家、慰安妇问题专家。数年来，西野留美子女士多次到中国、菲律宾、韩国、朝鲜等国实地调查日军慰安妇罪行，出版了多部关于日军慰安妇罪行的书籍。

她坦言：“作为日本人，去面对对于日本来说非常耻辱的过去，这对于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过程中，我感受到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如果不作为事实去认真地看待，日本就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同中国及亚洲各国成为可信赖的朋友。”

持永伯子，中国人要求赔偿事件支持会常任委员。持永的少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少年时代的生活给了持永巨大的影响，使她永远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另外一个祖国。数年中，年过花甲的持永一直热心于中国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支持会的工作。

安达洋子是一位普通的教师，现为中国慰安妇受害者诉讼支持会成员。数年来，每个周末，都可以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口看到她的身影。她还多次到山西会见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调查日军暴行。

事实上，这些人只是无数有历史责任感和良知的日本人的代表。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这些追求和平、正义和人类良知的日本人一直在为亚洲和平、为阻止日本重走战争老路而进行着艰苦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是日本的良心。

二 大森典子律师

谈到中国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日本女人。她和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素昧平生，但在近10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和这些出身贫贱、地位卑微的女人站在一起，分担着人生的不幸，分享着斗争的快乐和失败的痛苦。她，就是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诉讼日本律师团慰安妇诉讼律师团团长、东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大森典子。

大森典子出生于东京一位法官的家庭，当初，当她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的时候，日本女性从事法律的可谓凤毛麟角，通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更是关隘重重。大森典子以日本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毅力，通过了严格的考试，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女律师。当年，通过律考的女性，全日本只有三名。

自从当上律师那一天起，大森律师就以一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积极从事维护人权、促进日本正确对待历史、加强和亚洲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斗争。

1992年，在国际会议上，大森典子律师第一次听到了

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的受害事实，受到很大冲击。从此，大森律师有意识地了解这方面的材料，越来越多的事实使大森律师寝食难安。

1994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森律师作为日本女性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森律师与另一位中国女律师相遇。两位异国女律师的偶然相识，终于促成了中国性暴力受害者在日本的起诉。

康健，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在遇到大森律师以前，作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康健过着平静的、波澜不惊的日子。但在世妇会上，大森律师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向中国律师提出请求，希望能协助她在中国展开慰安妇起诉的调查取证工作。在一片沉默中，康健律师感到义不容辞，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这一站就是八年。

世妇会后的10月份，大森律师专门到北京来，和康健很认真地谈这个问题了，还为她专门翻译了起诉书。看完日本律师团起草的起诉书后，康健律师大受震动：没想到，这些日本人工作做得如此扎实，对历史背景做了大量的调查，并有很详细的阐述。是在大森律师提供的起诉书中，康健律师才第一次对慰安妇这一历史罪恶有了粗浅的了解。康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日本律师团的委托。

接受委托后，康健律师来到了山西。对她来说，这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她没想到的是，正是深入山西实地调查，使她也身不由己地深陷进去，从此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和中国战争受害者连在了一起。

当大森律师从康健律师那儿听到了山西性暴力受害者的受害经历后，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她要亲自到山西去，到受害者家里去，到当年的受害地去。

1998年，大森律师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来到了山西。和几乎每一部进山的车辆一样，大森租用的汽车也坏在了半路。当夜，大森不得不住在村里，和受害者以及同去的同伴挤在一张土炕上。

“到了她们生活的地方，我再一次震惊了。”大森不止一次地谈起她的第一次山西农村之行，“她们就是在那种贫穷的山村里，带着屈辱的记忆生活了50年，我有了切身的体会，真的是理解了她们，和在太原、北京的宾馆时不同，这时我才真正地明白了她们的痛苦”。

很久以后，大森又这样对我们谈她到了山西农村的感受：我第一个感觉是，真想把那些法官揪来，让他们亲眼看看这地方。一个人生活在这么贫穷的地方，家里有一个

女儿，就是人生惟一的欢乐了，而这女儿又被日本士兵掳走遭受强奸，日本士兵把人们惟一的欢乐夺走了。

1995年8月，大森律师代理山西孟县四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随后，1996年3月，又代理山西另外两名性暴力受害者提出了第二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他们60年前所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谢罪、道歉，并做出经济赔偿。

2001年5月，来自中国山西的四名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在经历了5年的诉讼以后，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原告败诉，法官绝口不谈事实，甚至连一个到法庭上作证的机会都没给原告，整个宣判用了不到5分钟。用大森律师的话来说，这是一次最坏的判决。

其实，日军性暴力案件，是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的一个案件，也是在日本法庭上最难突破的案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次这类案件胜诉，大森律师得到这样的判决毫不奇怪。但大森律师对于这次最坏的判决始终耿耿于怀。也许在她看来，作为一个律师，得到了一个最坏的判决，从而给以后此类案件留下一个最坏的判例，无论如何都是她的责任。她以更大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她和支持会的成员们一起，一次次把中国性暴力受害者请到日本，通过她

们不幸的遭遇，唤起日本全社会对诉讼案的帮助。她积极地参与女性战犯国际法庭的工作，用世界舆论给日本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大森对我们说：“在这7年诉讼当中，广大的一般民众知道了她们的受害事实，这些都是对日本社会冲击很好的宣传。”

就在这种形势下，她迎来了2002年3月28日，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第二起诉讼案的判决。

2002年3月28日，东京大雨。头一天，大森律师忙到很晚，这天早上6点多，大森律师就起床了，她要准备一家的早餐，还要照料90多岁的婆婆。在外面，大森律师是一位成功的律师，在家里，她却是一位标准的家庭主妇，照料着丈夫、儿子和90多岁的婆婆的生活。

8点32分，来不及吃早饭的大森就出发了。在路上，在电车上，她和那些每天来往于东京的上班族没什么两样，没人能知道，这个默默无言的女人身上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当大森来到东京地方法院门口时，支持会的成员们已经在那儿了。自从中国性暴力受害者在日本提出起诉后，支持会每周六到东京地方法院门口示威，迄今已经坚持了6年。她们都是日本普通的市民。她们中有教师、有职员、有



大森典子律师与中国女律师康健在一起

学生，也有家庭主妇。过去发生的一切与她们并没关系，但她们却自觉有责任。她们积极地从事着与性暴力受害者起诉有关的工作，印刷宣传品、组织集会、向社会募捐。到目前为止，中国性暴力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绝大部分资金都是她们募集来的。也许，正是由于日本社会上这些正义人士的支持，才能使大森律师在举步维艰的诉讼中一直走到今天。

这一次的判决，如同事先预测的那样，仍然以宣布中国性暴力受害者败诉而告终。不同的是，这一次法官全面认定了受害者受害的事实。

对于律师来说，虽然没取得胜诉，但承认了加害事实，从而使日本政府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无可逃遁，就是一个胜利。但对受害者来说，承认了事实，却不能取得胜诉，得不到任何赔偿，这种判决有什么意义呢？她们能理解律师所说的胜利吗？

大森决定，还是要亲自去一趟山西，向她的当事人当面通报判决的结果。

这一天，北京的律师康健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登上了去往太原的火车。她要到太原去和大森律师会合，共同和受害者见面。在日本律师和中国受害者中间，康健律师是

一座不可或缺的沟通的桥梁。

在山西，康健把大森缩印的厚厚资料带给原告，并且仔细地、用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审判的结果讲给那些受害者。令大森欣慰的是，在这次与受害者的见面通报会上，受害者们对本次判决的意义表现出了深刻的理解。大森律师的担心此刻才化为乌有。作为一名律师，还有什么比得到当事人的谅解支持更重要的呢？

就在这次见面会上，大森律师和她的中国当事人签下了上诉委托协议。这一纸委托书，又将把大森律师和这几位贫穷的中国受害者在未来的几年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共同进行这一场意义重大的、艰难的、胜利希望渺茫的斗争。

回首这一场漫长的诉讼，从最初接触受害者、调查取证开始，大森律师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精力、时间乃至财力，已经将近10年。回首10年路，大森律师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可言说的疲惫。

7年中，诉讼的所有费用，都来自日本社会中有正义感人士的捐款，而大森本人也已经竭输其能。“所以坦率地说，可能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想到参加诉讼的律师们都花了很多自己的钱来到中国，原告们去日本的费用也是由律师支持

会的人们承担的，当然我个人也出了很多钱，可以说是倾其所有。”

对大森说来，金钱和精力的付出，仅仅是一个方面，真正令她感到疲惫的，是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的隔膜和误解，是在中国社会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认为通过法院解决我们日本前辈所犯下的罪行，并以法院的判决为突破口，最终全面解决慰安妇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在恢复中国战争受害人合法权利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所以中日两国人民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尽管疲惫，尽管难以支撑，但大森律师仍然表示要咬着牙坚持到底。“我个人其实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我现在也在想，等我最后完成斗争，希望有一些时间来回顾一下斗争历程，回顾一下我走过的人生路，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独自思考一下过去的想法，但是要等我做完现在的工作，目前还不可能实现。”

最近，我们得知，大森律师又承担起了日军遗弃毒气弹的辩护工作。

三 一个女人和一场诉讼

在备受世界关注的细菌战诉讼中，活跃着一个中国女人的影子。她的名字叫王选。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总代表。从1995年开始，她为108名（后又增加72名）诉讼原告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维护世界和平奔走了8年。8年来，她肩挎装载日军罪行的黑布包，面容严肃，脚步匆匆往来于中日之间。历史责任感、时间紧迫感催促她誓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

王选的原籍在浙江义乌崇山村。在40年代初由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给浙江造成了大劫难，王选是细菌战受害者的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

王选1977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她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

其中提到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三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在那一刹那间，王选突然明白了命运把她带来日本的意义。她找到那几个日本人，对他们说：我是崇山人，我懂那儿的语言，我还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和你们一起工作。

王选把这次与日本律师的相遇当成上苍赋与她的人生使命，从此把自己的生命和细菌战诉讼联系在了一起。她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退了工作。带着松井英介、森正孝等日本友好人士一年数趟前往义乌崇山村调查取证。“我是义乌人，国仇家恨，没有理由可以推托。”

崇山村把希望寄托在有文化、懂日语、具有同样受害背景的王选身上——70岁以上的老人拜托她：“你要帮我们跟日本人打官司，要他们赔偿！你是义乌人嘛。”

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总代表。

1997年8月11日，原告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正式为它50年前实施的细菌战谢罪道歉，并做出经济赔偿。

在长达5年的诉讼过程中，王选和日本律师一起，多次



王选在抗议活动中

到中国、美国调查取证。

王选长期和这些日本律师合作。对她来说，她是在和这些追求正义的日本人一起为和平而战。谈起同日本人合作的问题，王选认为，这些日本人在做一个日本人应该做的事，我在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我觉得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立在一定理念上的一种交往、一种友谊和信任。”在长期的合作中，王选以她坚强的意志，她大无



王选在浙江崇山村



畏的勇敢精神，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不光赢得了原告们的信任，还赢得了日本律师们的尊重。

诉讼的过程，是把细菌战事实逐步公诸于世的过程，也是中日两个民族的人民互相理解、化解仇恨的过程。王选一次又一次把日本友人带到了受害地，让他们在实地了解战争、细菌战在中国人民的心里留下了什么。

森正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到崇山村时的情景：“当我们乘坐的汽车进村时，一下子围上很多人来，将汽车团团围住，使我们无法通行，维持秩序的中国人挡住人群，让我们下车，这时围观的人用汉语冲我们大声喊叫，我不懂汉语，不知道他们喊些什么，但是我心里感到纳闷，为什么这么多人把我们团团围住，并不停地冲我们大声喊叫，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于是就问陪同我们的翻译。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跑过去跟自己的上司商量后，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喊你们是‘日本鬼子’。”

同去中国的日本电视制作人近藤昭二回忆说：“在常德受害最严重的村庄采访时，路过的几位老人看到我们后，就冲过来想抓住我们，并大声地训斥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你们还要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在老人们那满含悲伤、愤怒和蔑视的目光注视下，我们无言以对，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

掌握了大量的受害事实，也就越发清楚地认识到，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

1998年2月16日，对王选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她终于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作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代表向法庭陈述意见。王选清脆有力的声音在法庭大厅里回荡，代表中国人民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罪恶，表达中国人民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全面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强烈呼声。

尽管细菌战诉讼仍然败诉了，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诉讼所造的声势最为浩大，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2000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的著作《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出版。哈里斯在该书的“中文版谢辞”中写道：“特殊的谢辞献给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她在用自己的全部为揭露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为受害者伸冤而战斗。王选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我和我的妻子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和她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和尊敬。”

从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下达后，王选回到国内再次开始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取证。一项范围



王选（赵全海摄影）

更广、参与人员更多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工作已在全国许多地方展开。

王选的一生注定要和细菌战连在一起了，一家媒体这样评价她：一位英语和日语都非常精通且不图任何报酬而与日本政府较劲打官司的中国女人；一位经常被人骂为“有

病”而让英国广播公司（BBC）年轻、漂亮、干练的女制片人流泪的中国女人；一位经常被骚扰（其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还不被众多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女人；一位在一个中国男记者眼里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女人有些失败的中国女人。2002年，王选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成为十位当选人物之一。王选感谢有那么多媒体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关注和支持，但她不希望外界都把成绩归功于其个人。王选感叹道：“一个人的精力太有限，我只能说不会半途而废，不会放弃这个事业。但我最大的希望是，越来越多的人士加入到这个正义的事业中来。”



下篇

第一章

总有些东西 让我们泪流满面

——《未被审判》采访手记



当我流下泪的时候，我不仅仅是为
了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为了我的同
胞和我自己。

——题记

(一)

最近这一次跑北京，是为了采访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在中国的上层，很少有人知道他。可在中国的最下层，在那些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中、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中、那些一生在贫穷和歧视中苦苦挣扎的穷人中，却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他曾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郑重地订过合同，一纸不平等的合同——对于他是完全不平等的：这纸合同将会把他牢牢地系在责任和义务上，却无法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他是日本一位著名的律师，名字叫小野寺利孝。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在田中访华的时候，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在日军侵华期间受到残酷伤害的人，都诚心诚意地支持政府这样做。一来，在那个时候，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脖颈上并没长自己的脑袋，二来，以德报怨、宽宏大量，不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吗？

到80年代中期，中国有学者站出来说：国家赔偿和民间赔偿不是一回事，1972年政府宣布放弃的只是国家赔偿，



而受到日本侵略军祸害的中国人有权利以个人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这位学者的话使一些战争受害者激动了起来。他们在试试探探地问自己，话还没出口就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难道，那些血海深仇，今生今世真会有一个说法吗？也直到这个时候，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人才知道，宽容，并没使一切过去，那些仇恨、那些伤痛，其实一直就埋在心里。



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

此后，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陆续开始：花冈暴动案、刘连仁劳工案、山西慰安妇案、731部队细菌案、平顶山屠杀案、无差别轰炸案……陆陆续续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或其他地方开庭。到2003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部分胜诉，标志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不会有人想到，推动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支持着这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而全部来自这些日本人。其中，我有幸结识的小野寺利孝先生是始作俑者之一。

当我流下泪的时候，我不仅仅是为了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为了我的同胞和我自己。

我是专门为了认识小野寺先生去北京的，我有着一个很功利的目的：从他那儿了解刘连仁诉讼案的全过程，然后，利用这些素材写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过去，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当在本子上准备着采访大纲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戒备、猜忌和怀疑：一个日本人为什么无偿地为中国人打官司？他有什么个人目的？他会把心底的话告诉



我吗？如果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傲慢和歧视我将如何应对？以往的采访从来不做大纲，这一次，我做了，并且想好了各种应对之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如果他摆出一副中国人的救世主的架式的时候，我要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中国的落后和日本的经济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你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这样做！

他事先并不知道我的来访。但在从翻译那儿得知我的来意后，他从在北京停留的一天半时间里挤了半天和一顿晚餐的时间给我。刚开始，我就对他说：希望我们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交谈，哪怕是会令对方难堪的想法。他听着，笑了，然后说：好的。

我就这样开始走近了这个日本人，也走近了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一个群体、一个领域，并且一下子把自己也陷了进去。

2001年9月

(二)

采访在他的房间里进行。开始，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此行的目的，最后说：我读过您的文章，从而知道，您是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您爱着您的国家。我也是个爱国

主义者，我也爱着我的国家。但是我希望，将来我写成的东西，既不是中国的正义，也不是日本的正义，而是人类的正义。他仔细地听着，很有力地点了点头。

我列举了七个要采访的问题，例如：您为什么代理此案？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您的个人经历？您在此案中的风险和收获？此案在日本法律上的障碍和突破？它的前景？请您谈谈您对日中两个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的不同的认识……我选择的是一些我急需了解和想来他比较乐意回答的问题。另外还有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想留待采访进行了一段气氛比较好的时候再相机行事。

他拿着一个大本子，把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记在上面，然后说：我很乐意回答，但我会把这些问题打乱。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开始。

小野寺先生出生于日本一个贫困的矿工家庭，当他年幼的时候，父亲因为在矿山工作得了尘肺病而被解雇，而造成父母婚姻破裂，而他也因为家庭的变故饱受社会的歧视。贫穷的家境使他无力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到化工厂工作。但他的个人奋斗也就从这窘境中开始了。他说：“正因为饱受贫穷和歧视，因此我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摆脱这种状况，同时，少年时的这些感受，也就成了我



以后走上今天这条路的基础。”

在工厂工作一年后他去读大学，选择的是法律。大学四年级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毕业后，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在日朝鲜人人权案。

就在这时候他的介绍使我产生了第一个兴奋点。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律师，在更大意义上，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为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改良人类社会而奋斗的斗士。

我问他：“您主要代理哪方面的法律事务？刑事？民



摄制组在日本采访侵华老兵家属

事？”他想了片刻，才回答说：“既不是刑事，也不是民事。我的诉讼的性质，我叫它现代型诉讼。”这个词汇，我后来想了许久，我觉得，可能用社会型诉讼更为恰切。

为了方便我理解，他给我举了他刚出道时代理的一个案子。



小野寺利孝在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馆

东京的60年代初，还有许多的贫困区，其中一个贫困区里有一条脏水沟，某一天，一个孩子掉在里面淹死了。警察把妈妈抓了去，法院判妈妈没尽到监护的责任，判了缓刑。他告诉我，在那个时候，日本的社会现状就是这样的。被判了刑的妈妈找到了他。如果他按照一般的处理方法，这将是一个民事案例。但他代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一带后来又对全东京的贫困地区做了调查，调查发现在贫困地区有许多这样的脏水沟，并曾经有很多孩子丧命于此。于是他发动所有受害儿童的家长和周边居民参与诉讼，诉讼的对象是地方自治体也就是当地政府。这场官司打了很久，官司的结果是以后这样的水沟都加了盖，再也没有孩子被脏水吞没。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中，他的处理方法如出一辙。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律师也从关注自己同胞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了国际，走向了关注人类命运和前途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后他回答我关于战争的问题。在那时候我产生了第二个兴奋点。

他说：“我的一个舅舅在战争时期被强行征兵，到了菲律宾，登陆时被美国飞机炸死了，另一个舅舅战时被强行

征到军事工厂做工，工伤而死。可以说，我们家也是战争受害者。我妈妈是和平主义者，她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她只是一位从受害者意识出发的和平主义者。”他这句话使我精神一振，不由得打断了他，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日本挨了原子弹，因此许多人反对核战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对，日本的反核团体，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日本的和平团体，也基本上都是这种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意识不到日本在战争上的责任，意识不到在战争中日本是加害者。从加害者意识去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日本很少，并且，被排除在主流意识之外。”

他没说他自己。但是，当他从理性上对反战者做了如此分类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从那种境界中走出来了。

他在律师的行当里干了30多年，代理过在日朝鲜人人权案、在日菲律宾人人权案、韩国慰安妇案……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我代理在华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是很自然的。”

但是，要有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他1994年第一次访华。

2001年9月

(三)

1994年，小野寺先生参加了一个法律代表团，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说是第一次，但他对中国并不陌生。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到，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毛泽东，曾经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年轻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小野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告诉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研究了中国革命。那些著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和我交谈的时候还经常随口引用毛泽东的话，比如统一战线、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

这次的行程是从沈阳到南京，然后到北京。在沈阳和南京，他参观了许多与日军侵略有关的遗址，与许多战争受害者交谈。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话又一次使我感动。“在来中国以前，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可到了中国，我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的意思是说，踏上了曾经被日本侵略军蹂躏过的土地，亲眼见到受害者，亲耳听到他们的诉说，才使他真正体会到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巨大的伤害，认识到自己的先人曾经犯下怎样的罪行。这种体会，成为他奋不顾身地投身

这一事业的最强烈的动力。

他说，那时候，面对战争受害者的控诉，他无颜以对，只能一次又一次表示谢罪。

从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当时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公开讲话，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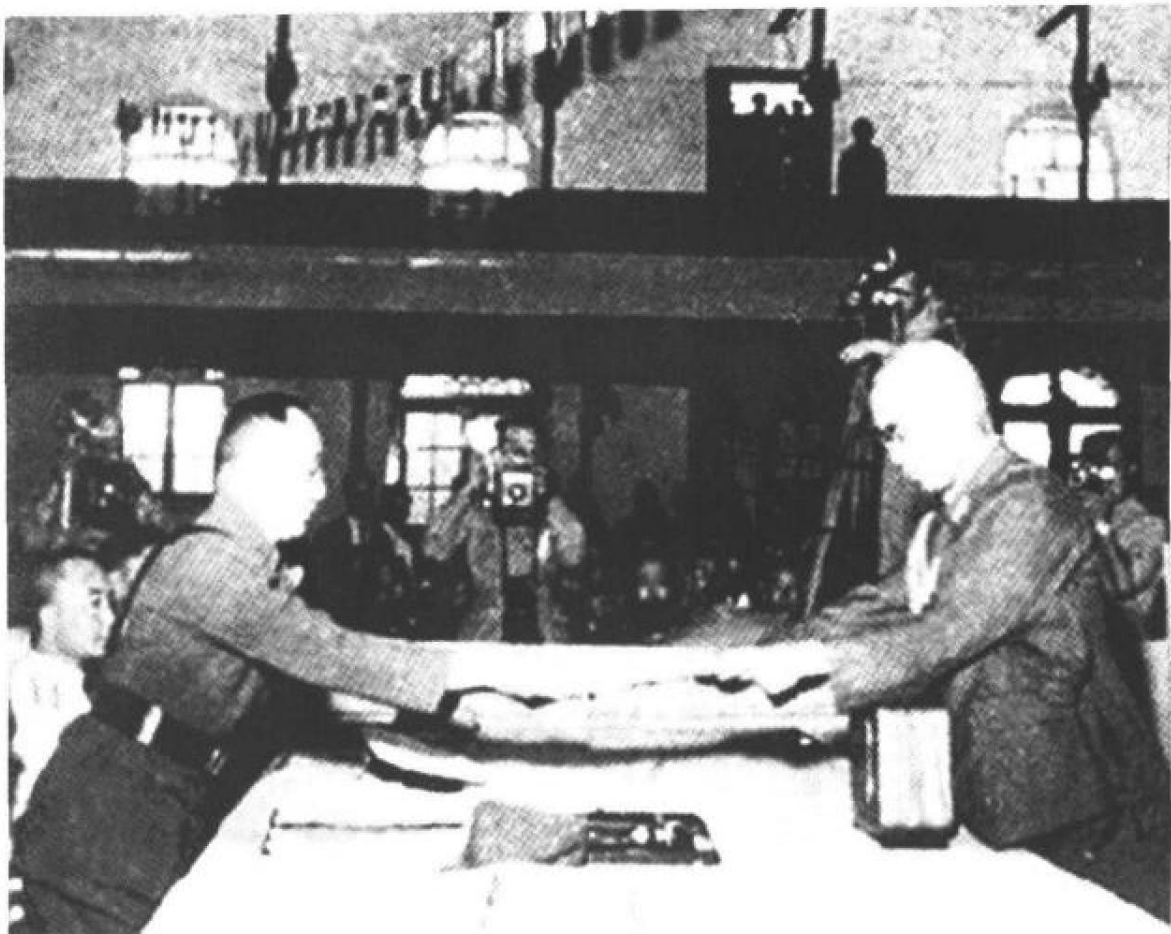
他说他感到非常耻辱，当即和团里其他几位律师写了抗议声明，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回到宾馆又招来一些日本记者召开招待会，在会上宣读他们的抗议声明。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位日本记者把他推上了现在这条路。

那是一位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已经在中国驻了三年。其间曾经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报道发回日本，期望用这种方式引起日本民众的注意，不意却毫无反响，令他怒火万丈。在这次招待会上，他用挑衅的口吻对这位律师说：“你们来中国搞什么法律事务调查？有比法律事务更要紧的事你们律师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他说，面对这位记者的当面发难，他仍然不是无路可退。但犹豫再三，他决定还是走上了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辩护这条路。

“那使你犹豫的东西是什么呢？”我问。

“你知道，在日本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官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投降书

司拖10多年是很平常的。而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更艰难。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战争受害者败诉的判例，也就是说，即使我去打，拖上十几年，其结果也很可能是输，而我当时已经53岁了，就是从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我也不可能再承受得起了。”

“哦，那个时候，您已经功成名就，又已经年过五旬，

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迟暮之感？而接受了这样一种挑战，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一种生命被重新激发的感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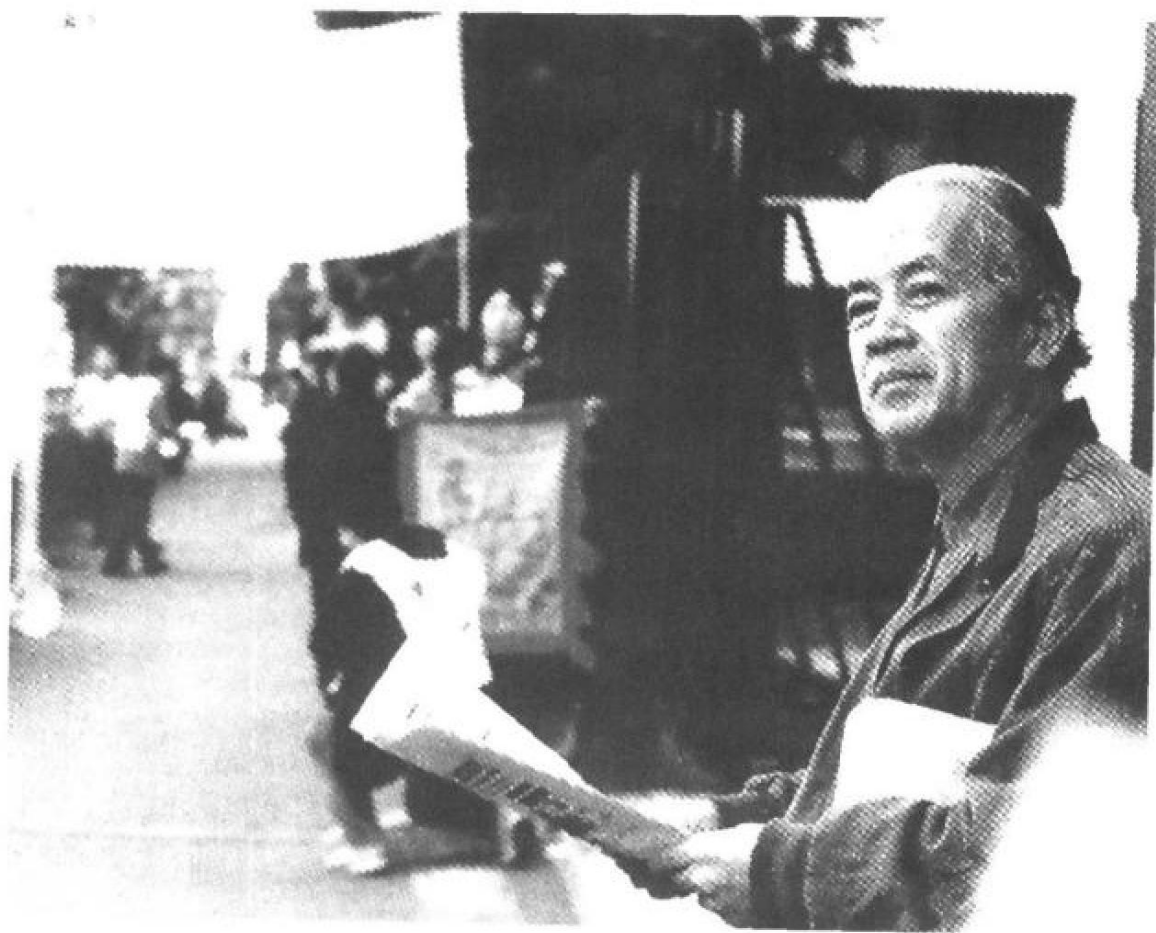
他笑了，连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做这样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诉讼，对我确实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

当他决定迎接这次艰难的挑战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过人的谋略、远见以及组织才能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说，他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他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但最终一定要取胜的诉讼。为此，他需要组织一个团队。当时他已经在日本法律界有些名气，但他觉得还不够，于是一回去，就去拜访律师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这位律师曾经为教科书的问题和日本政府打了30多年的官司，最终终于胜诉，在日本社会各界都影响极大。他要组织一个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日本律师团，请这位律师出任团长，他自任干事长，又煞费苦心找了另外一位年轻力壮的后起之秀进来，组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核心。他说他想到了此类案件在日本法律上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选择进入律师团的成员时，他要选择那些富有智慧的律师。他说的富有智慧，是指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在法庭上确保胜利；另外，这种律师还要能通过诉讼创造法理，



也就是说，能够在诉讼过程中想办法逾越法律障碍，或者通过诉讼迫使日本国会修改法律。

此外，他还想到了，这种官司，事实上要在两个战场同时展开。一个在法庭上，法庭上的官司，重点是有不可能被推翻的证据，利用这些证据，迫使日本政府认罪；第二个战场在法庭外，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全



花冈诉讼日本律师团支持会成员林伯耀

是毛泽东语言)，利用社会的力量，迫使政府改变对战争的态度，并迫使国会为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立法。因此，几乎在律师团成立的同时，他又发动日本知识界成立了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支持会和由各界民众组织的在华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后援会，广泛筹集资金，保证他们的诉讼能旷日持久地进行到底。

当他这样运筹帷幄地指挥和布置着这样一场战役的时候，我想这个已经 53 岁、开始走向暮年的生命真的是被激发出来了。

最近这次见到他时，一位当年曾经和他交谈过的中国学者介绍说：当时，小野寺找到他，和他谈起回去要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事，当时的小野寺说：“我 53 岁了，头发还是黑的。我用 10 年的时间，打到白头怎么样？”

我这次见到他时，他已是满头华发。

2001 年 9 月

(四)

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提起谢罪索赔诉讼目前已经有 20 多起了。这 20 多起官司中，绝大部分由小野寺先生所在的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举行抗议活动

律师团代理。我看到好几份代理合同，上面受委托律师一栏里，都工整地写着他的名字。而且，这些官司中，除了花冈是起诉加害企业鹿岛企业外，其余的绝大部分官司，如果起诉一个被告，那被告就是日本政府，如果是两个以上被告，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他以他的胆略和智慧，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政府。他说这是最难的，但，却是他最终目的之所在，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日本和平人士抗议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

他代理的第一个原告，就是在日本山林里当了13年野人的山东农民刘连仁。在这一选择上，可以充分看出这个人的智慧：他说，之所以首先选择刘连仁案，是因为他考虑，可以把刘连仁案当成整个诉讼的突破口。他谈了几个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是：第一，刘连仁的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更容易在日本民众中赢得广泛同情，也使日本政府无法逃脱；第二，他对刘连仁案事先做过分析，确定起码有一部分必定能够胜诉，而胜诉则会对以后的诉讼形成巨大的影响。他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按我们1995年提起诉讼时的设想进行的。

外人很难想像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和本国政府打官司经受的艰辛。

最大的艰辛可能并不是来自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最大的艰辛可能恰恰来自他们极力想帮助的中国人。比如，事先约好的受害者突然避而不见；再比如，已经安排好的见面会又突然取消。

我得公正地说，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极大改善。

令他们更感慨万千的是那些他们正在帮助的一部分战争受害者。

我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战争、奴役、贫穷，使他们从

来没有接受教育、接触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境界的机会。他们把他们经受的一切当成了命运使然。当别人问他们对过去受到的伤害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茫然地抬起眼睛，不知所对。如果解说得更详细一点，他们会眼睛发亮，因为知道可以得到金钱的赔偿。当然有人表现出铮铮硬骨，但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种蒙昧的状态。（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完全忠实于当初我的感觉。后来采访到的事实使我对我的这一判断有了很大改变。事实上，受害者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坦荡胸怀，他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尊重。我以他们为骄傲。）

有人告诉我，代理慰安妇案的是日本一位女律师。为了取证，她一次次自费跑中国。在山西，她曾经和慰安妇一起住在窑洞里，而有些人，把日本人都看成阔佬，还想在她身上敲下几个。

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一定不是她一个。

这也是我想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之一：“当你面对那些素质比较差的当事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什么？你会鄙视他们吗？”我想对他说不要那样做。他们蒙昧，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后来，由于时

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来得及向他提出。但我想他不会的，因为活出来的人会比较容易理解没活出来的人。

还有的阻力来自长期的战争和隔绝造成的两个民族心理上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

他找到的每个受害者开始都对他们有深深的戒备：你们为什么要免费代理我们的案子？你们在这案子里有什么好处？万一我输了你们怎么向我要钱？万一我赢了你们会把钱给我吗？

他们苦口婆心地解释自己的动机。后来，他们和受害者都建立了比较信任的关系。我说比较信任，是因为那只是较之开始而已。事实上，就在我这次采访中，一个接受他们无偿帮助六七年的当事人还对我说：“我懂点日语，小日本儿糊弄不了我。我不能全听他们的，他们到底是小日本儿。”

我不能责备他。事实上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戒备。

因此，这也是我准备在采访后期向他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互相沟通的过程。您可能发现许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相信您一定也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到头来也是无法沟通的。告诉我，那是什么？”

我想像当初他们刚开始代理诉讼时的处境：在国内忍受着右倾势力的巨大压力（换到中国，这样的人，完全是可以被骂做卖国贼的）；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在当事人那儿，得不到信任。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支付着生命，到底为了什么？

而他们，仍然活得这样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自己和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了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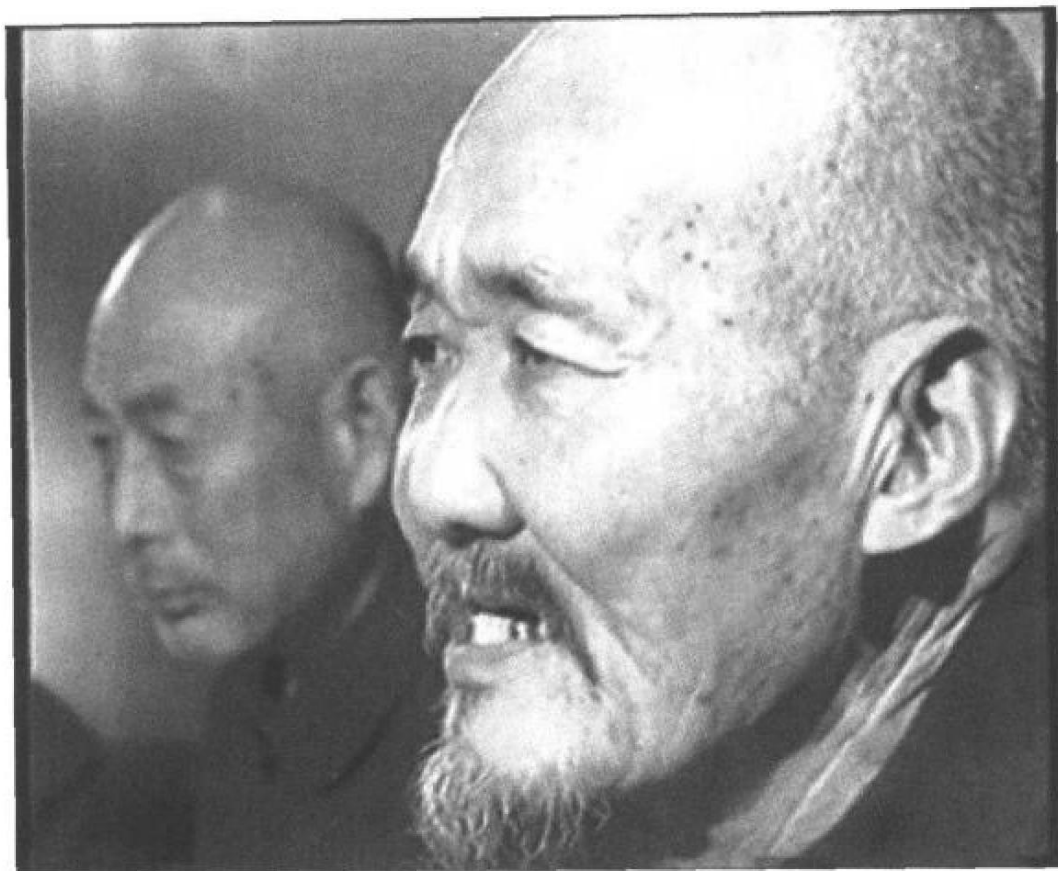
我想，能鼓舞他们的，只有信念——相信自己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的信念了。

2001年9月

（五）

他确实需要有智慧和有极大勇气的律师团队，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和现行司法制度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后来在采访日本律师团下设劳工律师团团长高桥融时，他曾慨叹在日本和政府打官司难。我问难在何处，这位律师面露为难之色，不知道如何把复杂的政体问题和法律问题向我这个中国人解释清楚。后来，他字斟句酌，非常吃



耿淳在日本法庭

力地向我解说着，惟恐说得不明白，但令他想不到的是，还没等他说完，我就听懂了。

我说：“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是这个意思吗？”

他说：“对，是这意思，可是你……”

我笑了。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如何对他说的现象听



摄制组在东京地方
法院门前采访

不明白？

战败前，日本审判部门、检察部门和律师都统属司法省，任何审判都是天皇的审判，要按天皇的意志进行。战后，律协从法务省的管辖下独立出来，而法官一直属法务省领导，法官由法务省任命和委派。也就是说，当法务省作为国家的代表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坐在法官高背椅上的是他们委派的和受他们领导的法官。在这种司法体制下，

法官和法务省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高桥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日本政府已经就刘连仁案的败诉提起了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已经确定，而这位法官先生就是初审时领导被告律师团的法务省官员。不过，高桥先生马上解释了一句：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以为国家是有意选择这个人来对付我们的。

另外，二战结束时，由于美国的支持，日本天皇体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来天皇的法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的法官，也就是说，如果法官判战前政府在法律上有罪，也就意味着在判自己有罪。

至于法律上的障碍，只指出一点就可以了——在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为20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想到提起诉讼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50多年。事实上，许多索赔诉讼就是以这个理由不被法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以这个理由被判败诉。

也就是说，如果严格依照日本现行法律，所有的索赔诉讼都是不可能取胜的。

此外，在战前的日本，还有一条法理，叫“国家无答责”，意思是，如果个人受到损害，哪怕这损害来自国家，国家也没有理会和赔偿的义务，根据这条法律，国家可以

对到战败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概不负责。战后这条法理不存在了，但是根据法律不溯及以往的精神，对此前发生的一切，国家仍然可以用这条法理保护自己不被追究。

正因如此，后来别的律师告诉我，在这些对日本政府的诉讼法庭上，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场面：无论起诉方列举



刘连仁被发现时的样子



刘连仁回国与亲人相见时的照片

什么事实和证据，被告国家方的律师都一言不发，昏昏欲睡地任他们把法庭变成口诛笔伐的战场，因为他们知道，任凭对方说下天来，凭借这法理，任何法庭都奈何不得国家。

这种状况，直到东京地方法院判刘连仁胜诉时才有了改变。那一天，代表国家的律师突然慌成了一团。他们低估了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律师们的智慧。

在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我把他们的诉讼策略，整理了以下三点：

一、用国际法来逾越日本法律。国际上，对奴役劳工，对战争受害者，有着详细的索赔条例，并且明确规定，战争赔偿，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用法的精神，逾越法的条文。各国民法的精神都大致相同，那就是公平正义。在他们的辩护词中，我屡屡看到，当被告方用法的条文反对诉讼请求的时候，律师们引用这一法的精神反驳说，这种说法，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的精神。

三、那就是要找到胜利的突破口了。如上所说，他找到了刘连仁。

在刘连仁诉讼案中，刘所诉受侵害的事实大概分两部分，一是被强迫抓到日本做劳工并受到奴役待遇；二是逃

亡到山上在战争结束后又过了13年非人生活。这位律师说，前一部分，在现行的日本法律下很难胜诉，但一定要提出来，要强迫法庭认可这个事实，认可事实就是胜利，就可以让日本国民知道；第二部分，则是必定可以胜诉的。这一部分认定的是日本政府可以救助而没有尽到救助责任的事实，而战后，国家无答责的法理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对它的责任造成的损害事实有应答的义务和赔偿的责任。他说，只要这一部分胜诉了，那么刘案就成为战争索赔胜诉的第一个突破口，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001年9月

(六)

刘连仁这个名字，曾经有个时期，在中日两国都家喻户晓。这位普通的山东高密县农民，1944年外出打工回来，啃着一块干粮、披着妻子还没来得及缝上衣领的棉袄被传到村公所问话，就此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上做劳工，一年后不堪忍受奴役逃亡到山林，一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在北海道的山林里，他度过了13年的穴居野人的生活。

历史有时候会选择某个人来承担某种责任，刘连仁，这个几乎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注定是要再一次被选中

并永远记载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

提到刘连仁的时候，小野寺先生和他的同伴们脸上写满了敬重。

他说，当初他找到刘的时候，就对刘说：他代理刘的案子，但目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诉讼，而只是要用他的案子做突破口，迫使日本政府最终解决战争期间奴役中国劳工的问题。在刘案上，他们要起诉的是日本政府，一来，当年加害刘连仁的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二来，他们有意通过刘连仁案，把日本政府直接拖进战争赔偿诉讼中来。

小野寺先生说，当时，刘连仁听懂了，并慨然应允。

尽管当时刘连仁已经80多岁，尽管他知道一旦被纳入如此庞大的一个战役中，在有生之年很可能得不到任何赔偿。

对他的过去，也许只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他的气节和为人：

1958年，当他在北海道的山林里被人发现时，13年穴居的生活已经使他几乎忘了人的习性和人的语言。三个月后，被送回中国时，日本各界为他捐了数目不菲的一笔钱，刘分文未取，全部送给了当地的中小学。当他登船时，当时日本政府代表到码头上去送他，又拿出一笔钱给他。刘

问：这钱是谁的？如果是你个人的，你是好意，我收下，如果是日本政府的，我不要。政府代表含糊其词，于是刘一把推开，然后身无分文地上了船，并且在上船前当着许多日本媒体的面，公开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

习性和语言都丢了，一身的骨头还没软化。我的父辈和祖辈们，曾经活得这样刚硬！

50年后，当他到日本法庭上作证时，被告律师问他不是识字，他回答说识。可实际上他识的，差不多只有刘连仁三个字。儿子说：何必这样呢？你这个年龄，文盲也没人笑话。他回答说：我在日本人面前再也不想输一点儿了。

还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对日本律师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将继续替他打官司，儿子不行了，有孙子。小野寺先生从他的话里一定想起了中国的愚公移山，后来他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引用了刘的这句话，对法院说：不要指望拖下去，拖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死光了就没人追究了，他们还有儿子孙子。

在刘连仁身后，我看了一些他接受中国或日本媒体采访的录相。其中有一段是他在日本电视台做的访谈节目：电视台的主持人问他：“为什么50年后才想到提起索赔诉讼？”我想这位主持人大概希望刘连仁义正辞严地说出一

番道理来，但刘连仁只是硬邦邦地答：“嗯。”主持人以为他没听懂，又问：“您过了50年才提起诉讼，是吗？”刘连仁还是硬邦邦地答：“嗯！”

我猜他的画外音是：你别和我谈法律，我受了害，什么时候想讨还公道你都不能说晚。那是我的事。

从刘的身上，我想到，不要抱怨自己在国外或者在什么人面前受人歧视，只要你活得真的像个人，你就会赢得尊重，哪怕你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刘连仁诉日本政府案经过漫长的诉讼，其间开过10多次庭，刘连仁多次赴日出庭作证。有一次，对方律师一连向刘连仁提了180多个问题，刘连仁句句掷地有声，没出一点差错。有人对刘连仁惊人的记忆力表示惊讶，刘的儿子说：那些事，纠缠了刘连仁一辈子，他就是想忘也忘不了。

刘连仁没能等到胜诉那一天，2000年底抱憾而终。刘连仁的儿子和小野寺先生重新签定了委托书，继续打着和日本政府的官司。

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宣判了刘连仁诉日本政府奴役劳工案，刘连仁的儿子抱着刘连仁的遗像上了法庭。一切如小野寺先生当初所料，对战争期间的事实法院给予了认定，但以超过诉讼时效和战前国家无答责为理

由驳回；对战后13年，法院以日本政府该救助没救助为由，判日本政府败诉，赔偿金额不低于2000万日元（刘连仁起诉书中提出的全部赔偿金额是2000万日元）。

刘的儿子介绍说，当法院宣判最终结果的时候，对方律师乱做一团，而这些为此案奋斗了6年多的律师都哭了。律师团团长尾山宏没哭，但当刘的儿子和他握手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居然一下子瘫倒在地。

谁能体会他们那一刻的酸甜苦辣？

当夜，他们喝酒到天明。

2001年9月

（七）

10月24日从广东出差回来，25日在家休息一天，26日一早，就坐上了去青岛的火车——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的小野寺先生、高桥融先生、森田太三先生和另外几位律师定于那天到青岛，我赶去和他们会合，继续我的采访。

突然发现他们每次来中国都是周五，问了一下一直在义务给他们做翻译的朱女士，她告诉我，这么多年，他们



示威者向路人发放传单

总是这样安排他们来中国的行程：周五早来中国，利用一个整天两个半天在中国工作，周日下午返回日本（这次因为在北京要参加一个会，他们的行程延长了两天）。朱女士介绍说，在周一至周四的时间里，他们在代理别的案子，用那些案子的收入，来维持这些诉讼的庞大支出。

中午下了火车，租了一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流

亭机场，正好赶上迎他们下飞机。然后就和小野寺先生继续乘着那辆出租车，驱车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高密刘连仁家——小野寺先生提出要亲自来给刘连仁扫墓，把初审胜诉的消息告诉九泉下的他。事先，朱女士遵小野寺的嘱咐，在青岛给他买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日本律师新美隆

许多人是从小言的《红高粱》中知道高密这个地方的。在小言的笔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活得肆意汪洋、任性天然。当日寇踏进他们的家乡的时候，这些手持着大刀长矛的农民吹着娶亲的唢呐上了战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漫山遍野的红高粱。但今天我眼里的高密农民温顺而安静，庄稼收了，地里没了营生，人就在村头闲站着，汽车从他们身边驰过，引来几许好奇的目光。

刘连仁一家早就知道小野寺要来的消息了，我们刚进村口，远远地就看到一所红砖小院前站满了人。刘连仁高大的儿子把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介绍给小野寺，用浓重的高密话说：这是俺娘。老太太满头白发，身子还硬朗，小野寺通过翻译对她说：很遗憾没能早些来，没能见刘连仁最后一面。老太太却只是沉默着，听不明白一样看着他。我不由得为她着急，再看小野寺先生，似乎也有几分尴尬。

在屋里沉默地坐了几分钟，有人提议到院里坐，于是又转移到院里。小野寺刚要坐下，老太太冷不丁地抓住他的手，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俺的亲人啊。”一边说着泪水就从皱纹纵横的脸上流了下来。小野寺愣住了，随后，仍然抓着老太太的手，弯下腰，稍稍仰起头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地看着老太太哭泣的面孔。在那一刻里，院里的人都

不说话，只看着他们一个哭，另一个默默注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老太太饱经风霜的面孔，令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按年龄算，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也应该是这个岁数了）？

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就再没说过什么，而小野寺却没了当初的尴尬，继续在翻译的帮助下向老太太介绍着情况。其间刘连仁的儿子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委托书和一盒印泥，抓起母亲的一个手指在印泥里按了一下，然后按在委托书上。我们大家都被他逗笑了，只有老太太没笑，仍然看着小野寺，而小野寺则在她的注视下低下头去，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面巾纸，拿起老太太刚刚按过指印的手指，帮她把上面残留的红印泥细细地擦了去。

刘连仁的坟墓离村庄有一里许，听说是县里的特批，墓地比旁边的坟墓要大。没有墓碑，只有一道青砖矮墙，围着一堆黄土。听刘的儿子介绍说，有人捐了一块好几吨的花冈石碑，因为太大，一直还没运过来。心里竟有些微微的遗憾，觉得那块巨碑其实不必。刘连仁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正因为他的普通，他一生的经历和他的斗争才更有普遍的意义。

小野寺把那束白玫瑰献给刘连仁墓前，在墓前双手合



十长久地默哀。后来，有人问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他说，他脑子里总晃动着第一次见到刘连仁时刘的样子。那时候他曾经对刘连仁说，总有一天，他会把胜诉的消息带给他，



细菌战一案第二十六次开庭的时候，常德组成了自己的声援团（右二为王选）

但今天胜诉了，却已是天人永隔音讯难通了。

从刘连仁家出来，我们又在暮色中摸到另一个村子，当年，这个村也有一个农民和刘连仁一起被掳到日本，后来和刘连仁一起从煤矿上逃出来。和刘连仁不同的是他很快就被当地的日本军警抓了回去，还被打坏了一条腿。如今老人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我们进院时，仍然在拖着一条跛了的腿在收拾院里晾晒的玉米。小野寺详细地向他询问当年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追问再三，一边问一边在带来的大本子上记。天迅速地黑了下来，他仍然摸黑写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可能是老人的孙女不声不响地跑到屋里，打开了挂在窗口的电灯。

当我们从老人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没吃晚饭，马不停蹄地往青岛赶，因为第二天，我们将在那儿和一些受害者以及受害者遗属见面。

2001年11月

(八)

27日，在青岛，在一次由中国学者和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及遗属以及日本律师团参加的见面会上，我见到了

几位中国战争受害者。对他们的采访，极大地改变了我原来的担心和歧见。

当年被日本侵略军强行掳到日本做奴隶劳工的，据日本政府自己的统计，不计途中大量死亡的，有四万之巨，实际人数还要多。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回到了家乡，但过去的创伤远远没有痊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生活在由此造成的贫困、伤病和政治的歧视中，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和过另一种生活的机会，终生挣扎在贫穷和愚昧里。岁月流逝，许多人已经辞别人世，活着的，也已经是风烛残年，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频率一批批在人世间消失。在会上，就有参加过劳工情况调查的学者说，头一年统计的数字，第二年再落实时就消失了一大半。早有日本律师介绍说，日本政府和当年的加害企业，考虑到自然规律，所以对受害者赔偿问题也多怀了几分侥幸心理，希望再坚持几年，人死光了，债务也就一笔勾销，也正因如此，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希望能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情况开展抢救性的调查取证。

当握住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子安那粗糙的大手时，我的心里一动。面前的老人，慈眉善目，眉眼或神情里，不知哪儿总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父亲。甚至，他们早年的经历也

有几分相似：同长在山东胶东地区，同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投身到反抗侵略的战斗中。但命运在那以后开始分叉：我的父亲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而王子安老人则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俘，随后被强送到日本做了劳工。如果相似的遭遇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今天我会在哪里？

王子安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文革”时流行的人造革提包，把手全坏了，包着黑布，用粗大的针脚密密麻麻缝着。说话的时候，声音不急不徐，微微笑着，带几分窘迫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但那温厚的讲述中，总有些东西让人动容。其中一处，是谈到在日本做劳工时受到的苦，此时他突然把话题一转，和善的目光看定了坐在他对面的几个日本人，说：“战争，给日本也带来多少苦啊。那时候你们国家实行配给制，哪有什么吃的？在我干活的那个地方，你们的老百姓吃什么呀？土豆和南瓜煮煮就是饭。”我正在记录，听到这几句话时，突然有点绷不住：这就是中国人啊，这就是中国人仁爱宽厚的胸怀。那个时候，他自己吃的什么？可他还记得日本人受的苦。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温顺和气的老人，数年间，却一直自费到处联络着当年生死与共的受害者，准备和日本政府打一场50多年来从来没有结束的战争。他仍然用那种

平静的声音说：我和他们几个商量，这官司可能打不赢，我们还打不打？商量的结果是：打得赢也打，打不赢也打。语气仍然平和，字字掷地有声。一语即出，全场气氛为之一震。

来自河北的农妇王小扶是另外一种风格。她不是劳工，她是劳工的女儿，但她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当年，日本兵到她家掠她父亲的时候，她才五岁。五岁的孩子看到有人要绑了父亲走，哭喊着扑过去，一个日本士兵端起刺刀对着她就捅过去，在她肚子上留下一个伤疤。也许童年时的这段经历，造就了王小扶刚烈不屈的个性。10年前，一听说有人和日本政府打索赔官司，王小扶就激动起来。当劳工的父亲没等到这一天已经死了，可留在她肚子上的那个伤疤似乎从来没有痊愈。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起诉，她只知道，那笔债，一定要让日本政府给个说法。从那时候起，整整10年间，这位农村妇女靠自行车、靠两条腿，靠从一家人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跑遍了河北的村村镇镇，到处联络当年和父亲一起受害的劳工。10年间，这位农村妇女在乡间的小路上奔走呼号，用她的激情、她的勇气、她的至死咽不下这口气的硬骨头。这次到青岛，她带来了年轻的女儿。她说如果她死了，就让女儿代替她继续努力。那戴着眼镜的女儿，可能是顾虑到

在座的有日本人，因此当王小扶说话的时候，她一次次去扯母亲的衣袖，提醒她要注意分寸。最后一次，女儿用的力气大了些，王小扶竟一把把她的手打开了，用很大的声音说：“别管我！不取得胜利，我死不罢休！”

10年中，她前后找过的人有3000多个，找到了几百名劳工或者他们的家属。3000这个数字把日本律师吓住了，他们用怀疑的口气再三问：“3000？”“3000！”王小扶一次次用肯定的口吻答。日本律师看着她窃窃私语，小野寺先生仍然用怀疑的口吻问：“你找到的劳工，记下名字了吗？”王小扶朗声答道：“我自己印了登记表，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他们本人，另一份找了他们的村上盖上印，全在我这儿保存着。”说着就把厚厚一叠表拿出来。日本律师这一回信了，同时发出了惊叹，在他们注视这位农妇的目光里，我看到由衷的敬意。

最近，王小扶终于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中国律师，并且和她联络到一起的受害劳工集体向河北高院提起了起诉。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在国内提起的第一起状告日本加害企业的诉讼。诉状去年递了上去，河北高院收下了，到现在还没消息。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和日本律师谈到了这几位受害

者。我说：以前，我有种担心，总怕这些受害者因为一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机会受教育和见识更多的东西，会表现得不够好。可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令我自豪。日本律师频频点头，并且告诉我说，在他们这几年的工作中，这样的受害者他们还见过许多。“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愚公移山。”他们这样说。

2001年11月

(九)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像王子安和王小扶一样表现出应有的骨气，贫困和愚昧，原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也就有了我后来这次永难忘记的、充满了耻辱的采访，采访的地点在北京，采访的对象是我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代理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日本女律师。

她代理的慰安妇案2001年5月已经败诉，她又代理受害者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她这次来北京，一是约见一位原告的代表者，请他陪同几位受害者赴东京出庭做证，二是在一次中日两国共同召开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汇报慰安妇案的进展情况。她在北京一共呆一天半，热

心的翻译朱女士硬在她紧张的行程中安排了一个晚上接受我的采访。

我到北京时她的飞机还没落地，朱女士建议我不妨等这位女律师共进晚餐。可在此前青岛的两天里，我一直和日本律师们一起吃饭，而且全部是他们付费，这种情况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因此，一到北京，我就坚决拒绝了共同进餐的邀请。



摄制组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前采访

晚饭在旁边的小餐馆里吃了一盘水饺。刚吃完饭，朱女士打电话过来，说她已经到了。我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于是约定等她们吃过饭后在宾馆她的房间见。

我在房间里等朱女士的电话，一边等一边思考着一会儿将要进行的采访。对这次采访，我早就渴望已久，原因是早有许多人从各个角度向我描画过这位女律师的形象。

她是一位法官的女儿，当她大学毕业参加律考时，日本女人当律师还是很稀罕的事。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一共有三名女性，考官对她说：女人应该回家操持家务生孩子，把律师的位子腾出来让给男人做。她没作声，回过头却把这位考官的这番话向报纸捅了出来，结果引起日本女性上街抗议，闹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告诉我这件事的朱女士说，她在日本的旧报纸上找到这件事时，不由得大为吃惊，因为看她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竟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青岛，一次饭桌上，我好奇地问那几位日本律师：在日本，如果一个女人比丈夫收入多的话，家里是谁干家务？我的问题引得他们哈哈大笑。小野寺就告诉了我她的故事。小野寺说，因为她能干，因而收入很多，而她同为律师的丈夫，却喜欢打高尔夫、喝酒、下棋，玩的时候比工作的

时候更多，因此收入远远不如她。但家里的家务，几乎全由她一人承包，有时候出差多了，还会引来一起生活的婆婆的训斥。不过，小野寺先生话题一转说，即使在日本，像她一样的女性也越来越少了，她的丈夫也公开承认，他幸运，讨到了一个好太太。

此外，我接触过的中国律师和学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向我谈过她，一再对我说：你认识一下她吧，她是值得你认识的。

现在真有机会认识她了，但时间只有一个晚上。我想来想去，决定放弃准备采访提纲的办法，让这个晚上，变成两个女人之间随意的漫谈。

九点过，我接到朱女士的电话，来到她的房间。朱女士开的门，她身后，一个身材矮小、皮肤白皙、穿着一件棉毛衫、大约五十几岁的女人正忙着收拾行装。一看我进去，立刻转过身来，一边鞠着九十度的躬，一边用温柔的声音问候着。我知道，这就是她了，她和我想像的一样。我刚刚坐下，心直口快的朱女士就用汉语告诉了我她们共进晚餐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位原告的代表者是这位女律师请到北京来的，因为她的当事人都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对这事了解比较多而

且又有些文化的就只有这位代表者了，因此，许多事情，需要他协助进行。朱女士告诉我，今天见了面，刚一坐下，他就对这位女律师说：“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我的行李也被人偷走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是把身份证押在宾馆出来的。”于是她说：“好吧，明天我把钱给你。”然后进入正题，她向他介绍即将开始的二审情况，请他再度陪同她的当事人赴日本做证，当然和以前一样，所有费用由她来出。他听了，第一个反应是：那你还得多给我点儿钱。她们老了，出门得买药带着。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笑微微地坐在那儿，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开始。我看着她，想开口时，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

2001年11月

(十)

和我说话的时候，她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很随意的样子。那姿态，像极了山东胶东地区的农家妇女，感觉真是亲切。但看她现在的样子，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她是个律师。

朱女士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是女性，因为担任着慰安妇诉讼律师团的团长，因为天性认真，她做这份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做得很累。只是，她不是个喜欢诉说的人，不知道我能不能从她那儿问出什么。感谢她的提醒，于是，我把当晚的交谈主题，定在她和受害者的关系上。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律师，代理中国受害慰安妇与本国政府打官司，我相信，当您开始工作的时候，您和您的当事人之间一定有深深的戒备和不信任。我想，代理诉讼的过程，也是您和您的当事人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过程。那么，经过五六年的诉讼，您觉得您和她们沟通了吗？互相了解了吗？如果沟通了了解了，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还没有，您觉得原因何在？”

我的问题令她沉思了许久，后来，当她回答我的时候，朱女士还没翻译她的话就先自己评价了一句：“她回答得还真的挺坦率。”

她是这样回答的：“我作为一个日本律师，之所以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第一，是觉得这是一件正义的事，我应该去做；第二，我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长期的

发展——只有认真反思过去，正确对待过去，日本才可能有长久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很难得到她们（指中国曾经做过慰安妇的战争受害者）的理解。比如，我们觉得这场诉讼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钱，而当事人，对于钱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她是从1995年开始接触到中国慰安妇事件的。1996年代理几名受害者正式提起了诉讼，诉讼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受害者在山西，而她当时，还没到山西去过，调查取证的工作是委托中国律师协助进行的。她说，那时候，她只觉得这事应该和值得去做，但只有1998年去过山西以后，她才真正理解了自己这番奋斗的意义。

几年间她一直要求到山西，但有关方面和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都不同意她去。理由有许多，但她觉得自己的理由是什么理由都无法反驳的：我是律师，我应该到案发地和我的当事人家里看看。

1998年，她不顾一切阻挠，几乎是强硬地闯着去了山西。

这次山西之行使她了解了以前无法想像的一个世界，也使她彻底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之所在。

她脸上含着微笑对我说：“现在想来，当时真可笑。因

为决心要去山西见当事人，因此从日本出发时，就想该买点儿什么礼物带着。”想到当事人都是女性，她选择了最具女性色彩的礼物：当时日本新出的带各种香味的香皂。她还没说完我就明白了：“那地方根本没水。”“对。”她苦笑着回答我：“没水，连吃的水都没有，我却带去了香皂，你想想有多可笑。”

一路的艰辛自不必说：她们从太原下火车，租了一辆汽车开往目的地。山路上几乎没办法行车，许多时候要步行。半路车还坏了，因此坐车的时间不如推车的时间多。但她坚持前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看到那地方的时候，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她神情凝重地答：“当时的感觉，真恨不得把法官揪了来，让他亲眼看看这地方，看看生活在这地方的人。”她说，来到那儿，她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日本侵略军罪行是多么的深重。“你想想，人生活在那儿，连吃的都没有，如果家里有一个女儿，就是人生惟一的欢乐了。可这惟一的女儿，还被日本士兵掠了去，遭受轮奸。一个人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她的几位当事人，当年遭受的痛苦都不堪回首：如花儿般含苞待放的姑娘，最大的不满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被日本侵略者掠去后，

几天的功夫，就在惨无人道的蹂躏中下体溃烂、全身浮肿。她们都是后来被家里人拿钱托人赎出来的，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自己行走，要么被家里用箩筐抬回，要么像床旧棉被搭在驴背上驮回。也许可以把这段时间当成一场恶梦，但这种恶梦永远不会醒来。她说：她的当事人就此被毁掉了。她们一生被过去的恶梦纠缠，却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而且，从此后，她们觉得自己活着都成了一种罪过，一生怀着有罪和自觉肮脏的心理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甚至连她们自己的儿女都不知道她们的痛苦，只是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疯。

她说，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对着自己的先人做下的如此肮脏和丑恶的事情，她只有一次又一次地谢罪。

当天，因为车坏了，她们住在当事人家的窑洞里。她比划了一下，告诉我窑洞里的炕比宾馆的床稍大，那天，一张炕上睡了5个人，而炕的一侧，还躺了一个瘫痪病人。说到这儿时，她脸上掠过孩子讨了便宜一般得意的神情：“不许我去，可我不光去了，还在那儿住下了。”

2001年11月

(十一)

面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的时候，同情和怜悯肯定不是最好的反应，但却是一种基于正常人性的最本能的反应，那个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她表现出来了。

她说：“面对看到的那种情况，明明知道拿钱不是好办法，但是，我们只有把能拿的钱拿出来。”

我想，她的错误就是这么犯下的。

简言之，自从她第一次把手伸进自己口袋后，她就不得不一次次把手再度伸进去，哪怕她已经衣袋空空。

这些情况，大部分是我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她是个说话很委婉的人，涉及的又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尽管我问，她却出言谨慎，不肯明白地告诉我。她只是说：她们对钱有很大的期待。

倒是一直坐在一旁陪着我们的一位日本年轻律师忍耐不住，接过了我的问题：“我们觉得，打这个官司，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当年日本人犯下的罪行，重要的是把事实披露出来，即使不能胜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她们只想要钱。她们总给我们提这方面的要求，从钱到各种礼物。”



摄制组在日本采访侵华老兵家属

他还举自己的例子：“我在日本是个普通的律师，自从参加这个律师团以来，已经自己支出了200万日元，可他们还是不断地要。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地请当事人到日本去，我们很希望中国企业能提供一点资金支持，但至今没人响应。”

我很尴尬，脸上发热。我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受害者本人会比他们的亲属好一些？”

他俩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事实上，张口最多的，是他们的亲属、女儿、儿子、亲戚朋友、村里干部或者当地的小头头。”

我又问：“在受害者中间，有没有表现得比较好的？”他俩互相看了看，这位日本女律师说：“其中有一位我们觉得很好。”

我倍受鼓舞，赶快问：“她的情况是怎样的？哪些地方让你们觉得好？”

没想到，我的问题把他俩一起难住了，面面相觑地看着，许久没回答。

朱女士说：“看样子也差不多，不然也不会让他们这么为难。”

后来，那位年轻的男律师回答我说：“我们觉得，她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我们的想法。”

我不再问了，不敢问了。我沉默一阵，轻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同胞感到遗憾。但是，也请你们谅解他们吧。你们刚才说的想法，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而一生挣扎在贫困中的人们是很难把这种追

求放在生存需要之前的。”

他俩赶快鞠躬，对自己刚才的话表示道歉，并说：“今天是因为你问，所以说的消极的方面比较多。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中国遇到了不少不顾自身利益而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奋斗的人，比如——他们示意正在为他们翻译的朱女士——我们和她已经成了好朋友。另外，经过这些年的诉讼，这些当事人也在不断地进步。”

我很难责怪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毁掉一生的当事人。事实上，能把自己当年的屈辱公诸于众，能到日本社会上去披露这些事实，已经是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想想诉讼过后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将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时，你怎么可以苛求她们饿着肚子去表现气节？她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母亲。做为一个母亲，她们没能给她们的子女带来金钱、尊严和起码的温饱，如今，当年加害者的同胞找上门来，说要帮她们讨还公道，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能信任吗？如果是想利用她们怎么办？官司打不赢，他们当然是拍拍屁股走了，而她们除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些丢人的事还能剩下什么？

从来没人为她们的长远利益考虑过，那么，她们抓住眼前利益又有什么错？

我看二战时的资料，当德国战败时，高傲的日尔曼女人有时竟为了能有一个温暖的夜晚而随便和占领军士兵上床。人到了那种窘迫的境地时，生命都顾不上，廉耻能坚持多久呢？

真正可恶的是另外一些脑满肠肥却欲壑难平的人。朱女士告诉我，当年这些受害者受这位女律师邀请第一次要走出国门到日本出庭作证的时候，为她们办理出国手续的某官员竟然对她们说：要不是我帮忙，你们没办法出国。我们签个合同吧：我帮你们办出国手续，等你们胜诉了，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我。

朱女士说：“连这种钱，他都要挣！”而我，只能无语。

日本政府一直拒不承认慰安妇的事实，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是一种连禽兽都不如，世上所有的人都不齿的行为。后来，实在抵赖不过，又狡辩说那是当时的色情经营者的商业行为，政府没有责任。再后来，由政府发布的征召慰安妇的文件被发现了，再也无法抵赖了，于是从日本民间征集了一部分慈善金，说用这部分钱来慰问当年的慰安妇。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当即义正辞严发表声明拒绝，韩国企业则站出来，宣布他们出资资助本国的慰安妇受害者。

我问：“当时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表态了吗？”

朱女士说：“嗨，根本没中国慰安妇的事儿，日本政府压根儿就没把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放在眼里！”

我得承认，听到这句话，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对日本政府的气愤已经被另外一种担心盖过了：如果当时这笔慰问金里真的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相信，这些受害者，即使她们再需要这笔钱，但在周围人的劝说下也会放弃——她们已经被毁掉的个性使她们即使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但是中国会有人像韩国企业一样出面说：不要他们的脏钱，我们来帮助你们！中国企业家人，有人会这样说吗？

(十二)

慰安妇案 1995 年提起起诉，经过 5 年漫长的诉讼，今年 5 月初审败诉，而且，是一个“最坏的败诉”（这位女律师语）——法院连基本事实都没认定，甚至，都没给这些积一生的勇气、付出可能丧失名誉的代价准备走上法庭的慰安妇受害者们一个在庭上说话的机会。

5 年中，这位日本女律师多次把几名受害者请去日本。为了交流，为了让她们能理解诉讼的意义，当然，也为了



摄制组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前采访

节省开支，每次受害者去了，她不安排她们住宾馆，而是租一套公寓，自己，或者请日本的志愿者们和她们同住，如女儿般照料她们的起居，刻意营造一种家庭的气氛。同时，组织日本各界人士集会，鼓励她们当众讲出自己当年受过的苦难，一方面，让更多的日本民众知道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也让她们一生的痛苦有个渲泄的机会。她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这些受害者眼界不断地开阔，开始理

解诉讼的意义。同时，另外一个以前没想到的变化是：因为郁积了一生的耻辱和痛苦终于当众说了出来，这些受害者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人开始变得开朗。

当她这样说的时侯，我觉得很温暖，我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个女人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入微的、充满人性的关怀。

尽管从开始提起诉讼就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胜诉，可败诉判决下达时，她还是心情非常糟糕。“关键不在于败诉，关键在于一个最坏的败诉。”她斤斤计较最坏的三个字，也许，她觉得，作为一个律师，得了一个最坏的败诉，从而给以后此类诉讼提供了一个最坏的判例，无论如何都是自己的失职。

可是，一国的政治，哪儿是一个律师——哪怕她是再能干的律师所能改变的？

朱女士告诉我，败诉后，这位女律师一直心情不好。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结果告诉她的委托人？

其实，照我想来，既然提起诉讼时已经知道必定要败诉，面对委托人的问题也一定早有准备。但是，5年的诉讼改变了她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她们不再单纯是委托者和受委托者，5年中的互相理解和体谅，使她们之间建立了某

种不是亲情的亲情。当她面对败诉的结果感到没办法向委托人交待的时候，我想，她一定对委托人的失望、愤怒和无可奈何感同身受。

她要亲自来中国，到山西，把败诉的消息当面告诉受害者，向她们表示她的歉意并分担她们的痛苦。

事先通过电话和信件，先把败诉的消息告诉了当地协助她工作的中方人员，然后她赶到了山西。

“她们听到这个消息什么反应呢？”我非常担心地问。

“她们非常非常气愤。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原来不被人知道的耻辱都公诸于世了，法庭居然不认定事实。”

我为这些受害者的反应高兴。是的，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没得到她们当初预期的金钱的补偿，她们愤怒，不是为没得到钱，而是法庭不承认事实。

日本政治教育了这些受害者。我相信，她们从此会更努力地参与诉讼，首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事实。

就在这次去山西时，她又和这些受害者签订了上诉委托合同，尽管，她和委托人都知道，再上诉，还是会败诉。

不仅如此，今年，他们又代理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起了诉讼。明明知道会失败，还是一如既往。中

国儒家文化中有句话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她们要让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知道这句话。

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细细地聊着，不知不觉夜已深了。朱女士提醒我，她今天刚来，明天还约了那位教师一早谈话。我该告辞了，但还觉得有许多话想说。

我说：“这几年，您真不容易，打这样一个官司，不光有金钱的付出，还有国内政治的压力，另外——心灵的疲惫。”

“心灵的疲惫”这几个字还没翻译完，她和那位年轻律师不约而同地长长地“啊”了一声。是那种从胸腔里发出的声音，仿佛多少郁闷、多少苦恼、多少辛劳，都在这一声“啊”中渲泄了出来。

朱女士说：“你把她说中了。”

我又说：“以前已经很不容易，但可能，您还要有另一种准备：经历那么多的付出，最终还是败诉，可能还要面对当事人的责备。”

她对这句话却不认同。

“即使最终败诉，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意义，我们让那么多的日本人知道了事实真相。如果全体日本人都知道了事实真相，我们就胜利了。我们要为此努力。”

第二天，在中日两国法律界和学术界共同举办的战争遗留问题研讨会上，我又一次遇到了她，这一次，让我认识了她身上的另一面。

2001年11月

(十三)

第二天，在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参加了由中日双方法律界学术界共同参加的“战争遗留问题中日学者研讨会”，会议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日本与会人员介绍各个诉讼案的进展情况，中国方面发表和战争遗留问题有关的学术论文。

第一天，整整一天会场的气氛都很沉闷。所有的发言都事先发了文字材料，再听发言者照本宣科，便觉得几分倦怠。正在想在这儿坐一天值不值的时候，一位日本律师在自由讨论时的发言，一下子使整个会场激动起来。

这位日本律师已经70多岁了，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京都律师团团长。后来朱女士告诉我，他是个老日共，其实对战争的态度经常比中国人还激进。但是，那一天，坐在那儿听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发言的时候，某些字句触动

了他作为日本人的某根神经。

这位中国学者的发言中有如下一些文字：当年那些侵华日军士兵，尽管他们在家时可能是善良的工人、农民，但当他们来到中国，手上沾上了中国人民的血，他们就变成了杀人的恶魔（大概这意思）。

这位律师说：当年侵华日本士兵有 200 多万，如果这样看他们，是不是不利于我们建立统一阵线呢？要知道他们也是受害的，他们是受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的骗。他还



正在工作的中国劳工

举自己为例：我也是受着军国主义教育长大的，如果不是长大后自己学习，也许我到今天还是个军国主义者。所以，真正犯罪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大多数士兵是受了骗，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中国方面五十几岁的学者发言。他态度温和地同意了这位律师的话，并对自己发言中的某些说法进行了解释，很委婉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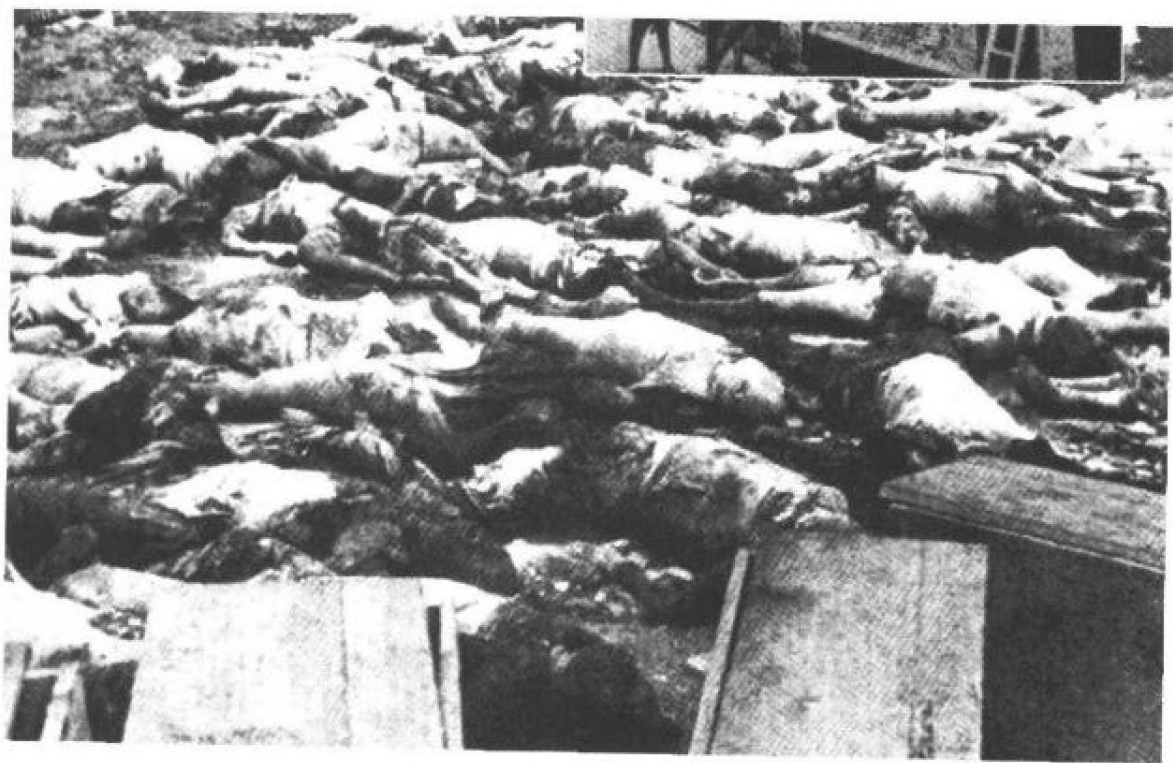
他的话还没完，刚才那位发言的年轻学者就说开了，语气非常激烈：“我同意要建立统一阵线，但说到战争责任，却不能因为统一阵线而不提。当然从某个角度，那些士兵也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和中国人民的受害不同。他们还同时是加害者。受害，并不能掩饰他们加害的事实。再则，我们不能让个人承担历史的责任。难道日本侵略的责任，东条英机一个人就能承担的了么？那个时候，你们日本全国民众一致支持对外扩张，难道这些用一个受害就可以避过不提吗？对于那场战争，日本人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他刚说完，另一位中国年轻学者又把话筒接过去，他的语气比较缓和，但观点同样尖锐。他明确提出日本全体国民应该反思自己的战争责任，并且大声地说：“现在看，

这种反思，比追究某个小集团和某个个人更重要。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反思，与其从宽，不如从严！”

我坐在那儿，勉强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心里充满着骄傲。这些年轻的学人，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真是出色。惟一的遗憾，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提醒别国人如何如何，中国人应该对本民族反思吗？

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议题是那位日本女律师报告慰安妇案的情况。主持会议的小野寺先生宣布讨论结束，那



被日军炸死的中国无辜平民

位京都律师团长却示意他还有话要说。不知道是不是担心会冲突起来，小野寺不给他发言的机会，便准备把时间交给那位女律师，这时候，这位京都律师一下子把话筒抢了过去。

全场人，特别是中国人都一下子抬起头来，准备迎接一场挑战。

但是，他的发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刚才诸位的发言，特别是年轻人的发言都是很上品的发言。受害者是不同，有受害和加害之分。这些年轻人都是很优秀的，而年纪大的则比较圆滑。”

说完这句话，他便像闯了祸的老顽童，脸上浮着得意的笑容，几乎是一蹦一跳地去了洗手间，而我，也在这一瞬间喜欢上了他。

接下来便是这位女律师发言。

她一打开话筒便把讲稿丢开了，语气激动、有力，和昨天晚上温婉的语调判若两人。我想，她作为一个职业律师出现时一定就是这样子。

刚才那位律师是她的前辈，在日本，辈份的观念是很强的，而她开始便把矛头对准了他。

“我现在讲的和某某先生无关，我只讲我对刚才大家争

论问题的观点。当年200多万侵华日军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杀过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没强奸过中国女性。不管他们在家里如何，当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人而是恶魔。我们日本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每天会面对孩子这样的问题：在纳粹时期你干了些什么？我们日本人也要这样问问自己！”

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位日本女性赢得了我彻底的、完全的敬重。

2001年11月

(十四)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的，只知道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不可自拔。那些哀痛、那些屈辱、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仿佛我和当事人一起经历过，苦熬过，至今还遍体鳞伤。那些感动、那些慨叹，那些跨越大洋的温情、那些超越个人目的的奋斗，像一面旗帜，总在眼前飘动。行动的目标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不再想马上写一部电视剧——那些人，那些事，是如此地真实而残酷，我

没办法把它们“艺术”化。我首先要拍的是一部大型记录片，把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完整地、真实地记录下来。我相信，这比100部电视剧都有意义。另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想法：在对这件事有了这么多的了解之后，我有一个急切的希望：与这件事巨大的意义相比，中国关注它的人是如此之少。我希望用我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中引来更多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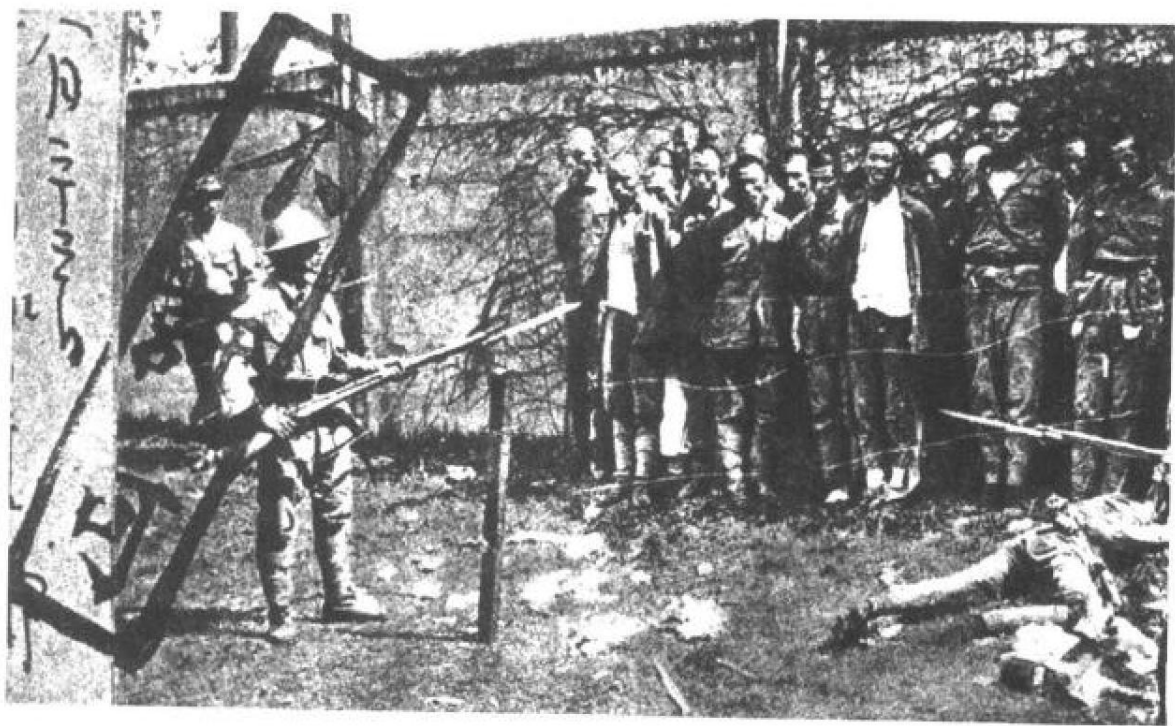
从那以后一直在为做成这样一部记录片奔波着，游说着。有时候身心俱疲坐下来喘息的时候，会仰着脸，茫然地看着前面，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而变成了一个行乞者，一个说客，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说。

没人逼我做，但是不做，会有个东西挡着，让我没办法过去。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它就是挡在那儿，别人看不到，可你自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即使你闭上眼，即使你忙忙碌碌快快活活，可它还是耐心地在那儿挡着，你不做，就感觉自己过不去。

第一次见小野寺先生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他我要做一部片子，第二次见他，他拿出的下一步的战略计划上，我赫然看到了“中国映画”几个字。虽然不懂日语，我的心还是一跳，猜到他已经把我的计划列入了他的战略的一部

分。我知道他们渴望着中国人的关注和中国媒体的支持，可当时的我的计划，还渺然荡在空中。我赶快对他说：“中国的现实情况，想必你了解，那只是我的计划，我会努力，但能不能做成，我不敢说。”小野寺听了，立刻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地对我说：“拜托了，请务必成功。拜托了，请务必成功。”他一连说了两遍，却没想到这句话落在我心上的分量。

就在那个时候，我下了决心：就算吐出血来，我也要



日本军队不可公开的照片

把这事做成。

最困难的时候，小野寺先生的这句话，和他说这句话时的姿态和神情便会自然地浮现出来。

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最大的感触不是那些困顿和挫折，而是一种小小的自鸣得意：到底人随着年龄成熟了，心态总能随时地调整过来。沮丧是片刻间的事，更多的时候是乐观达命：好事多磨，中国在进步，这事总有一天会成。

结果，它就成了。

感谢我的开明的领导，在我云游四方“口干舌燥”两手空空地回来的时候，我的领导给了我最大的支持：记录片正式立项，并且，借给我30万启动资金。

总投资200多万，可揣着30万我就快乐地带着几个人上路了。女人就是女人，做事顾头不顾腚，可该豁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女人更能豁出来。

跟着我的是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个个在这一行里都正在上升，如果拍电视剧，会有丰厚的收入，可跳上我这艘贼船的时候，我只能付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费，而且，不论名气大小、收入多少，一律平等。我对他们说：人这一生，应该有个时候不为钱而为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做事。现在，我们做的就是这种事情。

我们就这样踏上了路程。

2002 年 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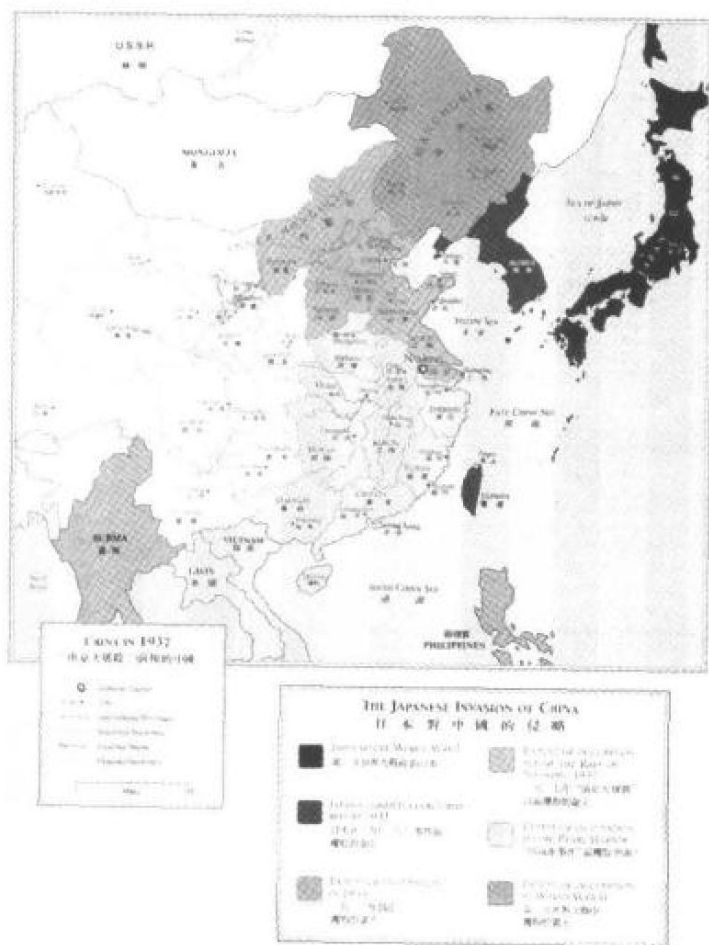
(十五)

福冈，日本九州一个温暖的城市，日本侵华末期，曾经有超过 5000 名劳工在福冈从事过奴隶劳动，奴役他们的公司名字至今还如雷灌耳，这个名字就叫三井。2000 年 5 月，16 名幸存的中国劳工在福冈提出诉讼，被告是三井公司和日本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今年 4 月 26 日法院将做出一审判决。3 月 2 日，福冈日本律师团到北京和原告见面，针对 4 月 26 日的判决商量下一步的策略，我们也赶往北京采访，在那儿，我遇见了这名日本中学老师。

我后来想，在这个时候遇见这个人，也许是一种命运使然。

许多天了，一直心情忧郁。我的拍摄进展顺利，可我的筹资工作却一筹莫展。每一个传来的消息都是令人失望的，我自以为会说动人的理由，发出去却像进了黑洞，听不见任何声响。可上了路的车还得继续行进。车轮滚动起

来了，我不能让它停下，但再走下去，可能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有时候会问一下自己：如果一直没有资金注入我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只能咬着牙对自己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某种情绪却在悄悄地渗了进来，让我即使在忙得无暇吃饭睡觉的时候也觉得有一丝沁入心肺的悲凉。一天，从一个拍摄地点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熟悉的电脑独坐，突然想：你为什么离开了你熟悉的一切，闯入这个本来不属于你的领域？操这份你操



日军侵华战略图

不了的心？你本来不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优厚的收入和悠哉优哉的生活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这个平凡的日本中学教师。

如果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没人能认出他是日本人。他和我们见惯的中国教师太像了，包括他不甚讲究的衣着、理得很规矩的头发，和脸上那种谦和的、甚至有点拘谨的笑容。他在福冈一个商业学校里做历史教师，这一生，都过着安安稳稳的、不富余但衣食无虞的生活。一次偶然听说的事情改变了这位教师的生活轨迹：1991年，他听别人说他所在的小镇当年有几千名中国劳工，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可他从此以后就开始调查，并且随时把自己调查来的事实告诉他的学生。开始，学生们对他说：老师，这些事太沉重了，还是说点轻松的吧。但是他告诉学生说：这是历史，你们应该知道。他带领他的孩子们走入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兄曾经对外国人做过的事情。1992年，他带领他的学生来到东京，在东京华侨总会找到了当年被抓中国劳工的名单。他们把在福冈的5000余名劳工名单抄下来，按照上面的地址往中国发了5000余封信。5000余封信，回来的只有一封，是一位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儿子吴先生写的。

这位老师欣喜若狂，马上自费来中国找到了吴先生。他告诉我，那一天，他带着发现的名单到吴先生家里访问，当他和吴先生交谈的时候，吴先生90岁的老母始终坐在一旁，很仔细地听，当儿子为父亲客死他国伤心的时候，母亲的脸上却现出欣慰的笑意。原来，当年丈夫突然失踪，从此不知下落，吴先生的母亲一直恨着他，以为是他把他们母子抛弃了。如今才知道丈夫是被抓走的，是迫不得已离开了她，郁积了一生的怨恨一下子消散了，她知道自己不是弃妇，她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她为不幸的丈夫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这次访问一定使这位教师更加明白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回到日本后，他参加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支持会，数年中一直为支持诉讼而努力工作。近来中国18家媒体在联合寻找当年受害劳工，所依据的名单就是他提供的。

在采访中，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可能很小，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何在呢？”

他脸上浮着谦和的笑容，这样回答我：“作为普通人，我也许制止不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不让我的学生再次参加战争。”

很平常的一句话，不知道哪儿打中了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又有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等着我。心仍然很沉重，但第一个反应却是咬了咬牙。

没人要求你这样做，是你基于一个人的选择。你是个普通人，你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该你做的，你必须做。不要自怜，不要怨天尤人。你可能失败，可能承受很多，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其他路可走吗？没了。那么，就这样走吧，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2002年3月

(十六)

自1995年5月花冈暴动幸存者在日本提起战后中国受害者第一起诉讼以来，至今已有20多起诉讼，在日本列岛从南到北各个法院审理着。另外，在美国，还有两起受害劳工诉日本企业案在艰难地进行中，在中国境内，受害劳工已经向河北高院提起诉讼，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向南京中院提起了名誉损毁诉讼，提起一年多了，目前这两地法院都还没受理。

在战争结束近60年后，中国战争受害者提起这类诉讼

的意义何在？诉讼的最终出路在哪里？

日本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诉讼的意义》。文中，他站在一个日本国民的立场，对这些诉讼的意义有着非常好的阐释。

他把诉讼的意义分为这样四个层次来谈：

1. 作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来说，提出索赔诉讼，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利；

2.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诉讼的意义，在于使国家明确自己的侵略历史，只有国家承担了历史责任，才能和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相互信赖的关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3. 从法的角度来说，促进在立法实践中国际人道和国



满载而归的日本兵

际人权法理的进展，在法的实践中更体现出对人、人性、人的权利的关怀；

4. 这是基于人类未来和长久和平的诉讼。

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诉讼的意义何在呢？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我经常为这些有良知的日本人的精神所感动，又为我的国家表现出的冷漠所遗憾，因此，包括在一些文章里，经常会流露出，似乎是日本人在帮中国人打官司，是中国人在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但是，随着采访和思考的深入，原来的认识已经大大改变。

日本人在为他们国家的发展做着他们的事情，而中国人，也应该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两个民族里追求正义和和平的进步人士在互相支持，共同追求人类的正义和和平。

中国这个国家，问题多多，但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亲身参与此事的人，才令我深深感动。包括那些原告们，可能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提出诉讼的动机，只是幻想着在受害五十几年后能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偿，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以他们的方式，支持了日本人追求正义的斗争，并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了这场追求正义的斗争中来。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幻想，中国的问题，可以通过

日本人的努力得到解决，哪怕是再优秀、再正义的日本人。无论什么时候，中国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只能靠我们自己。

在已经开拍后的许久，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来做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可能就在于此：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试图承担起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责任，在试图让我自己的国家更美好一点。

那么，一起又一起的诉讼，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呢？

具体的解决方案，似乎已经有了蓝图：日本进步人士在争取日本国会立法，仿照德国的模式，建立赔偿基金，谋求对民间战争受害赔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和社会党三个在野党曾就慰安妇问题两次在国会提出方案，都无疾而终，第三次又在提起。相信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在国会里斗争下去。日本法律界也提出了解决受害劳工和针对亚洲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方案，正在谋求提交国会表决。日本的律师们对诉讼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前些日子在北京正式采访小野寺先生的时候，他面对镜头，很乐观地表示：当初，当决定走上代理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时候，他计划拿出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如今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一切如他当初设

想的一样发展着。距当初的时限还有三年，他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下了决心，一定好好干，争取三年内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

但即使能解决，也绝不会是解决了全部战后遗留问题。

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事关中日的力量对比，事关日本的政治动向，事关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甚至，事关美国的远东政策、世界的格局，此外，更重要的，事关人类的长久的和平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我们可以说，当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时候，当日本政治右倾化仍然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当中国仍然不强大，不能令别人平视的时候，中日战后遗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中日之间的未来也不总是那么令人乐观，尽管我们曾为了中日长期友好放弃了战争赔偿。

对此，我们仍然要说：日本的事情，日本人自己解决。但作为日本的一个近邻居，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也许，这才是我们最需要问自己的。无论你生活在哪里，无论你在国内还是海外，无论你离日本是近还是远。

2002年5月



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在一起



第二章

日本鬼子

—— 一个作家的采访手记



他们生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是像你我一样的正常人，而一旦卷入战争机器中呢？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题记

这组文字，是几次去日本采访时顺手记下的。

我在拍一部名为《未被审判》的专题片。专题片的内容，是全面介绍近年来发生在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跨国大诉讼——中国战争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或加害企业要求谢罪赔偿案。这不是普通的诉讼，它直接标示着中国民众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标示着中日两国民众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为了这个目的要求清算历史的呼声。

我在日本的土地上来来回回地走，看着面前整洁美丽的国家，匆匆忙忙的人群，回忆着我的国家、我的国民，心里涌动着十分复杂的感情。我采访的镜头逐渐深入，由眼前的诉讼，深入到60多年前的战争，深入到那场战争中的人心。60多年前的那场劫难，给中国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带来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生大劫难，那么它给侵略者呢？给参加了侵略，参与了屠杀、强奸、烧杀掠掳的那些普通的日本人呢？他们生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是像你我一样的正常人，而一旦卷入战争机器中呢？他们的人性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日本鬼子，这是60年前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兵的称呼；《日本鬼子》，这是60多年后一位名叫松井稔的日本导演拍摄的专题片的名字。60年过去，当这个名字再度在日本本

土被使用的时候，它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蔑称，它更多的，带上了对人性的拷问和反思——在什么情况下，人变成了鬼子？

这也是我在这篇手记中使用这个题目的意思。

文字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大部分都已是风烛残年。当我和他们面对面时，心中常会涌出十分奇怪和复杂的感情。有时是憎恶，有时是尊敬，但更多的时候，是怜悯：为一颗颗被战争毒害并负罪终生的灵魂，为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中挣扎的弱小的人，为人类自身——用了60年的光阴，仍然摆脱不掉那场战争的阴影。

一 金井志直

日本有个叫中归联（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组织，全部是解放后由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原太原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本侵华老兵组成的。这些战犯总计有1000多人（抚顺有990多人，再加上山西的，应该超过1000了），最早的1956年、最迟的1963年回到日本。1000人中，回到日本后骂共产党的只有一个叫饭守重任的，最后闹到身败名裂。其余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部真诚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数



被日军杀害的儿童

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反战和中日友好的工作。

第一次去日本就采访了不少中归联成员，这次又采访了几个。多次采访发现许多人属于当时日军驻在山东的第59师团，后来才弄明白：日军战败的时候，第59师团奉命通过海路撤往朝鲜，在那儿被苏联一股脑全抓去了，在西伯利亚做了五年苦役，又还给了中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日本反战和对战争忏悔的侵华老兵，以59师团的最多。

金井志直先生也是 59 师团的。

他是由中归联推荐给我们的，事先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他家不近，已经到了东京郊外。事先约好，我们下车后给他打电话，他来车站接我们。

那天天很热。我们下了车在有冷气的车站里等着，很快他就来了，汗把 T 恤衫的后背都浸湿了。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和善很有教养的老人，尽管实际年龄已经 80 多岁了，可用中国人的经验目光来看，也就是不到 70 岁。

金井先生住着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家里有两个用来接待客人的客厅，一个和式一个西式。在我采访过的侵华老兵中，他看来是经济条件最好的一个。事实上确实如此，他回到日本后一直在农林省，是一个官员，退休后自己有了家公司，生意与农林省有关，似乎很不错。

我们被领进和式客厅，地下铺着榻榻米，小桌旁摆着几个垫子，是客人们的座位。我们刚刚坐下，金井先生突然双膝伏地，朝着我们深深地叩了一头，说：“欢迎各位光临。”这种隆重的礼节我在日本还是第一次遇到，一时手足无措，对金井先生的印象，也无端地就好起来。

话题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谈起，金井先生的回忆深情娓娓。他开口就说：“我当时，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军官，我总

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

他的开场白令我精神一振，我预感到，此次采访一定会大有收获。

金井先生向我介绍他被改造的过程：金井先生被捕时是大队长，手下有几百名士兵。在西伯利亚时，他鼓励大家要保持武士道精神，一定不能向敌人屈服。到了抚顺，他还依然故我，当别的战犯开始忏悔的时候，他沉浸在坚持气节的幻想和自我崇拜中，每天离开大家远远的，坐在一旁看自己的书。

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从那时候改变的：他顽固不化，管理人员却没有强迫他，尊重他一个人读书的习惯，只是有时候过来问他：看的什么？有什么收获？他说的这个细节使我想到，许多时候，对人格的尊重，比什么道理都更重要。

他说使他真正改变了的是朝鲜战争。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和其他战犯都以为，这一次中国必输无疑，因此在暗中企盼着美国会打进来救他们。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个时候迁到了哈尔滨。搬家时，所长给他们讲话说：你们要相信，长则两年，短则一年，我们还会回来的。他说那时候他暗中嘲笑所长这句话，可半年后，他们就回来了。从



那以后他开始读“毛选”，想研究一下日本是如何被打败的。他说读了“毛选”他服了，他觉得，一切都是按《论持久战》进行的。他从此开始信仰毛主席，甚至回到日本，美国打越南的时候，他在农林省还对别人说：“美国一定会失败的。后来果然败了。”他说：“因为我读过‘毛选’，知道什么叫人民战争。”

谈话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收获也挺大。第一次让我觉得哪儿有点问题的是谈及他战争中的经历时。

我问他：“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杀人吗？”

他先说，在中国，他在机枪部队，打仗的时候，不在第一线，所以——话没说完他就转到了一件具体的事情上：

某一次，在山东，他们进了一个村庄。前面的日军已经把这个村庄扫荡过了，村里几乎不见了人。他下令把房子烧掉。正在这时，不知从那儿出来一个老太太。他回忆说，老太太穿得很干净，头发梳得也很整齐，流着泪在他面前说个不停。翻译说，老太太恳求他不要烧掉她的房子，因为那房子是给她的儿子准备的，而她的儿子已经快结婚了。老太太情急之下抓住了他的军刀，金井先生说，这个动作激怒了他，他觉得，老太太把他的军刀玷污了，于是命令身旁的人：把她杀掉！

旁边的士兵把老太太杀了。他说，在这个过程中，老太太不看杀她的人，却一直盯着他。他说老太太的目光他一直忘不掉，然后发挥说：“所以我说，下命令的人最坏。我虽然没杀她，可我是下命令的人。天皇虽然没亲自参加战争，可他是下命令的人，所以天皇最坏。”

他说得很真情，逻辑也很对头，我听得频频点头，点完头，却总觉得哪儿有点问题。哪儿有问题，却一时找不出来。

我们继续聊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但看上去，金井先生更愿聊的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的教育和回国后如何奋斗。他甚至把他在日本社会上的成功也归功于在抚顺受到的教育。他说：“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做事非常非常认真刻苦，这也是在抚顺受到的教育。”这时候那种感觉又出现了。我总觉得，把做事认真刻苦也归于抚顺，似乎有点言过其辞。

我又把话题扯回到战争上来，因为我看到了他给我的在中国的履历。尽管是日文，可我还是看出，他在山东的时候，曾经在59师团当过训练部部长。我问这个部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训练新兵的。我顿时警觉起来。因为在多次的采访中我知道，当时的日本部队，是用劈杀活人



在战火中致盲的儿童

来训练新兵的。在拜访金井先生前一天，我们采访了一个叫小山的原 59 师团的老兵，他就向我们讲过在中国接受新兵训练的经历：几个中国青年农民被绑在柱子上，让他们一刺刀刺中心脏。因为紧张，他总是刺偏，因此受害者的叫声更惨不忍听，最后还是有经验的老兵帮他刺死了那个人。

我问：“听说日军是用活人——战俘或者平民训练新

兵的，你在当训练部部長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他突然有点尴尬地笑了，说：“我下过那样的命令，可到底做没做，我没看到。接着又说：下命令的人最坏，我是下命令的。”

那种感觉更强烈地出现了。我不由得盯着他，一时无语。

我觉得，我把握不住面前这个人了。

翻译示意我继续问，我回过神，匆忙中问：“战后您又回过山东吗？”

他说：“没有。总是很想去，但再没机会去了。”

我说：“我们的节目做出后，当然会首先在山东播。您从来没回去过，愿意趁这个机会对山东人说几句话吗？”

他立刻坐好了，说了很长一段话，翻译丁先生翻译的时候，突然犹豫了。

我奇怪地看着他：丁先生的日语，说得让日本人都佩服，以前这种情况还从来没发生过。

他到底也没能译出，对我说：“有一段地方好像不对，回去我看看录相带再说吧。”

我们就这样结束了采访，金井先生殷勤地把我们送出很远。当他在我们的视野中已经变成一丁点的时候，他还

在那儿站着。

我问丁先生：“刚才，他到底说了什么？”

丁先生一脸疑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他好像在说：当时在山东作战的，有日本人、八路军、国民党，还有汉奸。在山东的时候，是我作为军人作战最得意的时候。”

我吃了一惊，问：“会吗？”丁先生说：“我也奇怪。可能错了，回去再听听吧。”

回来后丁先生告诉我：“没错，他就是那么说的。但他显然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面很虔诚地向山东人谢了罪。”

金井先生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谜。

金井先生忏悔了吗？

金井先生显然是忏悔了。从中归联我们知道，他是中归联的常任委员，战后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为反战和平奔走，经常到外面演讲，呼吁日本要走和平之路。他完全可以拒绝我们的采访，可是他是如此殷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说，他以前也接待了不少类似的来访者。

可金井先生真的忏悔了吗？

他只愿意泛泛地认罪，说自己作为命令者最坏。他总是回避着那些具体的事情，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并没亲自

动手杀人，手上没沾过中国人的血。

他战后从来没到山东去过，尽管他的经济情况和身体状况对完成这样一次访问完全不成问题。

他身上有一种傲气，总是在强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无论是做战俘还是在战后。他把自己视为人生的成功者。

当我猝不及防让他对镜头说话时，他在没准备的情况下失口说出了作战得意这种话。

金井先生到底在山东干过什么？

我几乎可以肯定，金井先生一定是罪孽深重的。什么只下过命令不清楚是否用过活人训练这种话，我是根本不相信的。他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吗？下过命令执行不执行不去过问？

那么金井先生到底忏悔了吗？

尽管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认识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但我还是想分析一下金井先生。

我猜金井先生一定是自视甚高、非常自恋的一个人，这从他一再强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来。记得我问他一句战前上了什么学，他费了好大的劲向我解释：他只读了中学，但后来自学、上夜校，所以战前就考上了公务员，进了农林省。因此他一入伍就是军官。金井先生是很



侵华日军向南京进发

为自己骄傲生怕别人看不起的。

他甚至悔罪的过程都和别人不一样。介绍在抚顺认罪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他是通过读书，读“毛选”，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他在战后的经历也令他骄傲：许多老兵回国后一生穷困潦倒，而金井先生一回国就回了农林省，并且没做到退休就自己退下来开公司：“在日本，快到退休的时候，上司会拍你的肩膀说：快退了呀。我讨厌别人拍肩膀，就提前退

了。”

一个一生成功的人。即使认罪，也自认为没输掉尊严。像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和那些血腥、残忍、灭绝人性的事情沾在一起？

我猜金井先生的人格，一定是有某种分裂的。一方面，用一生的努力，保持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另一方面，把



日军在枪杀一个平民



过去那些罪恶的记忆努力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

他用所谓忏悔、认罪，维持这两种人格的统一，自己对自己说已经清洗了过去。但金井先生在这儿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用大而无当的认罪，逃避了自己对罪恶的真正忏悔。金井先生的逻辑是：下命令的人是最坏的，我是下命令的，所以我是最坏的。我骂自己最坏，可见我是认了罪的。用金井先生的逻辑推下去，天皇是下命令的，所以天皇是最坏的。但相对于天皇来说，金井先生难道不是个执行者吗？最坏的责任被天皇承担去了，金井先生还剩下什么？

也许，作为社会的人，金井先生已经认罪了，但他永远不敢面对自己，面对真正的过去，面对心底的黑暗。所以他不愿意谈战争期间的经历，再也不愿回山东。

80多岁的老人，已经去日无多了。不知道金井先生临辞别这个人世的时候，如何对自己交待。希望他的灵魂能真正安宁。

2002年5月

二、汤浅谦

汤浅先生今年86岁，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穿一身质地很好的军服，双手握一柄军刀，坐在一群军人中间，仍然掩不住身上的儒雅之气。60多年后的汤浅先生更显得文质彬彬，领口挂一块盾形的玉牌，穿一身质地仍然很好的西装，说话的声音不疾不徐，目光和善，待人温厚，一派谦谦君子之风。汤浅先生是位医生，在医院里德高望重，尽管年事已高，每天仍然抽半天时间到医院为病人诊病。其余的半天里，汤浅先生也不闲着，几十年来汤浅先生只忙着一件事：悔罪。

汤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60多年前曾经在中国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做过的一件事：他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先后做过10例。也就是说，有10名中国人在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他以一种科学家的精确和严谨的精神慢慢地摘去身上的各个器官，最终把一个健康的成人卸成一堆零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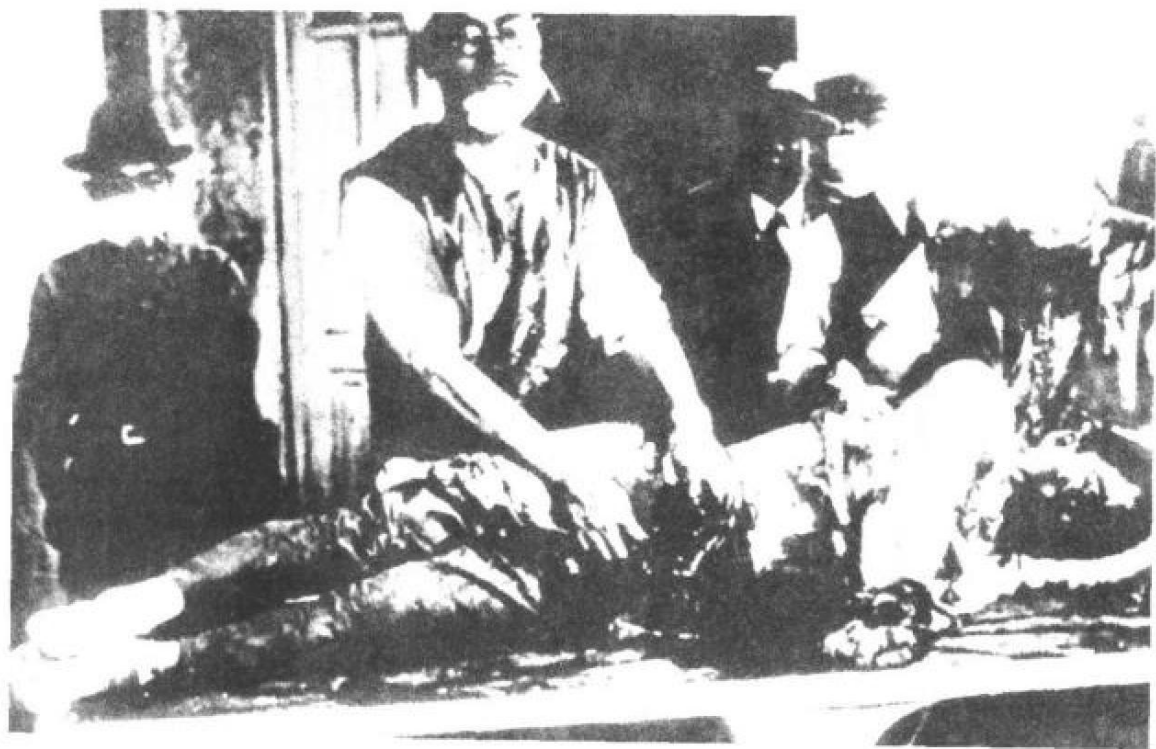
他用和缓的语调对我们讲着当时的情况，讲来讲去只讲第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后来的解剖已经成了例行公事。他回答说是的，当然个别的印象还至今未忘。



尸体掩埋队拾起一个死去的儿童

那第一次的每一个细节他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解剖了两个。年长的一个已经听天由命，被命令躺到手术台上时毫无反抗。年轻的从进了房间就恐惧地呜咽，徒劳地而后缩着身体。一个军医在后面推他上手术台，他却拼命地而后缩，于是一个站在汤浅身旁的女护士微笑着对他说：上去吧，不疼，一会儿就完，给你打麻药。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向汤浅吐了吐舌头，意思是：逗他玩呢。说到这儿时汤浅找出了那女护士的照片。那是一个看上去还不满

20岁的女孩儿，和另外一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儿亲昵地搂在一起傻笑着，看上去就是邻家那总也长不大的黄毛丫头。女护士这一句谎话安慰了那将死的青年，他停止了徒劳的反抗，乖乖地躺到了手术床上。那个青年年轻的、毫无瑕疵的身体给汤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一再提起。然



731 细菌部队解剖人体

后几个日本军医就围着这两个中国人忙起来了：先摘去了盲肠，又卸去了胳膊，又锯去了腿，又截去了肠子，又切去了胃，又打开了呼吸道——这些情况在战场上日军士兵都可能碰到，这些初出茅庐的军医们需要有这方面的训练——该摘的都摘去了，被摘成了一个空壳的青年居然还呼呼地喘着，打开的脖颈那儿冒着血沫。那个时候的军医们还很仁慈，他们没活着把这两个人丢出去，而是找了一根绳子结束了他们，然后丢到了医院外的大坑里。在那儿，早就有习惯了的野狗等着这经常会有的美食。

汤浅说这第一次对他还是有刺激，但第二次时就习以为常，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当他开始拿中国人训练新来的军医时，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他说后来的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我无法问他，在那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忍受得住被解剖者凄厉的惨叫。我执意要他回忆一个后来的例子。他又说了一个，却没能把它讲完：那一次他用一个中国人做大脑皮质的试验。他一步步地讲着把那个人的脑壳打开，取出大脑皮层，讲到这儿时他停下了，再也没能讲下去，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当他取出大脑皮层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停地喊。

我早就知道汤浅先生已经悔罪，知道他顶着日本右翼

势力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几十年中不停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罪恶向日本社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大罪，但当他用安静的声音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坐在一旁，仍然忍不住用憎恶的，也许是充满了仇恨的目光盯着他。我难以想像这样一个看上去富有教养、令人尊重的人如何能对自己的同类做出那种事情，更难以想像做过这种事情的人也有资格来悔罪，请求世界的原谅。

像这样一颗灵魂也有可能复活吗？

日本投降时汤浅还在山西。他居然没想过跑，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罪。他只在盘算着：日本战败了，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干脆就留在中国，当医生算了。他果然就留在了山西，在国民党部队里继续当他的军医，直到被共产党抓住，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当被关进去的时候汤浅先生愤怒得大喊大叫：他怎么可能是战犯？他什么事也没做过！

在山西战犯管理所里，汤浅先生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人性的待遇。在漫长的被关押的岁月里汤浅慢慢地回顾自己的军医生涯，当管理所要求坦白的时候，汤浅被迫交待了自己活体解剖的罪行。汤浅说：那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犯了罪，并因此感到恐惧。



摄制组工作照

当一个罪人被别人当人对待的时候，他的人性也在慢慢苏醒。汤浅说，那是个缓慢的但却是很实在的过程。他不再用天皇的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他知道，无论有什么借口，作为一个人，他确实犯了罪，他所犯的罪，就是泯灭了人性。但那个时候的汤浅，处心积虑只想着一件事：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逃脱惩罚，活着回到日本。

一个母亲的信使汤浅作为人的心灵受到了震动。

那是一个曾经被汤浅先生解剖过的青年的母亲写给汤浅的。事隔50多年，汤浅先生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位母亲信

中的字句：汤浅，我的儿子被你活着解剖了。那天我听说日本宪兵来抓人，赶快往家跑，我的儿子已经被你们带走了。我赶快跑到宪兵队，在门外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辆车开出来，车上捆着我儿子。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喊，可是我是小脚，追不上你们的汽车。我一直在哭，不知道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后来才听说，我的儿子活着被你切成了碎块。

汤浅说，读到这位母亲的信时，他脑子里想起了山西那些小脚的老太太，想像着这位小脚的母亲在黄土满天的大街上追汽车的情景。说到这儿时汤浅先生拿出了手帕擦着流出的泪，而一向爱动感情的我此时却眼睛发干，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我曾问过汤浅先生，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他用刀活活地解剖人时，他没想过躺在手术床上的也是他的同类吗？他摇摇头，说，当时，从来没觉得中国人也是和他一样的人。可能就从接到这位母亲的信的那一刻起，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有了形象，中国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母亲有孩子的人复活了。不，更准确的是，复活的不是被他杀死的中国人，而是作为人的汤浅。此时的汤浅，开始把别人也当成了人。

汤浅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呆了六七年，最后被释放回到日本。他回忆说，当他回来的时候，过去的同伴见到他都惊讶地问：你怎么会被当成了战犯？你什么也没做过呀？汤浅说：我们不是拿中国人做过活体解剖吗？同伴们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说：为那件事啊。

汤浅回国后沉默了多年，当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复活军国主义的时候站了出来，讲出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并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他因此受到了一些右翼分子的威胁，骂他是傻瓜，骂他是别有企图，骂他是想给自己的国家找麻烦。但他的同样在中国作过战的哥哥给他写了另外一封信：真佩服你的勇气呀。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做过，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后，你的书是我们家的圣经，我们要永远流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来读。

汤浅先生多次重返中国，也多次回到山西。但他在山西始终没勇气说出自己当年做的事情。他说，万一那位母亲或者她的亲属认出他呢？他说他不是怕复仇，而是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受害者。他已经没了请求宽恕的资格。我指着摄像机对他说：我们做出的节目将在中国播放，那位母亲肯定不在了，但也许她的亲属会看到。你还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他正襟危坐，对镜头说：“做出那样的事情，没

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让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事隔一天，我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参加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诉日本政府的开庭，又一次看到了汤浅先生。他仍然衣冠楚楚，安安静静，坐在旁听席上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的审理。审理要进行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看到汤浅先生安静地到街角买便当，不用说，下午他还要留在那儿。熟悉的人们介绍说，许多年了，只要有事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法庭审理，汤浅先生风雨无阻，总要到法庭旁听，表示他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支持。

我盯着汤浅先生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街角。我知道，汤浅先生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过去赎罪。我还知道，汤浅先生将一直这样做到死。但即使如此，当汤浅先生辞别人世的时候，他将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会觉得他的罪恶清偿了吗？

世上有一种罪是不能犯的，一旦犯过，便永远地把自己的灵魂留在那儿，再也无法上岸了。

2002年5月

三 筱冢良雄

那场战争开始的时候，筱冢先生还是个孩子，正在一所中学里读书。他回忆说，那个时候学校里根本不再是读书的地方，老师们每天教导的就是让孩子们做好准备，随时听命上战场为天皇而献身。

15岁那年，献身的机会来了：部队到学校来征兵。出身贫寒的筱冢想到在家里也没有前途，不如到军队里寻求发达的机会，于是就报名入伍，来到中国的哈尔滨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成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里少年班的一个少年兵（问到这儿时我心里突然一动，顺便问了一句：731部队的成员是不是大部分出身贫寒？筱冢回答说是的，731里几乎全部是贫苦农民的儿子）。

731部队居然还招收少年兵这种事让人深思，由此我想起了731部队长石井四郎这个人。这个人是个医学天才，手里握有多项专利，在日本的细菌研究方面首屈一指。这个人不乏天才不乏勤奋不乏胆量不乏抱负，惟一缺乏的就是人性，他对同类哪怕一点点怜惜和悲悯之心都没有。此外，此人还是个胆大妄为之徒，心里从来不曾对天、上帝、神灵或者一切不可知之物存有哪怕一丁点畏惧。尽管他要求

部下对有关731的一切严格保密，但想必在他的内心里，从不曾觉得731所做的一切有任何一点不光彩之处，所以才会招收少年兵，要把他们所做的一切教给他们的孩子。

六十几年后我们和筱冢先生相遇，筱冢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依旧可以看出出身在他身上打下的印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足一小时，他的事情我事先已经知道，因此想让他略过事实，只谈几句心情，但筱冢坚持要对着镜头，把自己在中国做过的事情一一说出。

筱冢在731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比如涮洗培养细菌的器皿、为活体解剖中国人准备用具、把731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里。筱冢先生对自己投放过细菌的河流还一一记着。有几条我不知名，但有一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它的名字叫黄河，我就是喝着它的水长大的。筱冢先生的话使我想起过去在书上看到过的许多记载，中国的北方一次次地流行霍乱鼠疫，成百上千的人们死亡，无数个村庄变成废墟，我们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多少次灾难是人为的。

我问筱冢先生那些死在731的“马路它”（731对用做实验品的被害者的称呼，意思为原木），问他是不是还能记得住他们的面孔。筱冢先生带几分茫然地摇摇头，然后又

补充说：有些眼睛我还记得。我再一次感到困惑：当年的那些日本的当政者，他们真的觉得他们的少年应该接受这种教育，以至于所有的这些罪恶都不曾想过避开少年的眼睛？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 731 本部里慌成一团，那些嗜血成性的恶魔们对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却颇有心得。在最短的时间内，他们销毁了有关 731 的一切，包括还关押在里面的 400 个“马路它”，然后匆匆逃生，把手下的士兵们丢给了愤怒的中国人。筱冢说到这儿时说：他的队长逃走了，丢下了他，被中国人抓住，反而成了战犯。十六七岁的孩子成了战犯听上去有点滑稽，想必当年的筱冢也曾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但今天的筱冢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却第一次绽出微笑，说：“今天想起来，能被抓住，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真是我一生的幸运。”

此后的事情筱冢先生和其他有类似命运的人差不多：关押几年后释放，回到日本后参加了中归联，几十年中不断地向日本社会介绍日军罪恶、向受害者谢罪。在日本，我曾经和几个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人谈起当年的战争，他们坚持那场战争只是天皇和少数几个军国主义者的责任，广大的人民是无辜的。而十五岁参军十六七岁被当成战犯的筱冢先生却从来不说自己无辜，他总

在说：“我是犯了罪的人，我要用一生来赎我的罪，把我做过的事情告诉日本社会。”1998年731部队罪行展在美国展出，筱冢作为731的少年兵愿意到美国做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美国人，但是美国拒绝他入境，因为是美国在战后掩盖了731的罪行，为得到细菌战的资料和石井四郎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把全部资料移交给美国，而美国把石井四郎及其他细菌战战犯从东京审判的战犯名单上抹了去。人类历史上一桩骇人听闻的罪恶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黑暗里。

采访结束后天已将黑，告别时我们才知道筱冢先生住在东京的郊区，离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一再道歉，筱冢先生却带着谦和的微笑说没什么，然后转过身，慢慢地消失在暮色四合的街道上。一个对人世懵懂无知的少年在长辈的诱导下把自己的灵魂沉入深渊，从此拿出一生的光阴努力地把它打捞上来。在那一刻里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已经完全原谅了筱冢先生在中国做过的一切，并且，有一种敬意随着暮色也慢慢地升起。

2002年5月

四 永富博道

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同，一直是在脑子里打转的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感受到了：和讲究以下处上、以柔克刚的中国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达尔文气息：崇尚强者、崇尚武力、蔑视弱者、蔑视同情和怜悯。这种文化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格，这在下面将要讲的永富先生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我曾经在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书里看到过永富的身世。他出身并不贫寒，但小时候身体瘦弱，为此在学校里经常被嘲笑和欺负。为了解决瘦弱的问题，永富从小就拼命地锻炼自己，吃了不少的苦，终于有了一副强健的体魄。但和体魄一起强健起来的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无论是拿中国人做活体解剖的汤浅，还是在 731 里残害中国人的筱冢，接触他们以后，我都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有永富，在我眼里这是个坏人，而且，从小就坏，是坏透了的那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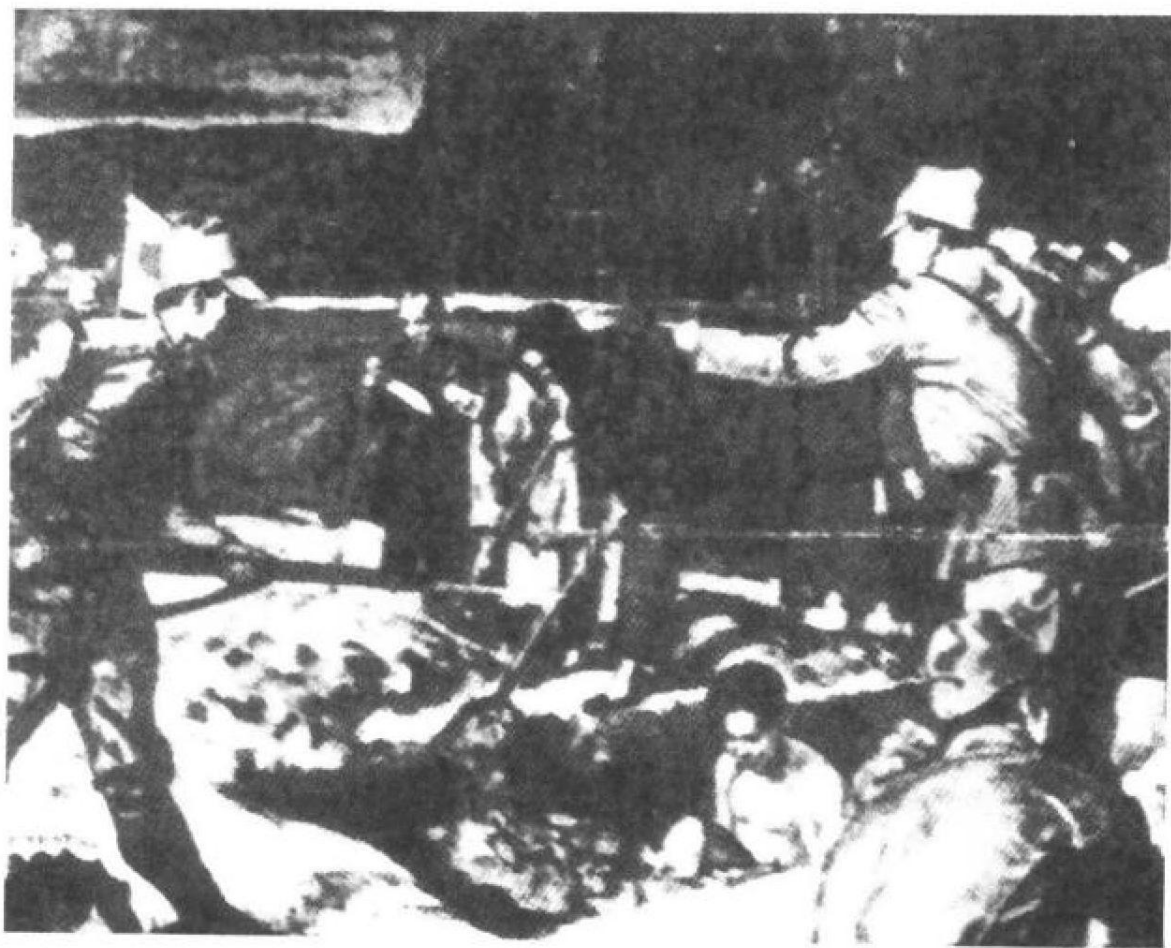
永富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争着参加学生参观团来到中国。那正是南京刚刚被日军攻陷的时候，永富急不可耐地

要到南京去，为的是能赶上大屠杀。在南京城外，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日军学习如何杀中国人。当时的情景，他即使在悔改以后说起来还如数家珍：中国人跪在前面，一个日军军官拉好姿式，抽出刀，往刀上浇一点冷水说：看着，要这样。一刀挥过去，中国人的头一下子飞出去老远，两股血从中国人的脖子上窜出来。永富在一旁看得热血沸腾，正想接过刀来一显身手，一个中国人突然拼命地站起来，一下子跳进了长江，在身旁的日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永富已经抢过了他的枪，一串扫射，水面上泛起了一片血色。

回日本以后永富就积极要求来中国，后来主动要求进入日军特务机关，又来到中国的山西。永富在中国另外有一个名字叫阎王，这个名字在山西许多地方妇孺皆知。杀人之于永富不是作战需要，而是一种人生乐趣。他会发明各种杀人的方法，尽可能地使人死得痛苦而有趣。比如，他会把长矛刺进人的肚子里搅动，然后把碎肉和肠子一起拖出来；比如，拷问的时候他会不辞辛苦地找来大石头和原木，把人的头夹住，然后用刺刀在人嘴里搅；比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折磨他们的父母，孩子哭得越凶他干得越起劲，折磨死父母最后再杀掉孩子；再



比如，有一次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14个女人和孩子，他便找来干草把他们全部薰死……据战后的战犯法庭认定，永富在山西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有111个，而永富自己说超过了200个。当1956年对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审判的时候，永富是惟一被判刑的一个。当时的刑期是13年。



南京大屠杀的场面

六十几年后我们见到永富时，他的生命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人开始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我们很想听他讲讲过去的事情，但他什么也没讲，只是一直在哀哀地哭着，一遍接一遍地说：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向中国人谢罪。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得承认我不够宽容，当他这样忏悔的时候我的目光里始终充满了厌恶。我知道他改悔了，数年中一直在到处讲自己的罪恶，可我觉得还是无法宽恕他在中国做过的一切。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始终不相信永富是真正的改悔了。我不相信一个以杀孩子为乐的人还能再变成一个好人。

永富后来写过一本书，名字叫《白狼的爪迹》，是写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恶的。可是那本书的某些篇章里，仍然残留着一个崇尚武勇的人谈起武力和征服时会热血沸腾的感觉：

“什么犯罪不犯罪，全然没想过。杀与不杀是我的自由。把人集中起来，殴打，只要觉得哪儿不对，‘啪——啪——’，就杀死。”

“那里堆积着几千具尸体。因为初次看到这种情景，身体开始瑟瑟发抖。想到自己是剑道四段，不能让人看出软弱，于是就兴奋起来。”

.....

请注意这些简短的句子和急促的语气，能相信这是一个在沉痛悔罪的人写的吗？

可是永富似乎是真的改悔了。几十年来，永富一直积极参加中归联的活动，到处宣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甚至腿摔坏了也在所不惜。当初中国放他回家的时候，他发誓要把后半生全部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和反对战争，几十年中永富是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的。

无论是汤浅还是筱冢，我都能成功地把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只有永富，白狼永富和忏悔的永富在我眼里始终不是一个人。

见过永富以后，我又把写永富的书找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现在我想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为永富人格的嬗变找出一条线来。

日本投降后永富没回国。别人想跑没跑成，他却是自己留下来的。他无法接受日本战败这样的现实，梦想着在中国纠集日军残部当海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或者收集情报送回日本军部去。就这样仍然在山西为非作歹，一直到1949年被解放军抓住。

从1949年被捕到1963年释放回国，永富在中国大陆经



南京大屠杀废墟中的婴儿

过了10多年的改造过程。现在来看看永富一步步如何走过来的，看看这个过程能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施虐狂改悔了。

首先我们不要忘了永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永富人格的形成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永富出生的熊本县是日本尚武精神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少年，特别是男孩子从小要受到严格的、近乎严酷的训练，目的是让他们有刚健的精神和体魄，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对应这个弱

肉强食的世界。如上文所说的，永富少年时身体瘦弱，因此受到这种风气的蔑视和攻击，并受到学校和家庭更严厉的训练。强壮起来的永富形成了有强烈攻击性的人格，用这种主动攻击他人的方法掩饰自己的弱小和自卑。

长大后的永富是天皇的狂热崇拜者。这也符合这种人格的特点：因痛感自身的无力，所以依附和崇拜权威，用权威的意志来取代自己的意志。

这种人格遇到强烈挫折时会拒绝承认现实，所以日本战败时永富拒绝回国，可笑地要在中国大陆上使日军卷土重来。

被捕后，和其他拒绝交待自己罪行的人不同，永富总是痛痛快快地把自己做过的事写出来。有许多没写，不是不想写，是他从来不以为是罪，所以忘掉了。当管理员问他有没有隐瞒时，他爽快地回答：没了！我还想把别人干的写上哩。

被捕后的永富仍然表现得感情麻木，缺乏人的情感，面对受害者的控诉无动于衷，我猜，说不定还有自豪感。

写永富的书上说看到许多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使永富第一次产生了人的情感，我对此十分怀疑。被捕时永富已经在中国作恶10多年，杀了200多人，要是面对受害者就能

产生人的情感，他也就不是永富了。

很明显，当永富根本不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一样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同情和怜悯？

我想，也许永富的第一次触动源自他的自杀。

永富被捕后关在山西，当时中国正在镇反，每天报上都传来某人被公审，然后被枪毙的消息。狂妄的永富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他来的，是为了告诉他日后的下场，为了给他威慑。永富说他不怕死，但是怕被押到群众大会上，被人吐一脸唾沫然后被枪毙，于是他找了条绳子，决定像英雄一样自己结束自己。

绳子搭在梁上时，所有强硬的外壳都破了，永富发现自己怕死，他想活着，哪怕是做条狗也想活着。他从地下爬起来那一阵一定自艾自怜地呜咽了好一阵：强者的外衣被无情地剥掉了，永富不得不承认自己和那些被他杀死的中国人一样是怕死的动物。

如果说人的情感被移入，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

1956年永富在山西太原被公审。据说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照片上，永富面对着几位幸存下来出庭作证的受害者家属，满脸鼻涕地跪倒在地下，叩头如捣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我的罪即使枪毙也不过分，对不起啦。”

对于强烈地想活的永富，可能此时已经把中国人也当成了人，但是这样求饶，更强烈的动机是想寻一条生路吧？但是回到牢房后他会怎么想？他再也不能用强者来自慰了，他知道自己为了活已经把过去的一切丢在了泥里，再也不能用那些外壳来保护自己。

永富被判了13年。我想即使对于永富，私下里也会觉得这个处罚太轻了。此时的永富有没有因此产生感恩之情却不敢妄断。

判刑后的永富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到了抚顺后的永富似乎再没闹事，规规矩矩地接受着所里对他的改造。一个强者的外衣一旦被自己剥下，再想用它来遮羞也难了。

永富在抚顺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了人性的待遇。永富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

某一天，一位齐姓管理员送给了永富两只小鸟让他养。寂寞中的永富精心地照料着这两只鸟，但不久鸟就死了。那位管理员又送来两只，不久又死了，然后又送来两只……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这位管理员不断地抓鸟来给永富养，毫无疑问是有意而为，目的在于使失去了人的基本情感的永富在饲养中重新找出人的温情和善意。

永富说，为了养鸟他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把鸟养活，两只鸟终日在他的牢房里绕梁飞来飞去。看着那自由飞翔的鸟儿他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在熊本山里捕鸟的情景，被异化的永富藉着养鸟回到了还没被污染的童年。

也许此刻的永富心里涌出了人的柔情。

1964年永富被释放回国，临行前痛哭流涕立下重誓：回国后一定把后半生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反思自己的前半生，把战争经历告诉日本社会，追求和平和日中友好。

如前文所述，40多年来永富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

这时候的永富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崇尚强者、崇尚武力的人格了吗？

如前文所引用的，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永富提起当年用武力征服中国人仍然会热血沸腾。

那么，如何解释永富日后悔罪的表现呢？

大多数日本战犯从中国回去后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光。日本社会不接受他们，把他们看成背叛武士道精神的胆小鬼，是被中国洗了脑的懦夫，会被日本警察盯梢、跟踪，工作很难找，社会上也受歧视。永富也不例外。他回国后曾长时间被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公路团的工作，警察却经常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单位把他带走问话。难以忍受的骚扰使他不得不辞掉了这份工作。曾经被他热衷吹捧的一切终于变成一块大石头，最终砸在自己脚上。再也无法在日本社会成为强者的永富可能在这个时候终于看清了他过去迷信的一切会给人带来什么！

从加害者的队伍里被扫地出门，扫到了受害的位置上，永富终于能体会到被他人攻击、受他人加害的情感了。

这以后永富不断地以觉悟者的身分出现，对日本社会现实强烈抨击。

永富觉悟了吗？

永富觉悟了。他体会到了受害者的情感，知道侵略战争不对，他在为阻止这种社会现实再次出现而努力。

永富的人格改变了吗？

我不敢说。从他的行文里，依稀可以看出对往昔的怀念。另外，谁知道他是不是在经历了看清自己是个怕死的可怜虫的打击后，在用这种方式与社会对抗，努力地想使自己看上去是个强者？

2002年5月

五 仓桥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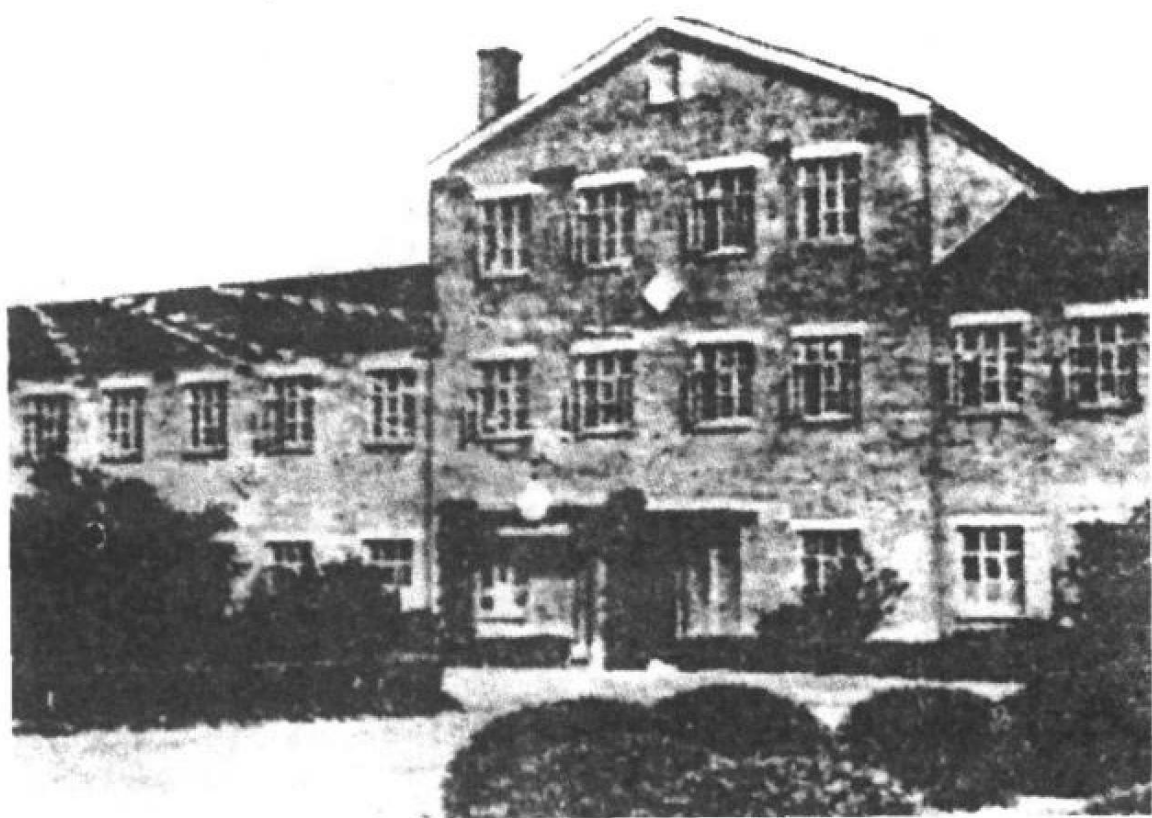
最初读到仓桥的故事是在一位日本精神分析医师和心理学者写的关于战争罪责的书上，从那以后就一直想见见她。上次我的工作同伴到日本拍摄的时候，我让他去采访了仓桥，但到底还是不放心。这次去日本前，我把要采访的名单提前发过去，第一位就是仓桥绫子。

仓桥的故事要延续到日本的群馬县，因此我们狠狠心租了一部车。8月30日一大早，我们如约开车到新田车站，一位看上去很端庄很日本味的中年女性已经在那儿等着，身后，站着一位衣着整洁的男人，手里搬着一个塑料保鲜箱。不用说是仓桥的丈夫。

用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汽车才开出了东京，窗外展现出日本秀美的田野。仓桥倚窗而坐，窗外的光和影不断地在她脸上闪过，她的故事就在这途中徐徐地展开。

仓桥的故事要从她的父亲开始。

仓桥的父亲叫大泽雄吉，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日本战前在继承上有一种奇怪的规矩：家中的财产只传给长子。大泽雄吉是第三子，长大后没分得财产。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他当了兵，1935年左右来到中国。又因为听



长春 731 细菌部队旧址

说宪兵可以升得快一点，他要求当了宪兵，这一当就是近 10 年，日本战败后才回国。

仓桥至今不知道她的父亲在中国干过些什么。但父亲给她的家庭带来些什么却是写在她命运中的。仓桥说，据她的亲戚介绍，青年时代的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从中国回去后，父亲却以严厉、暴戾而著称，全家人都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从那以后这个家庭就被悲剧笼罩着：先是

母亲，因为受不了父亲，曾多次离家出走，并得了精神忧郁症，终于在25年前自杀；其后轮到了仓桥的两个哥哥。两个哥哥都在父亲严厉的管教和训斥下长大，其中一个哥哥和父亲彻底反目，一直到父亲已经谢世1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肯原谅父亲，另一位哥哥在父亲去世10年后，也因精神抑郁而自杀；再后就是仓桥。曾经有许多年，她的精神也一直被抑郁症困扰着，终于不得不求助于精神治疗，但直到今日，她自觉阴影还未完全消去。

父亲活着的时候绝口不提战争时期的事，仓桥也从来不以在她的家里发生的事情和战争有什么联系。但在十几年前，父亲得了绝症就要谢世的时候，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意识到这家庭的悲剧另有原因。

大泽雄吉有食道癌，但最后致命的却是他的肝病。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时，某一天，他叫住仓桥，从枕下摸出一张纸条给她，嘱咐她将来要把纸条上的话刻到碑上去。话的大概意思如下：

旧军队勤务十二年八月，共计十年，在中国陆军任下级干部（原宪兵少尉），先后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旧满州、东宁等宪兵队当勤务，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我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

父亲留下了一张字条，也给仓桥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父亲在中国到底干过什么呢？为此，她遍访了父亲过去同宪兵队的战友、曾经和父亲同在中国作战的伯父以及家族里其他长者。但所有的人似乎都曾经约好，要对她保守住这个秘密。他们总是对她说：“你父亲什么也没干过呀。”“你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他不会干什么的。”“一定是被病弄糊涂了吧。”对于父亲留下的遗愿，所有的人也一致反对，特别是她的两个哥哥。大哥已经和父亲断绝关系，对于有关父亲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二哥（就是后来自杀的那位）则表示坚决反对。尽管他也和父亲关系紧张，但在父亲死后却要刻意保护他的名声，理由是：在家族的墓地里有这样一块碑，让别人怎么说我们呢？

为找出父亲当年的秘密，仓桥曾三次到中国，先后去北京、沈阳、东宁。在群马，在死去的二哥家里，仓桥谈起这一段时情难自己。她告诉我，在卢沟桥，听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介绍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她犹豫再三，还是拿出了父亲的旧照片，胆战心惊地给那位馆长看。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的声音再度发抖，说“当时我很恐惧，毕竟，我父亲是亲身参加过那次事变的人，万一……”万一后面的话她没说，作为一个父亲的女儿我却深深地体会到她当时

的心情——万一那位馆长认出了父亲，并说出父亲当年做出的残忍的事情呢？她还去了父亲在中国呆过的最后一站东宁，这一次，她鼓起了新的勇气，去找当地人打听。她的父亲当时在东宁是宪兵少尉，在一个县城里，一个日军的宪兵少尉应该是个有名的人物，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也没人认出（这使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对史志的开掘和调查是多么差），但有人告诉他，当时的宪兵曾经破获了一个40多人的反抗组织，40多个人全部被杀。

寻找，一个人类永恒的主题和生存困境，15年来，仓桥在她的生活中实践着和延续着。寻找真实的父亲的过程，是打破父性权威和偶像的过程，也是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这15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仓桥绫子。

仓桥自认过去和父亲是同一类型的人：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对自己和他人人都要求极严厉，瞧不起性情懦弱和没出息的人。在父亲和母亲的矛盾中，她无视母亲的精神痛苦，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在父亲和哥哥的冲突中，也一直维护着父亲的权威。我想，在她的家庭的悲剧中，尽管她是最小的，今天想起来，恐怕也有难辞其咎的感觉吧。

仓桥曾经是中学教师，在母亲和哥哥先后自杀、父亲留下那张字条谢世后，她再也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辞职



求医，并把寻找当成一生中几乎是惟一的事情。尽管，她没找到父亲生前在中国的秘密，但通过她在中国知道的日军的其他战争事实，她却逐渐猜想到父亲大概做过些什么。一个偶像逐渐地在心里破灭，也使她逐渐否定了往昔的自己。她对我说：“我现在知道了，生活中有许多的欢乐，人和人应该以其他方式相处，过去的方式是不对的。”

我问仓桥现在是否还想寻找父亲当年的秘密，仓桥犹豫一下回答说还是想找。我说，如果我们的节目制作播出后，可能会有知情者提供线索，到时候要不要我们告诉她？她回答说要。我说：日本宪兵在中国干过什么，我们大概听说过，很可能，那事实是很残忍的。仓桥仔细地听着翻译，眼里突然有了泪，哽咽着说，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尽管如此，还是知道好一些。

我在仓桥的二哥家看到了这位二哥的遗像。是一个相貌严肃的日本男人，两条浓黑的眉毛紧张地绞着，戴着一付大大的黑框眼镜。听仓桥说，当年，他和父亲冲突时，曾有挥动菜刀追杀父亲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在父亲死后，却要固执地保持父亲的形象。他不知道这一来也就让一座山沉重地压在了自己的头上，终于使他自己精神崩溃，在50岁的壮年自杀身亡。

二哥死后立碑的事有了转机。二哥的儿子不再反对，因此，在大泽雄吉去世10年后，这块碑终于立在了他的墓碑的一侧。

在群马晴朗的天空下，黑色的墓碑闪着幽幽的光。仓桥在摄像机前点燃了一把香，在父亲的墓前拈香合十致意。按照日本的风俗，凡来到死人的墓前都要祭拜，仓桥拜完，同行的日本友人依次上前焚香。接下来轮到我們了，仓桥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犹豫着没把香递上来。尽管事先没想到，但似乎一点也没犹豫，就上前接过她手里的香，面对着墓碑低下了头。我知道这墓碑下躺着一个曾经对我的国家和我的父兄犯过罪的人，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饱受罪恶感折磨终生不得安宁的、痛苦的灵魂。我为战争给人性造成的戕害而祈祷，为战争给人造成的痛苦而祈祷，为他最后的忏悔而宽恕，愿他安息。

回到东京后，仓桥绫子给我寄来了大泽雄吉在中国的履历表，过了两天，又发过来一份传真，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其中几条是关于她父亲的，比如不要说墓碑在具体什么町什么村，而要说群马农村等，但最后一条引起我的兴趣：二哥息子（二哥的儿子）有病的事请不要提。

问题是她从来也没向我介绍二哥的儿子有病的事，我



也根本不曾问过。此前，我以为战争的梦魇在她这一代可以结束了，现在我知道，它没结束，它仍然在她的家族内盘桓着，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悲剧。

2002 年 5 月



摄制组在日本采访侵华日军老兵亲属



代后记

行走在路上

李九红



把平平常常的日子升华为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把一般的思想上升到哲学的层次，把普通的情感净化到宗教的高度，通过一部部作品，通过无数次的生命体验，赵冬苓就这样也愿意一直这样行走在路上。

——题记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西方美学老师每次给我们上课，总会提着一个打包绳编成的菜篮子，每次，我们都会让青春的目光跟随着那只菜篮子把老师从来不看讲义请到讲桌上，然后，畅游在老师理性和缜密的思维里。

比我们的目光更恣肆的，是对师母的各种猜测，不过，到最后，肯定会统一到一点上：师母一定是个幸福的女人，证据就是那只菜篮子。

没想到，上班之后，师母变成了同事，后来，同事又变成了领导。她叫赵冬苓。是一位在全国很有知名度的编剧。著作颇丰而且是个快手。

关于她的成功，大多也是从同学、同事那里“道听途说”来的，比如，她和老师闭门谢客，读了10年书的故事，比如，她一年之内出了一本书、生了一个儿子、拿了一张证书的故事，比如，她契而不舍、促成电视剧《大地缘》的故事，比如，她因为电影《激情辩护》拿到华表奖最佳编剧、儿子问她是不是剧本写到头的故事……

我没有见过创作状态下的赵冬苓，想像不出来每天一万多字是如何从她心里和手下流淌出来的，大家都戏谑说她不是在写作，她是在写钱。据悉，她最快的剧本写作记录是17天20集一次过，而且是完成后一个字未改便投入了

拍摄。

语言的锻造力是惊人的，它慢慢改变着一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0年，一个人足可以对自己许下盟誓——在浑浊现实中跋涉沧桑，在参差人性中完善自我，用一生的时间去接近灯塔，接近完美的辉煌。出身于老革命家庭的赵冬苓知道书籍里包含着真正的质朴和公正。她从那些书中开始摆渡自己，远离纷乱的世俗，向着开满鲜花和真理的彼岸。这一渡，就是10年。自从她真正用功以来，时光不再逃跑，它在一个人的身上烙下印记，把她的知识上升为记忆，记忆转化为表达，于是，一个人可以两次占有了飞逝的光阴。

近几年，同事们总是不断地看到她的创作变成荧屏上、银幕上、书籍里的东西，记住了《孔繁森》、《激情辩护》、《军嫂》、《至高荣誉》、《仗义执言》、《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可是，也有更多的人没有看到她那一段苦读的经历：真可谓“江湖夜雨十年灯”。

孟德斯鸠说，“衡量一个人的真正品格是看他在知道没人看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想这句话用在赵冬苓身上最恰当不过。

这样说不仅因为那10年，更是缘于她最近一次的“义举”。

2001年7月12日，这一天是山东农民刘连仁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案一审胜诉，赵冬苓作为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专业编剧想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她甚至连拍摄计划都报批了，前者叫《越洋起诉》，后者就叫《刘连仁》。于是就和往常一样，开始收集资料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赵冬苓走近了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一个群体、一个领域，她没有想到，推动对日索赔诉讼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国、不是中国的知识界和民众，而是日本社会中的左翼势力：那些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支持着那几十起耗费巨大的官司花销的，没有来自中国的一分钱，也全部来自那些日本人。赵冬苓坐不住了，她认为拍摄一部电视剧不如拍摄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纪录片更有现实意义。“我没法将那些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艺术化。我要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把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记录下来。”对她而言，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加入这场艰苦的、旷日持久的斗争，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关注和加入，也才能使这场斗争中能响亮地听到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和民众的声音，并使这种声音成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有力武器。

“使我决定要拍这部片子的是日本律师小野寺先生。”赵冬苓用敬重的语气说。那是2001年，赵冬苓去北京采访小野寺，当时她透露过准备拍纪录片的打算，没想到在第二次见面时，小野寺给她看的诉讼计划中就有了这一部分，“可这部片子当时还没谱儿，我说，我会努力，但能不能做成，我不敢说。”小野寺立即神情肃穆地连说了两遍，“拜托了，请务必成功”。同样认真、不怕挑战的赵冬苓回忆说，“就在那个时候，我下了决心，就算吐出血来，我也要把这事做成。”

从此，她的创作和人生都悄悄地改变了。作为制片人的赵冬苓猛然发现再苦再累，似乎都能扛过去，但资金的拮据仍是她最怵头的事，“这可比写作辛苦多了”。初始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同200多万的资金预算周旋。直到有一天大家发现她在互联网上发出了征集声援活动的呼吁书，收集支持刘连仁二审的签名，办公室里不断收到寄自全国各地的签名声援信，同事们才知道她是真正上路了。靠着省广播电视局借给的30万启动资金上路了。那时，2002年元旦刚过。

本以为这是众人皆知的题材，本以为这是一呼百应的善举，但走在拍摄的路途中，赵冬苓始终都要面临最现实

的经费问题，他们一边拍、一边筹资，棘手的问题总会时时光顾。于是，赵冬苓带头，在他们六人组成的摄制组里，不管是名编剧大导演，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大家都不拿稿酬，只拿月工资。而压缩又压缩的摄制组成员都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多面手，孔笙既是编导，又是摄像，常常还要客串司机，侯鸿亮更是记者摄像制片一肩挑。他们相互砥砺着，抱着同样的激情和信念，一道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长路。他们自豪地宣称自己做了一次不是商业行为的艺术创作。

作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景式的记录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电视纪录片，赵冬苓在创作时把诉讼个案放进历史的框架内，使它的失败、妥协、部分胜诉和将来必将会到来的胜诉都有了新的意义。每次采访前，她都会找来相关的资料，从头至尾研究个透，并且做出了详尽的拍摄大纲，片子在她搭建的结构方式进行，她家的二战图书、资料也在不知不觉中堆满了整整一张单人床，面对制作周期、资金投入和艺术功力的考验，赵冬苓准确地把握住了对日诉讼的本质，而她本人，也几乎成了一位二战问题专家。在拍摄的过程中，她还陆陆续续随手记下了一些真真正正的采访札记。最初一边写一边贴在网上，还

计划一边拍片子一边写下去。但日后工作的强度、身心的疲劳程度，都超出了她最初的想像，因此最初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也无疾而终，但是，那些札记最终形成近4万字的著名网文《总有些东西让我们泪流满面》，多次被报刊转载，引起了不少人对《未来之讼》以及民间索赔的关注。由此，她也一次一次体会到：真正打动人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是讨公道、出口气的义愤，而是那些尘封已久而又无法忘却的事实。为此，她谢绝了几个剧本的写作，推掉了诱惑力极大的丰厚收入，专心致志而又身心俱疲地奔波在中日之间、奔波在受害者的家乡、奔波在任何一个能带给他们鲜活素材的城市、乡村、法庭、研讨会……

而当时每一次出国拍摄，每一次在国内出远门，赵冬苓都提心吊胆，最怕接到家里哥哥的电话，因为80多岁的老父亲身患胰腺癌，已经进入了晚期，是她最最放心不下的……

曾经多次有人问赵冬苓，为什么放下自己的创作，抛下需要牵挂的亲情，投身于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里。她回避了爱国、责任、大义之类高尚的字眼。她说：“这是块石头，我碰上了。我必须抱上它才能往前走，否则，就会被它绊倒在那里。这块石头，我至今还在抱着它前行。我

不敢企求所有的人都愿意抱着它，但我希望你能知道它的分量。”

于是，抱着石头的赵冬苓又踏上了行程。

她和她的摄制组凭着自己的真诚和热情，凭着自己的职业水准和出色工作赢得了被采访对象和友好人士的尊重。在为福冈劳工讨说法的诉讼中，编导孔笙成为了第一个进入日本法庭进行对类似案件采访拍摄的中国入。虽然只能在宣判前拍摄两分钟，但这毕竟是日本法庭破天荒第一次允许一个外国人拍摄。第二次审理细菌战时，国内有8家媒体提出了采访申请，而最后日本律师团出于对他们的信赖，只选定了并非媒体的他们摄制组一家。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的敬业和执着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片中外务省报告中提到的室兰挖掘华工遗骨的珍贵影像资料就是北海道的上野先生无偿为他们复制的，赵冬苓说，这份资料在日本也是仅此一份。另外，他们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进入明妮·魏特琳墓地拍摄的中国摄制组，那位倒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美国女人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片子的视野和内涵。美国当地的华侨还无偿提供了片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影像资料。

谈起出国拍摄的经历，赵冬苓说一不留神儿自己也变



成了过去不屑的“制片人”。她说，去美国，在华盛顿逗留三天，就在国家档案馆里整整找了三天的资料，连美国首都什么样都没记住；对圣路易斯的印象也就是住过一夜的华侨饭店；对底特律的记忆就只剩下下榻的汽车旅馆。在美国各地奔波，他们坐的最多的就是夜间飞行、价钱便宜的“红眼航班”，他们去的又大多不是国内游客常去的旅游热线，连旅行社的导游都半开玩笑地抱怨，到当地找人接待都难。为了节省开支，去日本拍片，预算是每人每天最低17000日元，可他们生生压缩不到10000日元。20多天的时间，他们的行程遍历北海道、群马、长野、新泻、福冈和东京等地，60多位采访对象，几乎每天都要安排两组人员同时拍摄。那段时间里，东京的地铁和公交车线路，摄制组的小伙子们都烂熟于胸。难怪日本当地华侨称，这么拼命工作的还没见过。

近两年的跟踪拍摄，五次出国、数次奔走在全国11个省市，他们用镜头抢救性地记录下了10余起不同类别的诉讼、数十起官司中的那些大多已风烛残年的“活证据”。面对堆了一屋子的那350盘磁带、近12000分钟长的素材，赵冬苓从未感到一个个体和国家之间情感的链索是那样的紧密，磁带默默地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一群电视工作者的

跋涉和心血。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那些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哀痛和屈辱，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那种“民间诉说”的坚韧，还有那几位普通日本律师无偿为之所付出的法律援助，支撑着赵冬苓用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和冲动把片子制作完成了，那么播出工作就成了比当初资金筹措更大的一个坎儿。

这个片子关系到中日两国的外交、中日两国的历史、中日两国的法律等等理论问题，如果片子做得不扎实，容易被人利用和提出疑问。虽然摄制组采访了近200余名中国战争受害者、中国律师、中国学者、日本律师、日本学者、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普通民众、美国律师、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学者、韩国学者、韩国受害者等等，力求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反映这一段历史，但是他们的把握没有风险吗？审查这一关的确让赵冬苓忐忑不安。

然而，当一部成型的作品推至同行、专家、学者包括普通观众面前的时候，《未来之讼》还是以其国际视野、博大手笔、精美制作、宏大气魄，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成为了一部立足于纪录片行列的响当当的大制作。每一个参与制作的人员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所有的艰难

也都不足挂齿了。拍摄和制作《未来之讼》的500多个日日夜夜成了大家最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面对亲朋好友、业内同行的祝贺，赵冬苓说，自己不过是在尽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有责任感的电视人应尽的义务。“我希望这些能引起人们对这场跨国诉讼的些许关心。说到底，这是我们民族的事情，是我们国家的事情。”为此，她也从心里感谢播出他们的片子的山东有线电视台、凤凰卫视以及中央电视台。

当中央台把赵冬苓他们拍摄的21集的《未来之讼》改名为18集的《未被审判》播出时，诉讼仍在进行，赵冬苓说播出也许只是开创性的起步，阶段性的回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追求和平者的天命。对战争受害者命运和诉讼进程的关注仍让她和她的创作集体欲罢不能、无法释怀，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道将未来之讼进行到底。因为，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

也正是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使得我和我的同学、同事们似乎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赵冬苓。一个女性，思索和关注的目光甚至超越了男人。国家观念的日趋强烈如同她心底道德观念的永不褪色。回想起来，在西藏雪域高原、在9·11事件上、在犹太人纪念馆前、在日本法庭上、在

中国宁夏农村西海固……我们都听到、看到过她对国家、民族、人类共同命运的直接思考，而“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在她看来，一支笔便是一支涉水而居的依摇蒹葭，航渡尘界心宇的千里涛声。

把平平常常的日子升华为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把一般的思想上升到哲学的层次，把普通的情感净化到宗教的高度，通过一部部作品，通过无数次的生命体验，赵冬苓就这样也愿意一直这样行走在路上。

2003年8月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XzExMTcxOTA2LnppcA==",
  "filename_decoded": "_11171906.zip",
  "filesize": 45097382,
  "md5": "c65d7eb604fb6f293a017361de4b5832",
  "header_md5": "aa20d667056f5c52fee470f66129b1d0",
  "sha1": "d15ace37f7478954283bba14f0dabd806d64c849",
  "sha256": "1c4366135bdc5601d10c2a149784f4dd66d91620c489f31f6e04531799a3255a",
  "crc32": 6866212,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50920922,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68,
  "pdg_main_pages_max": 368,
  "total_pages": 376,
  "total_pixels": 157492649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